

論 战 爭

格·瓦·普列汉諾夫著

(供内部参考)



論 战 爭

格·瓦·普列汉諾夫著

王蔭庭譯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Г. В. Плеханов
О ВОЙНЕ

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两本同名著作译出。
前书由 Книго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ывш. М. В.
Попова 在 Петроград 出版, 是第五版(书上未
载出版年份); 后书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Огни"
于 1917 年在 Петроград 出版

論 战 爭

(俄)格·瓦·普列汉诺夫著

王 蔭 庭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1962年12月第1版

1964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2·79 定价(七)0.55元

印数 1,001—3,000

出版者說明

这本书里，收入了普列汉諾夫的两本同名著作。前一本书是他在1914—15年間写的，包括他写的两封公开信；后一本书是1915—16年間写的論文汇集。普列汉諾夫在这里集中地論述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社会沙文主义观点，借反对德国帝国主义和支持德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为名，主張保卫“受攻击的”“祖国”，即保卫沙皇俄国。同时还对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維克党的正确观点肆意攻击。这一切都說明，曾經是馬克思主义者的普列汉諾夫，自从1903年蜕化为孟什維克以后，发展到这时已經“完全放棄了馬克思主义”（列宁語），滾到了机会主义泥坑里。

列宁在1914—17年的一系列著作中針對普列汉諾夫的这些言論作了尖銳的批判。这些著作主要在《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到二十三卷中。其中直接提到普列汉諾夫在本书中的言論的，有駁斥《論战争》两封信中的論点的《以后怎么办？》《俄国的休特古姆派》《第二国际的破产》《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状况》《社会主义与战争》等篇，以及駁斥《論战争》（文集）中《两条路綫》一文的《論革命的两条路綫》等，更希望讀者注意参閱。

本书翻譯时所据的原本都是旧俄时期出版的俄文本，頗多誤植。凡是容易識別的我們已經逕加改正，可以怀疑的另以注釋标明。

1962年9月

目 录

論战争	1
第一封信	1
第二封信	20
論战争(文集)	60
两条路綫	60
应不应该投票贊成軍事撥款?	66
我对《紡織工人报》編輯部的友好忠告	77
国际主义者,只不过从另一方面看	89
奥国社会民主党人論各国人民的国际友爱	102
我們的立場	107
英国和爱尔兰的悲剧	110
比利时的呻吟	113
国防、反动派和劳动利益	122

論 战 爭

第一封信

圣列漢，1914年10月27日(新历)

……您听人说^①，我认为所有的斯拉夫人现在都应当站在俄罗斯帝国方面。您希望知道，这是不是事实。而且您认为，我的答复会得到所有斯拉夫人的重视，这使我深感荣幸。不过我认为自己有义务指出，我不值得斯拉夫世界给予这么大的注意。

我是斯拉夫人，一直关心斯拉夫人的生活，也一直同情他们所经受的种种考验。不过，我不只是一个斯拉夫人，我还是马克思恩格斯学派的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众所周知，这个学派的社会民主党人，不是用部落或民族的观点，而是用阶级的观点，来看社会现象的。无论当前的战争在我身上产生了多么强烈的印象，我也不可能放弃我所习惯的阶级观点。只有您也赞成同一个阶级观点即赞成国际无产阶级的观点时，我才准备同您以及其他任何斯拉夫人讨论一下当前这一历史时期的任务。

这个阶级对待战争的态度一直是十分明确的。有觉悟的国际无产阶级曾经表现出是最坚决的战争反对者。每当欧洲政治天降战云四合之际，它总是表示了程度不等的坚决抗议。您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过去走在无产阶级国际队伍的最前列。我们所有的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人，曾经都把它的成绩引为骄傲，我们全都在它身上寄托了极大的希望。我们曾经坚信，只要它存在，国际和平的

^① 从一封写给一位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者的信里。——著者注

巩固就有最可靠的保障。过去，当人們問我們，一旦和平遭到破坏，德国社会民主党将会怎样行动，我个人总是回答說，这将視战争发生时的情况而定，不过現在已經有一点絕對不容怀疑，那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会继续忠于自己的使命……

直到今年的七月底，我的这个信念还是坚定不移的。我满怀高兴地讀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反对德国宰相的政策的一篇社論。这些社論证明，正是这种政策有引起战争的危險，因为正是柏林指使維也納政府向塞尔維亞提出一項最后通牒，如果塞尔維亞不想放棄自己的独立，它就决不能接受那个通牒。这些社論也证明了，如果俄国不願意丧失对巴尔干半島的任何影响，它就不能不支持塞尔維亞。事实确是如此。可是，那时德国资产階級政論家的論調却完全不同，因为他們已經被沙文主义弄昏了头脑，而社会民主党政論家却仍然是根本反对沙文主义的。当时社会民主党的政論家勇敢地履行了主張国际观点的无产階級的义务。当自己的祖国准备采取非正义的行动时，他們始終如一地起来反对祖国。

您知道，七月底在布魯塞爾举行了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代表大会，同时召开了一次規模宏大的国际反战群众大会。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哈阿茲同志在这次群众大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說，他非常清楚地暗示說，战争可能成为德国无产階級积极发动的导因。他在作这个明白的暗示的时候，也还是忠于自己的主張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同德国軍国主义进行斗争时，遵守了这样一条准则：“Keinen Mann! Keinen Groschen!”^①一旦因德国帝国主义者的努力，战争由危險的可能变成可怕的现实，这时，人們自然要指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仅会拒絕派出任何一个人或拿出任何一分錢来支持战争，而且将用一切办法动員自己的全部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来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政党。但是，唉！现实并非如此。

在8月4日举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德国国会會議上，同一个

^① “不給一个人！不給一分錢！”——譯者注

哈阿茲同志声明說，社会民主党議会党团將投票贊成軍事撥款，并且一般說來，將积极参加战争。他发表了这项声明后还表示了一个希望，希望他的党的行为將得到始終承认每一个民族都有独立存在权利的國際的贊同。我最初在资产阶级的《Le Temps》^①上讀到哈阿茲的这篇声明时，并不相信真有其事。我对自己說：“只要德国社会民主党随便想起國際关于每一个民族都有存在权利那条原理，它就不可能忘記，德国是通过厚顏无耻地破坏卢森堡和比利时的中立而发动战争的。”

一方面援引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决权这条原理，同时对卢森堡和比利时却不置一詞，这无异于犯了法国人称之为 *une Tartufferie*^② 的那种罪过。您懂得很清楚，扮演伪君子这一角色对无产阶级的代表們說來是多么的不适合。我深信，哈阿茲同志的这篇声明，您和我一样，也会感到突如其來，这篇东西对于您，也和对于我一样，产生了非常不好受的印象。不过問題并不以这种 *Tartufferie* 为止。同一个《Vorwärts》^③，在七月底曾經这般叫人心服地证明，战争临头的責任完全要由德国的外交政策承担，等到一旦宣布了战争，它却完全改变了腔調，开始彈起庸俗的爱国主义的調子來了。我怀着悲痛而驚訝的心情讀了該报关于匈牙利軍隊的英勇战績以及其他类似的报道。只要德国党的中央机关报用这样的調子說話，它对德国帝国主义就不再是危險的了。……

您記得，1870年倍倍尔和李卜克內西曾經在表決軍事撥款时棄权，虽然他們认为法国是进攻國。倍倍尔后来說过，要是沒有上俾斯麦歪曲著名的爱姆斯急电^④的当，他和李卜克內西就会投票

① 《时报》。——譯者注

② 伪善行为、伪君子行为。——譯者注

③ 《前进报》。——譯者注

④ 指1870年普法战争前，俾斯麦为了挑起战争，窜改关于普魯士王在爱姆斯温泉与法国代表会談內容的电报，使之具有侮辱法国的性质。电文发表后，法国政府遂于7月19日向普魯士宣战。——譯者注

反对軍事撥款了。从这里看得出，那时德国党的行动不像它当前的行动。这个差别的原因何在？德国的同志們答复說，他們不能不支持同俄国反动派的斗争。但是……这个答复是否充分呢？

法俄联盟几乎从它刚刚成立的时候起对任何人就都不是秘密。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必須支持同俄国的战争，因之他們也就采取了同法兰西共和国作战的决定。假使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哈阿兹同志就有义务郑重其事地在国际执行局的會議上和布鲁塞尔的国际群众大会上把这件事通知整个国际。他履行了这个义务沒有呢？沒有。相反，他在群众大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說，在这篇演說中他用坚决的抗議来威胁德国政府。这是什么行为呢？

而历届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又怎样呢？参加这些代表大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自然也都知道法俄联盟的存在；但是他們絕對沒有任何一句話暗示过，对俄战争，因之也就是对法战争，会得到他們这方面的支持。虽然他們不肯接受多半是由法国人提出的关于国际无产阶级用大規模的罢工来回答宣战的提案，但是他們使人觉得，軍事行动不仅不会受到他們的支持，反而会促使他們采取危及德国政府的行动。在斯图加特，当古斯塔夫·爱尔威怀疑他們不肯給铁血政策以多少严重的反击时，他們曾經觉得自己深受委屈。难道参加社会民主党国际代表大会的德国人是不真诚的么？难道他們事实上并不对古斯塔夫·爱尔威所表示的怀疑感到委屈，而只是认为必須装出一付被爱尔威冤枉的人的姿态么？

这种假設我觉得都是根本无法思議的。我們沒有任何权利假定，德国同志們在国际代表大会上的行为是伪善的。但是，如果这是对的，那又怎样来说明他們当前的行为呢？

在回答这个問題以前，我請您注意到，利用德国帝国主义来同反动派作斗争是荒謬的。德国帝国主义所关心的并不是破坏邻国的落后状态，而是巩固这种状态和扩大这种状态。大家知道，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曼海姆代表大会上甚至提出过这样的問題：如果德

皇調動自己的軍隊同俄国解放运动进行斗争的話，我們的德国同志們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不錯，从那时以来，情况有了一些改变，“綏靖”暂时在我国占了上風。但是从这一点絕對得不出結論說，1905年到1907年間如此奋勇地支持“綏靖”政策的德国皇帝，在1914年会起来反对这个政策。完全相反。如果胜利扩大了德皇對我們內部事务的影响，則俄国社会发展的延緩，因之还有俄国国防力量的削弱就会有利于他这个德国軍国主义的代表人物。

也許德国同志們在想到俄国的胜利会使俄国反动派成为整个西欧政治命运的主宰，突然感到了恐惧。但是非常明显，德国軍国主义对整个西欧构成的危險，大大地超过俄国軍国主义，因为前者所控制的物质力量大大地超过后者。对于資本主义的欧洲說来，政治领导权能够屬於欧洲的一个經濟上落后的国家的那个时代，已經一去不复返了。

德国同志們过去大概是懂得这番道理的。与其說是对俄国反动派的恐惧，不如說是对自己的选举人的恐惧，迫使他們改变了倍尔和李卜克內西的傳統。

战争剛一宣布，德帝国境內的居民的沙文主义情緒就勃然发作了，因此，我們的德国同志們就认为必須根本改变自己的策略。一切都說明，他們是这样判断的：“现在出来反对战争，无異于削弱自己在国内的影响，而如果这种影响削弱了，在今后的选举中，我們就有得不到四百二十五万張票的危險，也許只能得到两百万張票，或者一百五十万張票，或者更少一点。最好投軍事預算的票吧，不要造成这种得票减少的情况。”

除了对未来选举結果的这种考虑之外，大概还耽心战争的毒气会蔓延到有組織的无产階級身上来，即蔓延到他們自己的党员和他們的工会會員身上来。为了避免自己組織內部的冲突和分裂，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决定最好是牺牲自己过去的策略，而跟在德国軍国主义的后面同法国和俄国进行所謂“防御”战，这种防御战的进攻性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早就非常出色地揭露过了。

这当然是十足的机会主义的決定。不过問題也就在于当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行为乃是早在上世紀末就已經在“重新审查”(“修正”)馬克思和恩格斯学說的机会主义的最大胜利。开始是“重新审查”这个学說的基本理論原則,最后就否定从这些原則中引申出来的实际結論。这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

我們各国的一些同志們曾經以为,可以信奉这个学說的种种結論,而否定它的前提,这些同志是盲目无知的。

为了不使您怀疑我是否夸大其詞,我給您举个例子。您知道,最著名的德国修正主义者之一路德維希·弗朗克参加了德国军队当志願兵,并在他們一个分遣队侵襲法国領土时陣亡了。是什么使得他参加了这次侵襲行动呢?他的朋友阿·休特古姆是这样答复这个問題的。弗朗克坚决地否定那种仿佛认为战争的胜利将是德国人民的不幸的意見。他肯定地认为,剛剛相反,这将会大大地推动德国向前发展。具有历史意义的8月4日會議(正是这次會議在国际社会党人的队伍中造成了这样多严重的混乱不安情緒),在他看来,乃是德国內政有起色的轉折点。他說过,工人和企业主之間經濟上的对立現象自然不会因为战争而消失。但是大敌当前时使全体人民联合起来的那种英勇的团結精神,会鏟除旧关系和旧观点的許多荒唐現象。现在情况已經很明显,人民群众就会取得政治上的平等权利(例如在普魯士)。改善小私有阶层和赤貧阶层的物质状况,会成为社会对自己的拯救者(sic!①)的責无旁貸的义务。有組織的工人階級会对法制和国家行政发生巨大的影响。在战争胜利以后,德国人民面前将出現許許多多的任务,这些任务会給德国人民从来没有机会加以發揮的精力开拓出广闊的用武之地。那时就可以看出,德国工人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有多大的能耐。

令人神往的远景。弗朗克的一个同志曾經向他指出,未来这个令人愉快的时日还需要他的忠告和他的力量,所以他不当拿

① 原文如此! ——譯者注

自己的生命去冒險，這時他反駁說，任何人都應當犧牲自我去為這個事業開路。（參看阿·休特古姆的文章：《路·弗朗克》，載1914年10月第3期的《Mars》雜誌。）

不能不承認，弗朗克的行为中有很多舍身忘我的精神。不過他越是表現自我犧牲的精神，勢必越發令人感到更大的遺憾，因為這個舍身忘我的人在這個場合下所選擇的道路同馬克思主義者的實踐活動迄今所走過的而且永遠應該這樣走下去的道路毫無共同之處。

按照馬克思主義者的意見，直到現在為止，文明人類歷史中的轉折點應當是社會主義生產取代資本主義生產。弗朗克發現這種取代不可能是德國戰勝它當前敵人的結果，這是十分公正的看法。不過他準備滿足於少得無比的要求。他曾經設想過，在戰爭勝利之後，一個新的世紀就要到來，這個新世紀的特征，在他看來，並不是鏟除資本主義制度，而只是鏟除某些荒唐的現象，用他自己的原話說就是：鏟除在資本主義的根基上生長起來的“許多渣滓和銹斑”。既然還有資本主義，那也就還有一個階級剝削另一個階級的現象存在。不過雖然如此，各階級間的相互關係將本著大敵當前時德國士兵中間產生的那種團結一致的精神發展。也正是這種團結精神將會鏟除陳旧的（資本主義的）關係和（為這些關係所制約的）觀點的許多荒唐現象。譯成馬克思主義的普通話，這就是說，統治階級同意作某些改革，通過這些改革來清除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渣滓”和刮去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銹斑”。

無需乎證明，擺在我們面前的是雙料的“修正主義”：——改良主義和用各階級的團結代替各階級的鬥爭。這是怎樣一種團結呢？這是一種在好戰狂熱的影響下包括一切社會階級的團結。已故的弗朗克以一個大空想主義者的姿態出現在我們眼前，而他的空想卻是渺小的。

不過他的渺小的空想，也有他自己的絕對正確的邏輯。馬克思主義者很好地懂得，生產方式的改革不可能是一個國家的事情。

“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努力，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①（《共产党宣言》）認識了这个真理，就等于認識了全世界工人阶级利益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实践家曾經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在各国无产者的运动中“強調和坚持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② 马克思主义曾經教导說：“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③ 在已故的弗兰克的小小的空想中是絕不可能有这个思想的。他的視野局限在德国。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他的新世紀不是从把德国民族内部各阶级的对抗現象連同阶级一起消灭开始，而只是从削弱这种对抗現象开始。而且他认为这种削弱又恰恰应当是各民族之間的敌对关系的結果，即是德国战胜法比俄等国的結果。他不是把自己的大好希望寄托在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上，而是寄托在自己的德意志祖国的一切阶级的联合上。他根本不懂得，“在一切民族的无产者的运动中，強調和坚持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④ 他的新綱領是建立在保卫一个民族的特殊利益上面的。彻底的国际主义被民族主义的改良主义代替了。不言而喻，弗兰克既沒有任何邏輯上的权利，也沒有任何道义上的权利重复国际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⑤ 他只有权利高呼：“一切社会阶级的德国人，联合起来。为毁灭比利时，联合起来；为掠夺法国，联合起来；为了反对英国的竞争，联合起来，等等，等等。只要毁灭、掠夺和削弱一切不向德皇屈膝的国家，保证自己有最好的条件在經濟上剝削所有战败的民族，我們就会生活得极好。”

奥国的德意志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完全同意弗兰克的观点，并且号召自己的同志們为全体德国人类而斗争。

①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488頁。——譯者注

② 參看上书，第479頁。——譯者注

③ 參看上书，第488頁。——譯者注

④ 參看上书，第479頁。——譯者注

⑤ 參看上书，第504頁。——譯者注

實踐的、按其本質說來是國際性的馬克思主義認為，必須揭露各種外交陰謀，並且集中力量使“道德和正義的簡單法則”在國際關係中占統治地位。國際工人協會的第一個宣言曾經肯定地認為，為這樣的外交政策而鬥爭是為解放工人階級的總的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

根據這個看法，無產階級應當反對破壞這些簡單法則的人。它特別應當運用自己的全部輿論力量捍衛和平，反對王朝的或帝國主義的種種目的：掠奪新的市場、殖民地等等。正如我在上文所指出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機關報在今年七月底曾經神聖地履行了自己的這一義務，它令人信服地證明，國際關係急劇惡化的責任要由德國政府來擔負。但是，從“道德和正義的簡單法則”的觀點看來，能否認為德國的外交行動是正當的，這個問題，無論在休特古姆引證弗朗克關於德國內部發展的新時代即將到來的議論中，或者在休特古姆本人的主張中，都沒有絲毫暗示。這也是容易了解的。弗朗克過去所抱定而休特古姆又繼續抱定的觀點，並非國際的觀點，而是民族的觀點。從民族的、德國的觀點看來，勝利的戰爭其所以合乎人們的期望，完全不是因為它有助於實現“道德和正義”的要求，而是因為它保證着德國帝國主義的利益。但是帝國主義就是掠奪政策。這個政策表示着一個民族或一些民族對另一個民族或另一些民族的剝削。弗朗克舍身忘我地力求保障德國有最大的可能剝削其他的民族，結果丟了自己的性命。休特古姆完全贊同這種舍身忘我的行為。這件事情本身就已經十分悲慘了。不過還有更無比悲慘的事情，這就是在8月4日德國國會會議上，整個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團都投票贊成軍事撥款，並且通過哈阿茲同志的嘴說出了合乎弗朗克和休特古姆的精神的話。而今而後，這個黨團本身就變成德國容克地主階級和德國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政策的支柱，——而且幾乎是最可靠的支柱。

關鍵問題是：當一個民族遵循着帝國主義者的目的而進攻別一民族時，後面這個民族是不能不來自衛的，除非它墮落到了極

点和弱小到了极点。而国际社会民主党只要它在自己的对外政策中真正奉行“道德和正义的简单法则”，就不能不同情这个民族的自卫行为。这一点决定着我对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甚至通过盖得和桑巴参加内阁的法国社会党人的态度。法国是受到攻击的国家。因此，法国社会党人的行为不可能如德国社会党人即进攻一方的社会党人所应有的行为一样^①。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比利时。

德国军队使比利时遍地成为废墟，成为血泊，因为它不同意让德军自由地通过自己的领土，不同意给德军以进攻法国的方便。如果今天的国际忠实于马克思建立的第一国际的遗训，如果今天的国际在自己的对外政策中继续以“道德和正义的简单法则”为指南，那么，它就应当一致起来反对德国对比尔时的态度。我说的是“一致”，因为在我看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有义务比所有其余的社会党人更大声地抗议这种行为。要求这个或那个国家的社会党人对待自己祖国的利益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那是荒谬的。社会主义绝对不排斥爱祖国。但是当抱着剥削阶级观点的人认为可以，甚至必须把自己国家的利益放在全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的利益之上的时候，社会党人就应当有勇气出来反对自己的祖国，因为这个祖国在对外政策中的不义行为破坏着“道德和正义的简单法则”。只有能够这样做的社会党人，才可以称为国际社会主义者；只有能够这样做的社会党人，才有权利说，在他对祖国的爱中没有沙文主义的情绪。非常遗憾的是不得不确认，至今还没有听到德国社会主义者对比比利时发生的事情提出过抗议。据说卡尔·李卜克内西准备出来表示这种抗议。我们希望，他的行为将使他无愧于做乃父

① 我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法国社会党人应当无条件地投票赞成军事拨款。他们在投票赞成票的时候，可以大声地说出，也有义务大声地说出某些无容置辩的真理，这些真理对法国资产阶级外交说来是不好受的，但是从提高国际无产阶级的觉悟的观点看来则是有益的。他们没有做这个工作，我对此感到遗憾。但是我仍然认为，我们有些同志对法国社会党人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一概加以严厉谴责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著者注

的儿子；不过大約有三分之一是由社会民主党员組成的德国士兵暂时仍然在建立只有匈奴人才会建立的功勋，同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某些机关报（甚至像克拉拉·蔡特金的 Gleichheit^① 这样的机关报）都极端天真地（我不敢說也不敢想是伪善地）譴責比利时人用残酷的态度对待德国士兵。

足以明显地說明德国社会民主党內右翼对左翼的胜利的，也許无过于这件事实了：即当德国资产阶级知識分子大声宣布自己支持德国軍国主义者的野蛮行为的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却宁愿保持緘默。不过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沉默虽然也值得惋惜，但是可以理解的話，那么，老实說，我不懂为什么各中立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对于任何一个天良犹存（用德国人流行的說法）的人都不能无动于衷的那些行动反对得那么不坚决，几乎毫无力量。我这句话主要是指意大利和瑞士的社会党报刊，因为我很少接触其他中立国家的工人报刊。不过我想，如果这些报刊提出过强有力的抗議，那是一定会反映到我所讀的那些国家的工人的机关报上去的。

順便說說，我已經完全得不到保加利亚社会党的刊物了。我敢假定，保加利亚社会党机关报提出的抗議也是万分微弱的，因为不可能作那么强有力的抗議。这是普遍的情緒。如果我沒有記錯，有一个苏黎世社会主义者联盟（Eintracht）作出的決議，要求不向任何人支付战争賠款（ohne Entschädigung）的和平。假定这个要求实现了，比利时又会怎样呢？应当考虑到，苏黎世的決議是“要求”德国軍队离开比利时的。但是，“道德和正义的簡單法則”并不“要求”德帝国至少向比利时賠償因中立受到破坏而給它造成的那种巨大的物质損失么？而提出这个最公道不过的要求，首先就意味着同苏黎世決議发生矛盾。

当一个人使另一个人破了产，恐怕只有托尔斯泰分子才会“要求”他們达成“不賠償”的和平。

① 《平等报》。——譯者注

我仿佛觉得各中立国家的社会主义报刊上表现出来的軟弱性、不坚决性和不彻底性都是由于那里的社会党人希望 quand même^① 保持中立。而这种希望 quand même 保持中立的想法，其根源在于对应当怎样理解国际社会民主党对待战争的否定态度的不正确看法。

各中立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说(我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反对战争,因此我们不想站在交战的任何一方说话;我们要求和和平,而且只要求和和平。”如果一个人当着我的面要扼杀另一个人,那么我自然会要求和和平;但是,这完全不是说,我没有权利毅然出来反对扼杀者。要知道,国际工人协会的第一个宣言坚定地劝告我们力求把个人关系上务必遵守的那些“道德和正义的简单法则”应用于国际政策。

也有人說(而且說得那么一本正經),在現代国际冲突中不可能发现禍首,也不可能确定誰真正在进攻,誰真正在防御。对于这一点,我通常是引证倍倍尔的话作为答复,倍倍尔說,如果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学会把这类問題分析清楚,那就太悲惨了。有时我还介紹別人去讀埃克《Die Internationale》^② 一书中題为《Der Deutsch-Französische Krieg und die Arbeiterklasse》^③ 那一节。从这一节中可以看出,以馬克思为首的第一国际的領袖們,多么坚定多么彻底地划清了防御战和进攻战两者之間的界綫,他們又多么正确地分析了普法战争的各种事件。为什么 1870.—1871 年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們可以作出明白的判断,而 1914 年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們却作不出来呢?难道这原因也就是珀涅罗珀的許多求婚者中誰也不能用俄底修斯的弓射箭的那个原因嗎?^④ 最后,在这个場合下,上

① 仍然。——譯者注

② 《国际》。——譯者注

③ 《德法战争和工人阶级》。——譯者注

④ 希腊神話:俄底修斯外出,許多人想乘机謀占其妻珀涅罗珀。珀涅罗珀为了設法拒絕,拿出俄底修斯使用过的弓箭,說凡是能用它們射中規定的目的物的,即可与她成婚。結果誰也沒有达到要求。——譯者注

文一再提到的那个事实大大地促成了对待俄底修斯的弓的态度，这个事实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报刊早在去年七月底就已经最好不过地说明了破坏和平的全部责任在何种程度上要由德国担负。谁要是知道这一切而继续摊开双手，表示困惑不解，他实际上就完全没有能力弄清楚使我们发生兴趣的问题。而他就应当去研究化学、神术、音乐、中文文法，——爱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但只是不要研究世界政治(Weltpolitik)，因为“Studiate la matematica e lasciate le donne”，^① 像一个威尼斯女人对让-雅克·卢梭说过的那样。

现在人们又在开始重复《共产党宣言》的话：“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原来没有的东西。”^② 重复这两句话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宣言的两位作者本人曾经着意地说明过这两句话。

他们说：“既然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组织为一个民族阶级，在民族的范围内组织起来，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不过这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个意思。”^③

在怎样的意义下无产阶级仍然是民族的呢？这是说，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在民族的范围内组织起来，同时拒绝模仿资产阶级的榜样；即为了自己祖国的利益，准备去吞并其余的全体人类。

宣言说：“由于资产阶级的发展，由于贸易自由，由于世界市场，由于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关系的一致化，各国人民的利益的民族孤立性和对立性现在已经在日益消逝下去。无产阶级的统治将更加快它们的消逝。……个人对个人的剥削消灭到怎样的程度，民族对民族的剥削也就会消灭到怎样的程度。”^④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宣言说，工人没有祖国。因为工人认为他们的国家不应当力求使自己从其他国家孤立开来，不应当使自己

① “学了数学却丢了女人”。——译者注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487页。——译者注

③ 同上。——译者注

④ 参看上书，第487—488页。——译者注

的利益同其他国家的利益对立起来。^①无产阶级所要求的不是消灭民族，而是终止民族对民族的剥削。然而正是因为无产阶级要求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它就应当用全部力量起来反对现时企图把自己的桎梏放在其他民族身上的那个民族。如果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想要继续保持中立，那它因此也就会抛弃自己的国际观点。

我只反对对“工人没有祖国”这句话所作的一种理解，那就是第一式样的古斯塔夫·爱尔威那种慷慨激昂的反军国主义学说。大家知道，按照这个学说，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党人都没有任何兴趣对敌人的侵犯进行自卫，因为国家是否保持独立在他们说是纯粹无所谓的。但是即使爱尔威本人现在用沉默的方式（然而正如您所知道的，却是完全肯定地）放棄这个学说，大概也会有人及时加以鼓吹的。如果现在有谁非要做一个第一式样的爱尔威派，那他一定得认清自己，绝对不能冒充是马克思主义者。把属于爱尔威的东西还给爱尔威吧，不过他也許不会因为您现在提醒他记住他的老錯誤而感谢您。^②

宣言的作者們本人对待祖国这个概念的态度和爱尔威主义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这是事实，因为宣言的一位作者（恩格斯）說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話：“werden wir angegriffen, so wehren wir uns.”（如果我们受到攻击，我们将进行自卫。）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现在正在濫用这句话，他們将来也还要濫用这句话。因为他們必定要找一个理由替他們支持貝特曼-霍尔威克的帝国主义政策的行为作辯护。而且，沒有一种真理，也不可能有一种真理不能

① 社会民主党的綱領承认“作为国家組成部分的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难道它承认这种权利是由于考虑到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对自己祖国的命运可以而且应当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嗎？——著者注

② 爱尔威主义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变种之一。正是从法国机会主义者开始做自己的“嘗試”（即米勒兰等人的嘗試）以后，无政府工团主义就开始加强了。現在，在弗朗克和休特古姆及其一伙的可悲的嘗試的影响下，人們再度鼓吹（常常是完全不自觉地）这种学说。——著者注

被人当作这种或那种詭辯的根据。不过我并不想回头来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当前的行为。刚才引用的恩格斯的话的意义，在这里我认为只在于它完全不可辯駁地证明，恩格斯（和馬克思完全一致地）承认德国民族有进行自卫的权利，而且当然不仅仅是德国一个民族有进行自卫的权利。现今有觉悟的工人阶级，为了维护自己本身的尊严，应当比现代社会中一切其他阶级更大声地反对这样一些国际罪行，例如残酷无情地毁灭比利时，和比利时官方现在郑重宣布同德国的“合并”。

“如果我们受到攻击，我们将进行自卫。”这句话可以充分说明比利时无产阶级和法国无产阶级的行为。同时它们也充分说明盖得、桑巴和王德威尔得之参加内阁。法国和比利时现时正处在一种特殊状态中，而在特殊状态下，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内阁是符合国际的决议的。不错，参加资产阶级内阁会削弱阶级斗争，甚至几乎暂时会停止阶级斗争。但是，正如弗兰茨·梅林有一次正确地指出过的，一个民族应该存在下去，以便有可能决定它将来应当怎样存在^①。我希望，正统的梅林还在十七年以前写下的这句话，至少在谈到比利时和法兰西的时候，不会引起您的任何困惑不解。然而就我从您给我的信所能作出的判断来看，使您糊涂的是俄国问题。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自然，您愿意承认俄罗斯民族也像任何其他民族一样有存在和自决的权利。而且您知道我国国内的政治关系，您看到，现时俄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障碍是旧制度的残余。所以，我想，您在为俄国人民祝福的时候，会希望德国战胜俄国。然而您听到的消息却是我反而把德国可能战胜一事看作整个欧洲最大的不幸；虽然您知道我曾是解放运动的热烈的拥护者，也会不安地问自己：“莫非他开始在同旧制度妥协么？莫非他会转到泛斯拉夫主义者的队

^① “Freilich muss ein Volk existieren, ehe es sich entscheiden kann wie es existieren will.” 弗兰茨·梅林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德文第2版，第299页。——著者注

伍里去么？”

否，亲爱的同志，我现在和过去一样，仍然是反动派的不可调和的敌人。我现在和过去一样，不会被人拖到泛斯拉夫主义方面去的。然而我的确很害怕德国可能战胜俄国所产生的后果。

您是这样判断的：“俄国官方的失败，就是俄国获得自由的机会的增多；因此我希望它失败。”在我国，有一种信念流传得极为广泛，即认为这种判断是最革命的思想方式。不过这是不正确的。过去有个时候，我国的自由派，甚至还有斯拉夫派也这么判断。在克里木战争时期，霍米雅可夫（他决不赞成任何激进主义）就指出过，俄国的失败会对它国内的发展产生良好的影响。就俄国进行克里木战争和其他一些战争的情况来说，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是否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说，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呢？绝对不可以。

要使一个国家军事上的失利成为该国内部发展的良好的动力，至少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即必须是军事失利不致使人民解放意向由以蓬勃发生的泉源涸竭起来。这个道理是明显的，因为这种泉源的涸竭，意味着新的生活制度对之有利的那些社会因素的削弱。而这些社会因素的削弱可能会大得使军事上的失利甚至引起旧制度的巩固。这种情况处处都可能发生，所以也可能例如在俄国发生。现在的问题是：应当到什么地方去找我国解放运动的源泉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在三十多年前早就抱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回答说：到俄国经济发展中去找，更确切点说，到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去找。

您过去是知道我这个答复的，您过去也认为它是对的。然而如果它是对的，则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

由此应当像正确的数学推论一样绝对令人信服地得出结论说，俄国的这种失败既然会延缓它的经济发展，所以对人民的自由事业将是有害的，而对旧制度则是有利的。

凡是延缓我国经济发展的事物，都是我国反动势力的支持者，因为这种反动势力是俄国境内经济落后状态的特殊的政治后果。

您看事情究竟是怎樣轉變的。無怪乎我們永志不忘的車爾尼雪夫斯基在說明辯證思維方法的特征時說道：“一切都依時間和地點的情況為轉移。”我們應當辯證地思考。誰像形而上學者那樣思考，誰按照一成不變的框框、按照背得爛熟的公式進行推論，誰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惡毒地諷刺馬克思主義者。^①

但是往下談吧。我們是不是有理由耽心俄國在這次戰爭中的失敗對於它往後的經濟發展將是有害的呢？有，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耽心這點。

為什麼？道理很簡單。帝國主義政策的本質向我們作了這種保證。這個本質就在於戰勝的民族把戰敗的民族變成經濟剝削的對象。由於這種剝削的結果，戰勝民族的經濟發展加速了，而戰敗民族的經濟發展延緩了。

因此，我抱著沉痛的心情注視着至今仍然存在的德國勝利的可能性。我知道，我的這份耽心引起一些喜歡作公式推論的同志們對我的攻擊。不過即使地球和其他行星上的一切居民都起來反對我，我也不能改變自己的觀點。

① 1870年8月中旬，當德國對法國的戰爭在兩位科學社會主義奠基人看來還是防禦戰的時候，恩格斯批評了威廉·李卜克內西的觀點，他寫信給馬克思說，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應當保持中立……“如果這是德國的普遍的看法，那麼我們馬上就回到萊茵同盟（即回到拿破侖一世的時代：拿破侖一世在德國西境建立了一個萊茵同盟，這個同盟當時處在他的保護之下。——格·普·），那時高貴的威廉就必須問問自己，他在这時要表演怎樣一個角色，工人運動又會怎樣。一種人民如果老是挨打受罵，這種人民自然會進行社會革命，而且會在威廉所珍視的許多小邦中進行社會革命。”（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4卷，第422—423頁。——譯者注）在同一封信中有幾行精湛的文字是現代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必需熟思的。這幾行文字如下：“這種戰爭是在勒曼和俾斯麥之流的指揮下進行的，如果戰爭的結局很幸運，暫時的榮譽會歸於這流人的，對此，我們應當感謝德國資產階級。不言而喻，這種情況是十分討厭的（eklig），但是無法改變它。而根據這一點，就把反俾斯麥主義當作一種唯一的指導原則，則是荒謬的。”（參看上書，第422頁。——譯者注）我們的某些同志現在把反動主義當作唯一的指導原則……但是，把反俾斯麥主義或者把反動主義當作唯一的指導原則，也許只適合於自由派。——著者注

我早就預料到会有人对我說：“这样一来，您应当到俄国反动派那里去服务。”不过这类反駁过去既沒有难倒我，現在也不会难倒我。我能够忍受它們。一个著名的法国画家 Eugène Delacroix^①，一生听到过許多荒唐的教訓式的批評，临死前他大声喊道：“Voilà trente ans que je suis livré aux bêtes.”^②您知道我的著述活动史，您記得我曾經就俄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意义問題进行怎样的爭論，您也会同意，我有一种令人惋惜的权利重申，Delacroix 的話对我是适用的。livré aux bêtes^③ 是不愉快的，不过誰要是几十年来一直經歷着这种不愉快的感觉，他就会习惯下来，并且嘲笑它。

当我过去說：“俄国不可能避免资本主义阶段，我們应当起来反对所有阻碍它朝这个方向发展的东西”，这时，一些聪明人就竭力想用下面这个他們觉得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結論使我屈服：这样一来，您应当到资本家那里去服务。（去开小酒店，像这些聪明人中間一个最会动脑筋的人克里文科所写的。）为了揭露这个似乎必不可免的結論是可笑的、毫无根据的和毫无价值的，我就写了两本书（《我們的意見分歧》；《論一元論历史观之发展》）和很多文章。我想現在我已經不必花那么大的力量来駁斥这样一个邏輯价值之低劣簡直与之不相上下的結論了：即如果我認为德国战胜俄国的經濟后果不利于我国的解放运动，那么我就应当去充当俄国反动派的奴僕。过去，在对待资本主义的問題上，我能够指出一条行动的路綫，这条路綫为后来的事件证明是在当时一切可能的行动路綫中最有效的一条。現在，在对待反动派的問題上，指出一条同样的路綫，对我說来，并不是难事。

人民的处境是明显的。非常清楚，人民不会願意做德国帝国主义者的剝削欲望的牺牲物：他們不是托尔斯泰派。然而，为了打击給这些貪欲效劳的人，必須有力量，而俄国落后的生活制度則削

① 欧根·德拉克洛。——譯者注

② “这就是我为愚人工作的三十年”。——譯者注

③ “为愚人工作”。——譯者注

弱着我們的力量。众所周知，德国皇帝是旧制度最可靠的保卫者。他知道保卫旧制度的意义何在。他懂得，这个制度的存在对俄国人民是没有利益的，对德国容克地主和帝国主义者则是有利的，因为它有助于德国战胜俄国。这就是所以要一方面对付外敌，同时必须结束俄国生活的停滞状态的理由。

但是，您会说，如果俄国变成当前战争的胜利者，则它的居民会把胜利归之于旧制度。就让它这样吧。即使胜利暂时使反动势力猖獗一下，终归会使它走向消灭，因为俄国获得胜利就可以避免失败在俄国经济发展道路上所造成的那些障碍。要知道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懂得，经济发展是其他任何事物的根本。我始终一贯地肯定认为，使我国经济停滞不前的那种现象，也会有使我国的政治落后状态大大巩固起来的危险。

我重申，不应当认为这个落后的政府之败于外敌，永远会使得它丧失对自己人民的影响。拉薩尔在自己的一封信中非常精确地指出，普魯士的居民任何时候也没有像1807年当拿破仑把普魯士国王打得一败涂地的时候那样强烈地依附于自己的国王。^①另一方面，拿破仑所进行的各种战争的胜利结局，在俄国当时唯一能够理解解放思想的那个社会阶层中大大地推动了解放运动的发展。在这里也应当注意一点，即在当前情况下，德国帝国主义的失败将大大地促进德国本国发生运动。这种局面同时也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的失败。試問，怎么能不认为当前战争的不利于德国的结局是极其理想的呢？

再說一遍：一切都依时间和地点的情况为轉移。有許多理由可以认为，俄国进行当前这次战争所处的条件，即使结局是它取得了胜利，也不会造成反动势力短时期得到巩固的情况。无论对西方說来，也无论对我国說来，这次战争并非如德国人所謂的是

① Nie war unser Königthum populärer, als 1807 und Aehnliches konnte wiederkehren.《斐迪南·拉薩尔致卡尔·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书信集》，斯图加特，1901年德文版，第187頁。）——著者注

ein Kabinettskrieg^①。这（也用德国話說）是 ein Nationalkrieg^②。它的危險在于使俄国所有“民族”的生存条件变坏，亦即使我国全体劳动群众的生存条件变坏。我国全体的劳动群众由于某种本能也感觉到这一点。他們頑強地斗争着，而且同外国的敌人的斗争，会大大地激发起他們的首創精神。

Post-Scriptum.^③ 当我給您的答复已經写好和誊清并准备付邮的时候，我在《L'Éclaireur de Nice》^④（11月7日）上讀到該报轉載自《Neue Züricher Zeitung》^⑤的一則消息說，李卜克內西、罗莎·卢森堡、弗兰茨·梅林和克拉拉·蔡特金在刊物上发表声明，說他們完全不同意休特古姆和費舍的看法，即机会主义者对当前战争的原因和性质以及对社会民主党在这次战争中所起的作用的看法。迟到比不到好。但是我們还是不知道上面这些急进的同志究竟是怎样观察这一切問題的：因为他們补充說，特別戒严状态不允許他們发表意見。这是尤其令人惋惜的，要知道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內西当年即使在軍事时期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下，也善于說出自己对战爭的看法。

第二封信

Der eigentliche Obscurantismus ist nicht, dass man die Ausbreitung des Wahren, Klaren, Nützlichen hindert, sondern, dass man das Falsche in Kurs bringt. Goethe.^⑥

圣列蒙 1915年5月8日(新历)

我写过一封信給保加利亚的 З.П.—В 同志，这封信出版过单行本小册子，题为《論战争》。在这封复信中，我表示了一些看法，因

而受到各方面严厉的攻击。您知道，一般說来，我是不迴避热烈的論爭的。反之，人們曾經不止一次地責备我，說我对論爭的兴趣太大了。不过我只是在希望意見冲突中显出真理的时候才进行論辯。如果我沒有这种希望，我就沉默，可是这也許会使攻击我的人“神气起来”。我不爱把時間浪費在小事情上面。这一次我也沉默过，因为我的論敌們据以反对我的理由根本不值得批判。看了这些理由以后，我只好暗自重复倍倍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諾威代表大会上发出的感叹：——“Es ist merkwürdig, wie wir des Denken verlernt zu haben scheinen.”“真奇怪，大概我們已經忘記了是怎么思想的吧！”

我不认为自己必須去分析这些可怜的理由。而且这也太討厭了；尤其是在大量流血，同时也許要长期地决定一般文明世界的命运、特別是我这多災多难的祖国的命运的时候，要我同反对我的“不学无术之輩”和政治上的侏儒拌嘴，同蛤蟆們（如果在这里利用別林斯基的形象的說法）进行笔战，在道义上是不可能的。要是沒有您給我的信，我当时是不会打破沉默的。在您的信里，我看到了对事物的深思熟虑的态度；在您的信里，我仿佛触到了一些令人煩惱的問題。这我才决定：我必須給您一个答复。不过我的全部心思都已放在整整两本刻不容緩的著作上，因此我的答复稍微迟了些，請原諒。

我想，为了相互了解，我們必需确定一下无产階級国际政策的某些普遍原理。因此我准备向您指出某些事实，并且提醒您注意某些思想。

-
- ① 一次內閣战争。指政府所进行的違背人民意志的战争。——譯者注
 - ② 一次民族战争。——譯者注
 - ③ 附言。——譯者注
 - ④ 《尼斯偵察者》。——譯者注
 - ⑤ 《新苏黎世报》。——譯者注
 - ⑥ 真正的蒙昧主义倒并不是阻碍真实的、明白的、有益的事物的發展，而是使它們走上錯誤的方向。（歌德）——譯者注

直到德国向俄国宣战的那一天为止，德国社会民主党仍然坚定地、彻底地抱着这样的看法：灾难临头的责任要由維也納来負，特别是要由柏林来負。我在自己的小册子《論战争》中已經指出了这一点。現在我要补充的是，我指出的这个看法，不久前由伯恩施坦证实了。

当奥地利把自己的最后通牒送給塞爾維亞的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Parteivorstand”^①发表了一份呼吁书，在呼吁书中，它虽然譴責了“大塞爾維亞民族主义分子的陰謀”^②，但是毫不动摇地称这个最后通牒为輕率的和无比粗魯的战争挑衅（Kriegsprovokation）。这份重要的历史文件說：“認識到自己的階級任务的德国无产阶级，以人类和文明的名义，强烈地抗議战争唆使者們种种罪恶的陰謀。它无条件地要求德国政府利用自己对奥国的影响維護和平，如果不可能防止可耻的战争，則自己千万不要参加这次战争。德国士兵的任何一滴血都不应当去为奥国統治者貪权的欲望和帝国主义者发财的意願牺牲。”^③

不可能說得再明白了。

奥国的德意志社会民主党坚决地肯定說，两邦联合王朝的利益可以通过和平的方法来維護，因此战争絕對不是国家所必需的。^④它的呼吁书中，的确沒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呼吁书的字里行間体现着的那种“强烈的”抗議，不过，——正如伯恩施坦公正地指出的，——在奥地利向塞爾維亞提出最后通牒以后，奥地利社会民主

① “党的执行委员会”。——譯者注

② 关于这个“陰謀”下面还要談到。——著者注

③ 《Die Internationale der Arbeiterklasse und der europäische Krieg》，（《工人階級国际和欧洲战争》。——譯者注）爱德华·伯恩施坦著，图宾根，1915年，第11頁。——著者注

④ 同上书，第14頁。——著者注

党已經沒有可能自由地表示自己的思想了。①

西歐其他各国的社会党人对当前局势的看法是完全相同的。7月27日那一号的英国《Daily citizen》②說道：“我們坚决认为奥地利是进攻的方面。”布魯塞尔的《People》③說，弗朗茨—約瑟夫干出一件很坏的事情，并且可能实质上还是一件极其不利的事情，从而会結束自己的統治。伯恩施坦的結論是：“如果我們逐一地分析所有的国家(Land auf Land durchnehmen)，我們到处都会发现同样的現象。全世界的社会党人都一致地激烈譴責战争和承认奥地利是战争的禍首。”④

同志，您会看到，如果我的“有远見的”論敌們現在举出完全不可能确定当前的战争是誰发动的这一点来作理由，这正好說明他們是“有远見的”。謝天謝地幸而沒有这种远見的人們，——全世界的社会党人，——从伯恩施坦的证明中可以很好地知道禍首在哪里。自然，完全不需要有(像法国人所說的)grand clerc(很大的聪明)，就可以懂得这个道理：因为局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繼續往下談吧。根据全歐战争前夕的这种团结一致的精神，可以期望，全世界的社会党人就是在战争爆发以后仍然会团结一致。他們的团结一致，会使第二国际免于内鬩，也会使第二国际一些最优秀的成員心情不致十分的难堪。要做到这点，所有国家的社会党人只須坚持一条：即按照他們原来的、坚决确定了的热情地发表过的那种信念行动，这种信念是：战争起源于德奧两国統治者貪权的欲望和德奧两国帝国主义者自私的意图。我們的奥国和德国的同志們会不会支持这种战争呢？他們会不会参加这种可耻的勾当呢？

我(而且不止我一人!)曾經深信，这对他們說来，在心理上是

① 《工人階級国际和欧洲战争》，第13頁。——著者注

② 《公民日报》。——譯者注

③ 《人民报》。——譯者注

④ 《工人階級国际和欧洲战争》，第15頁。——著者注

不可能的。实际情形却相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心甘情愿地投了进行“罪恶的战争”所需的撥款的票，而奥国的德意志社会民主党人則在自己的中央机关报《Arbeiterzeitung》^①八月份的一期上，郑重宣布說：应当拯救“德国的人类”。“多大的转变啊，真是鬼使神差”！这种转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这答案我們还得問問伯恩施坦，他，由于一个极其明显的原因，与其說有意于譴責自己的党，倒不妨說更有意得多的是替自己的党作辯护。

他一看到某些国家里的社会民主党人沒有投票拥护軍事撥款，馬上就对此提出一些堂而皇之的見解。

照他看来，如果从他指出的事实得出結論說，在这些国家中一些左翼政党比德国和奥国社会民主党人更勇敢、更有理想和更彻底，那就会犯錯誤。事情完全是由于环境不同。“当一些大党或者在議會中有很大影响的党投票的时候，他們不得不估計一下由于这种影响而造成的实际責任。他們不可能为示威而投票，而在小党就可以很容易让自己这样做，因为小党的投票对事变的进程沒有直接的影响。党在議會中的势力的扩大的不良因素就在这里。”^②

同志，我們曾經在什么地方遇見過类似的論調。怎么就想不起来…… 啊，对啦！在普希金的《人魚公主》里。

“有什么办法呢？

你自己考虑吧。公爵們不像
少女們那样自由：他們为
自己选择女侶，不是出自
良心，而是出于盘算……”

現在，真相大白。現在我們懂得，为什么德国和奥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当前战争中的行为，不像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在1870—1871年战争时期的行为那样。“公爵們不像少女

① 《工人报》。——譯者注

② 《工人階級国际和欧洲战争》，第39—40頁。——著者注

們那樣自由”……恕我直說，——大黨不像小黨那樣自由。德國和奧國社會民主黨是大黨，於是乎它不得不使良心服從理智。“黨在議會中的勢力的擴大的不良因素就在這裡”，伯恩施坦補上一句安慰自己的讀者的話。

可悲的慰詞！不堪設想啊，同志！

在其他條件相等的情況下，社會民主黨在議會中的影響是和它的組織力量成比例地增長的。但是，如果它的組織力量的增長，必然要使它不能繼續忠於自己固有的原則，那麼是否值得用心去增強它的力量呢？让它仍然做個“小黨”不是更好些麼？看起來似乎好些！另一方面，又不必懷疑，社會民主黨如果繼續做一個“小黨”，它任何時候也不會實現自己的原則。真是進退維谷：顧得了頭，就顧不了尾！無政府主義者過去和現在反復不斷地對我們說，社會主義者只要走上了議會活動的道路，就會最後放棄先前的政策的，莫非這些無政府主義者是正確的麼？

二

無政府主義者錯了！社會主義者之走上議會活動的道路本身還完全不等於放棄他們的策略。不過他們應當記住，人不是為安息日而生的，安息日是為人而設的；不是社會主義服務於議會活動，而是議會活動服務於社會主義。這種活動只是有助於達到國際社會主義最終目的的一種手段罷了。誰把這個手段看得比這一個目的還高，誰實質上就不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了。然則究竟是誰把手段看得比目的還高呢？就是那個根據自己高深的“修正主義者”的觀點鄭重地向我們宣布運動是一切，而最終目的微不足道的伯恩施坦其人。這就是我為什麼在自己的小冊子中說德國社會民主黨議會黨團的投票意味著德國社會民主黨右派對左派的勝利，即伯恩施坦對考茨基的勝利的道理。從那時以後，我得到消息說，考茨基本人也贊成這次投票。如果這個消息確實，那麼這仍然不會改變問題的任何性質，不過說明考茨基受到了勝利者的控制而已。

我就議會活動所說的意見，也适用于組織。忽視組織是荒謬的，甚至還是犯罪的。為了實現我們的最終目的，組織是絕對必要的。然而它也不過是一種手段罷了。只有認為最終目的“微不足道”的人，也就是說，只有那些“修正主義者”才會把組織看得比目的更重要。

尼古拉皇帝的兄弟、一度做過波蘭總督的康士坦丁，他熱烈愛好軍事演習。不過他極力設法使波蘭軍隊^①不參加俄土戰爭（1828年）。一個法國歷史學家說他講過一句話：“Je déteste la guerre, elle gâte les armées.”（我非常討厭戰爭，它耗費軍隊。）德國的“修正主義者們”非常討厭堅決的行動，因為堅決的行動有瓦解黨組織和縮小黨在議會中的影響的危險。當真正利用德國社會民主黨大軍的巨大力量的時刻已經來到的時候，他們卻力求使這些力量不進行征戰。“Je déteste la guerre, elle gâte les armées.”本來嘛，這些先生們是完全正確的！^②

不過當然只是本來而已。我面前擺着一封一個德國的國際社會主義老戰士寫來的信。這個老戰士發現，德國社會民主黨人過去所做的工作遠不是為防止戰爭所能做的和所應做的一切。他說：“在這等時刻，關在房子里寫些平凡的決議其效果自然是微不足道的。應當走到街頭去。德國軍隊中有三分之一是社會民主黨員，要是社會民主黨決定用一切手段進行反對戰爭的鬥爭，政府在兩個戰綫上發動戰爭就會有所顧忌”。這種鬥爭需要慘重的、可能還是流血的犧牲。這個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老戰士問道：“但是，和現今在同俄國人和法國人鬥爭的戰場上好幾千人為德國帝國主義而犧牲比較起來，幾百人光榮的損失又算得了什麼呢？”

① 當時有一部分俄軍駐在“康格列蘇夫卡”（“Конгрессувка”，波蘭人對波蘭王國的稱呼。——譯者注）。——著者注

② 但是為了表示公正起見，我得補充一句：還在“修正主義”出現以前，我們的德國同志們就避免認真地慶祝五一。他們耽心，如果在這一天停止工作，德國無產階級就有瓦解自己的組織的危險。——著者注

您可以看得出来，信中說的只是好幾千人为帝国主义的摩洛^①而牺牲；因为这封信是在战争刚刚开始时写的。现在，根据其保守的估计，这种牺牲的人数超过一百万。现在德国无产阶级的鲜血流成了广阔纵深的大河。现在更应当提出一个问题：和这种无数的牺牲比较起来，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向德奥帝国主义者所发动的“可耻的战争”坚决宣布英勇的无产阶级的战争而使自已受到的那些光荣的损失，又算得了什么呢？

三

“Je déteste la guerre, elle gâte les armées”！我们的德国同志们害怕坚决地“以战争反对战争”会使他们自己的队伍受到损失，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一切都可以用这个原因来说明吗？其实，问题的提法应该这样：为什么我们的德国同志们要决心坚决地“以战争反对战争”会使他们的队伍受到损失呢？是不是仅仅因为这种战争需要他们流血牺牲，而且会使人“用法律的名义”解散他们的组织呢？

不是的！还有另一个原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集团甚至决心极大多数有组织的德国工人会拒绝参加坚决的反对战争的战争。这种决心（这是和害怕对流血牺牲和解散组织有关系的）可以充分说明他们为什么放弃以战反战的任何思想，以及为什么不仅由于恐惧而且出于良心而决定积极参加同俄国、法国，首先是同比利时的战争。他们替这个决定辩护的理由是，德国无产阶级不能不参加同俄国反动派的斗争。这个理由的价值是多么微不足道，可以从社会民主党的《Hamburger Echo》^②的下列议论中明白地看出来。

这家报纸说，同俄国反动派的斗争绝对值得重视；但是不能

① 摩洛，古代腓尼基各国以活烧儿童为祭的太阳神（见旧约《利未记》第二十章），后来比喻为惨无人道的屠杀暴力。——译者注

② 《汉堡回声报》。——译者注

为了像推翻別国的反动势力这样一种政治意識形态的 (politisch ideologische) 目的而号召德国无产阶级进行战争：“对我们說来，我們德国同胞 (unserer deutschen Volksgenossen) 的鮮血是万分珍貴的。‘反对莫斯科人’的口号可以使这次战争引起我們更多的同情，不过不能使它变成合法的。”

德国同胞的鮮血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說来，永远是非常珍貴的，所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甚至在德国国内也总是千方百計地避免用坚决的行动来反对政治上的旧残余 (例如在普魯士)。因此，只有十分天真的人才会重視同俄国反动派进行斗争的理由。^①

稍許困难些的是评价民族自卫的理由的真正意义。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这个最后的理由时引证了倍倍尔的話，也引证了李卜克内西的話。

他們两人过去的确不止一次地断然宣布說，社会民主党在道义上必須保卫自己的祖国。著名的多美拉·紐文葛斯 (他后来順利地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因而称他們为社会爱国派^② (例如在苏黎世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但是，那些力图替德国社会民主党当前的行为辯护的人，有没有权利援引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范例呢？

半点权利都沒有！我不願重复地指出，不管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社会爱国主义”多么厉害，他們两人在 1870 年还是拒絕投票贊成軍事撥款。我暫且假定，这个情况沒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可能是由于当时的一些暂时性的条件决定的 (例如像伯恩施坦所設想的，由于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党当时是“小党”)。我要指出的是另外一点。

① 早在去年 8 月 3 日的一份《Leipziger Volkszeitung》(《萊比錫人民报》。——譯者注) 上，就揭露了好战党开始利用的这类空話的虛伪性。參看 1914 年 8 月 27 日倫敦的《Justice》(《正义报》。——譯者注)。——著者注

② 那些警惕性很高而且在战争問題上与我樹敌的人也是这样責备我的，請他們注意一下这个情况。——著者注

在德国党的爱尔弗特代表大会上（这时这个党实在已经是够大的了），李卜克内西曾經受到一些所謂“青年派”的攻击，他們責备李卜克内西有沙文主义情緒。請看，李卜克内西是怎样答复他們的攻击的：

“有人說我说过，如果我們受到攻击，如果为了反击敌人必需战斗，那么我們就准备保卫祖国。我的确不止一次地作过这种声明；这是不言自明的，我們每一个人都会这样行动……难道我們本身的利益不会驅使我們赶走任何侵犯我們国家的人，就像我們把闖进我們家园的强盜赶出去一样（不可饒恕的社会爱国主义！无法理解的是，我們这些‘拯救国际’的蒙昧主义者为什么至今还没有使李卜克内西遺臭万年。——格·普·）。不过我总是給自己的这一声明加上一个附带条件，即战争应当是必要的、正义的。并非任何形式上的防御战实际上都是必要的、正义的。表面上防御实质上进攻的人不在少数。”^①

没有一个真理不可以用来进行詭辯。李卜克内西懂得这个道理，他曾經警告自己的听众，說可能濫用民族自卫的概念。而且他用这样一句話把自己的思想說得更明白：如果我們的祖国受到攻击，或者換言之，如果我們的祖国进行的是必要的、正义的战争，我們在道义上就必須保卫它。而李卜克内西的这个思想，在德国同志中間，至少是有一些人懂得的，因为他們現在企图举它作例來說明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我在上文指出的《Hamburger Echo》上的那篇論文直接地說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之参加当前的战争，只能有这样一条合法的理由：即这次战争具有防御的性质，它是为了国家的生存本身（für unsere bedrohte Existenz）而进行的。

自然，这是一条完全不可靠的“合法理由”，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 Parteivorstand 先前就努力向我們說明过“可耻的战争”的起

^① 手头没有爱尔弗特代表大会的記錄，引文根据埃·米洛同志的《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 allemande》（《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譯者注）一书，巴黎1903年，第269頁。——著者注

源和真正性质，說这次战争是由于奥国統治者貪权的欲望和帝国主义发财的渴念而爆发的。如果战争一經宣布之后，立即由可耻的战争忽而变成防御的正义战争，則十分明显的是，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战争的性质，而在于这样一些“盘算”：公爵在选择未婚妻的时候，以及（如果相信伯恩施坦的話）社会党这个大党……在議會中进行投票的时候，应当使自己的良心服从于这些盘算。

同志，請注意：当比利时还没有受到德国方面的攻击的时候，战争被认为是可耻的，而在德国政府用最卑鄙无耻的手段蹂躏了比利时人民的权利以后，战争却說成是正义的防御战（參看哈阿茲在8月4日德国国会會議上的演說）。哈阿茲同志竟认为可以用国际承认的每一个民族都有生存权利这个道理来替德国政府的行动作辯护……

大家知道，伪善是使美德变成恶行的第一步。《Hamburger Echo》和哈阿茲同志力图用所謂战争的防御性（就德国而言）当作德国社会民主党当前行为的一条“合法的理由”，于是他們认为，有觉悟的无产者可以甚至必須积极参加的战争只是防御战。而在这里，他們是完全正确的。

四

有人写信告訴我，說我的一位論敌（最“知名的”一位！）在日內瓦俄国侨民的一次會議上发表关于战争的“学术演讲”时喊道：在战争影响下，老唯物主义者普列汉諾夫变成了唯心主义者；他現在在向道德和正义的法則求救。“就人性說”，我不願意設想，我的这位“知名的”論敌已經彻底地变成了一个蒙昧主义者（借用歌德的意思）。我假定人們还不致这样来看他。但是無論怎么样，事实却是：作为唯物主义者，我在討論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策的时候，要考虑到道德和正义，而且我认为，对我们馬克思主义者說来，絕對不可能不考虑它們。

馬克思写的第一国际的第一篇宣言，就已經警告工人，要他

們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和監視政府的外交活动。必要时工人应当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反对这些活动。如果工人无法防止这种或那种外交上的意外事件，那么他們应当團結一致，同时地和公开地向这些事件提出抗議。接着宣言說道，决定个人相互关系的道德和正义的簡單法則，也应当成为决定民族相互关系的最高法律。

非常明显，宣言的作者希望，他关于正义和道德的这个指示，是他号召工人團結起来的結尾詞。

在宣言的最后几行中，我們讀到：“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爭取工人階級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卢那察尔斯基^①在一篇日內瓦通訊中轉述了自己同罗曼·罗兰的一次談話，他报道說，这位名作家向他指出了社会主义宣傳的一个缺点，即：

“我觉得，人类某些绝对先进的集团对正义的概念和法律情感的意义估价不足。工人階級常常接受这样一种思想：涉及工人階級的种种問題，都会被組織力量所解决，而且仅仅是这样。有人以为，有組織的、團結在自己利益的旗帜周圍的、不想求助于各种正义的陈旧意識形态的群众，过去或现在都是根本改革人类生活的某种充分的基础……我以为……力求否定和冲淡社会問題的倫理方面的那些人，犯了很大的过錯。”^②

如果罗曼·罗兰更好地讀过現代社会主义文献的話，他就会懂得，既不能責备唯物主义者馬克思犯了他所指出的那种严重的过錯，也不能責备正确地理解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馬克思的那些继承人，說他們犯了他所指出的那种严重的錯誤。也許罗曼·罗兰会补充說，社会問題的倫理方面，事实上正是被口头上对所謂馬

^① 原文是 Г. А. Луначарский，当为 А. Н. Луначарский 之誤；請參見本书第 86 頁。——譯者注

^② 《基輔思想報》，1915 年 3 月 14 日第 73 号。——著者注

克思主义者不注意“道德因素”感到悲伤的那些假社会主义的“馬克思的批評家”所否定和冲淡。

光只凭馬克思是国际的一位奠基人來說，他就不可能忽視这个“因素”。

馬克思写的国际規章，确定了工人运动的偉大目的（即无产阶级的經濟解放），任何政治运动都应当作为手段而从属于这个目的。規章說道：“工人力求达到这个目的的一切尝试，至今仍然是不成功的，因为在每一个国家里，不同劳动部門的工人之間团結得不够，而且各国工人之間也沒有一种友好的同盟。”①……

同时“工人的解放不是仅仅地方的或者民族的任务，而是相反，它涉及所有文明民族的利益，只有通过他們理論上和实践上的互相帮助，工人才能获得解放。”②

不过，为了使这种互助成为可能；为了在实际生活中，——而不光是在善良的願望中，——成立世界各国工人的兄弟同盟，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必須承认那些“道德和正义的簡單法則”，这些法則是国际的第一篇宣言在結尾的时候意味深长地提到的。

您知道，我不是康德主义者，我也不爱拿康德的話作凭据。不过当話題碰到道德和正义的簡單法則的时候，有时竟不能不想到《实践理性批判》的作者。

康德說：“在一切創造物中，凡是合乎需要的以及合乎某种需要的东西，只有作为手段来看才有意义；而人……是自在目的，正是人才是道德法則的主体，这个主体是神圣的，因为他有自由的自律。就是由于这个道理……每一个人都限制自己固有的、以他本身为目的的意志，使之适应理性存在物的自律的种种条件，这就是

① 参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363頁。——譯者注

② 早在1848年初，《共产党宣言》就已經指出了这一点：“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努力，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参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488頁。——譯者注）——著者注

說，他不会使意志从屬於不符合主体本身的意志所能产生的法則的任何目的；所以，这个主体絕對不会把意志当作手段使用，而永远要把它看成是目的。”①

这就是現代文明人类逐漸进步到加以承認的道德法則。这法則首先說明，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使自己摆脱资本家（他們都鄙視工人，不把工人当作自身目的，而是当作手段）的桎梏而解放出来的斗争是正当的。同时，这法則本身也包括“无产阶级对外政策”的基本規則。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应该被另一些民族当作手段看待；每一个民族都应该当作自身目的。換句話說：每一个民族都有自決的权利。

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最高尚的思想家②的嘴宣布了这条道德法則，而在实践上却經常加以破坏。资产阶级切身的經濟利益驅使自己破坏这一法則。反之，无产阶级切身的經濟利益則驅使自己承认这个道德法則。这不仅是因为对于无产阶级說來，自己从资本家的桎梏下获得解放意味着不再受人鄙視，被人当作手段，而且也因为无产阶级如果不承认每一个民族都有自決权，它就不可能从资本家的桎梏下解放自己。全世界的无产者为了扔掉这个桎梏，必須联合起来，这种联合只有在无产者承认每一个个别民族都有自決权的条件下，才会是可能的。国际无产阶级承认这个权利乃是社会主义革命——心理上的和政治上的——必要的先決的条件。反过來說，当这种权利不为国际无产阶级所承认的时候，无产阶级本身就不会作为一支有觉悟的国际力量而存在，于是每一个个别国家的工人在对外政策中就会跟着资产阶级走，于是民族和民族的关系就会是狼和狼的关系！

① 《实践理性批判》，恩·姆·索科洛夫的譯本，彼得堡，1897年，第105頁。（中譯文參看《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館1960年版，第89頁。——譯者注）——着重点是原有的。——著者注

② 这些高尚的思想家的活动，属于资产阶级为自己的解放而进行斗争的时期。——著者注

德国的教授們和讲师們喜欢作“康德和馬克思”这种题目的“讲演”。但是他們中間誰也沒有作过，关于現代社会的經濟学是怎样把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的对外政策”同康德的道德律結合起来的讲演。大概罗曼·罗兰对这个結合的命定的必然性心里也沒有数！

只有抱着自觉的国际无产阶级观点的人，才有权利对自己說：“我是人，而任何合乎人性的东西我都不見外。”^① 只有在这样的人心目中，“祖国”的概念才不会排斥“人类”的概念。

現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們說：“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把这句话意譯出来就是：“我的国家对也罢，不对也罢，我都同它一起走。”彻底的无产阶级思想家們发现，这太狭隘了。他們珍重自己国家的利益，却不因此而牺牲人类的利益。所以李卜克内西也說，如果自己的祖国进行正义战争，即如果自己的祖国在保卫自己的权利，而不是破坏别人的权利，他就会手执武器保卫它。他这句话表明了他忠于国际的遺訓：即严格地区別一个民族的自卫和这个民族对別一民族的进攻。^②

現时，在某些社会主义团体中出現一种輕視这种区別的傾向。不久以前英国“独立工党”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作出了这样的決議：

“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应当达成協議，从今以后，社会主义的政党都将拒絕支持任何战争，无论这战争的外在性质怎么样，即使

① 古罗马格言，語出罗马作家铁列修斯的喜剧《自我折磨者》。——譯者注

② 例如在馬克思写的1870年7月23日的总委员会宣言中就作了这种区别（Die International von G. Iaeck [埃克所著《国际史》。——譯者注]第101頁）。这种区别在同年9月5日爱森納赫党勃朗施威格 Ausschuss（委员会。——譯者注）宣言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埃克，上引书，第102頁）这篇宣言也是出自馬克思的手笔。——著者注

名义上是防御战也罢。”①

这个說法很含混。要是战争不仅“在名义上”是防御的呢？沒有答案。大会主席乔威特的发言使人有理由认为，社会主义者参加防御战，实质上是独立工党所贊同的。另一方面，可能认为，这个党的某些党员在任何場合下也“不会接受”战争。显然，欧洲大陆某些正在嚷嚷說独立工党比其他所有的党都更牢固地坚持着国际遺訓的“反爱国派”，正是指的这些党员。

我在前文既已談到，国际是怎样对待（真正的）防御战的，就无需乎再說，绝对不参加战争的独立工党党员，并没有拯救国际的遺訓，却是在背叛它。他們很少接近馬克思的观点，倒是无比接近于列·托尔斯泰的观点。

托尔斯泰曾經硬要人相信，即使苏魯人当着他的面杀死了他的孩子，他也不会用暴力反抗罪恶。托尔斯泰一概否定了暴力和战争。但是，社会主义者应不应该效法托尔斯泰的榜样呢？That is the question（問題就在这里。——譯者注）。②

其实，quand même③不是托尔斯泰一人否定了战争。在苏黎世国际代表大会上，多美拉·紐文葛斯曾經要求，一旦发生战争，有关各国的社会党人就宣布軍事罢工。作为軍事委员会的报告人，我坚决地否定了多美拉的建議。我要在这里引述我的許多理由中的一条理由。

我说过：請想一想，两国間爆发了战争，其中一国社会党的影响很大，另一国則很小。如果社会党人真的发动軍事罢工，結果会怎样呢？社会党人的势力很大的那个国家的力量就会被消灭。相

① 《巴黎新聞》，第 212 期。——著者注

② 順便說說，英国的馬克思主义者长期以来經常地責备独立工党，說它不接受階級斗争。弄清它現在是否接受階級斗争，一定很有興味。我耽心，大陆上这些以自己的急进主义自豪的吹牛家，还没有发现在这个問題上必須对付一下独立工党。——著者注

③ 終究。——譯者注

反，社会党人的势力很小的那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仍然原封未动。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后面这个国家就会取得胜利^①。

我曾經問过“极左的”“独立工党”党员：社会党力量很小的国家战胜社会党力量很大的国家，对于国际社会主义事业來說，始終是有利的嗎？我以为远不是始終有利的。然而如果不是始終有利的，則举行軍事罢工的社会党人不会有陷入那么一种人的难堪境地的危險嗎：这种人本来要到这个房間，結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間。他們不会有給予他們本来要与之斗争的那个軍国主义以巨大的、不可代替的效劳的危險嗎？

我們应当起来反对民族对民族的剝削，就像我們起来反对統治階級对劳动群众的剝削一样。

剝削者要压迫，所以要进攻；被剝削者力求使自己从压迫下解放出来，所以要防御。

怎么会区别不出自卫和进攻呢？

費尔巴哈說过：«Vulgus non distinguit.»^②我劝我的論敌們經常回想一下德国唯物主义者的这句话。

进一步說，社会主义政党的力量很强大的那个国家的失败，一般說对国际社会主义并没有好处。但是有一个条件，在这个条件下，全世界的社会党人都絕對应当欢迎这个国家在軍事上失利：即如果战争是这个国家发动的，其目的在于控制和剝削經濟上較不发达的一个（或一些）国家的話。

我們大家（当然除开少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都希望英国在和布尔人的战争中失败。我們中間誰（仍然有上面这个除外）也絕不希望資本主义各国在同其殖民地土著人民的軍事冲突中获胜。我們沒有学費尔巴哈的 vulgus^③ 的榜样。我們区

① 參看我的文章«La question militaire au congrès de Zurich»（《苏黎世代表大会上的軍事問題》。——譯者注），載 1893 年秋季某期的巴黎 «ère Nouvelle»（《新世紀》。——譯者注）——我記不得具体是哪一期了。——著者注

② “无知者不作区别”。——譯者注

③ 无知者。——譯者注

別對待。

六

現在我再來談談您的信，H—HOB 同志。

由某个涅夫斯基主办的、在美国出版的俄文《新世界报》，非常痛心地告訴自己的讀者，說我犯了一个不可饒恕的錯誤。據說我“忘記了或者不懂得，資本主義在其發展的一定階段上，不可能安于它本身在其歷史黎明期所建立的國界，而要追求世界統治權，同時現代國家(無論是三個同盟國家[現在是兩個]也罷，或者是三個協約國家也罷，反正一樣)所進行的戰爭，乃是帝國主義戰爭。”^①

這份傷心的報紙像 *Vulgus* 一樣 *non distinguit*。它深信在帝國主義戰爭中既沒有正義，又沒有罪過。我沒有答復這個一知半解的小報的胡言亂語。不過 H—HOB 同志，您的信證明您善於思考。所以當我在信中突然碰到奇怪的邏輯錯誤時，我特別感到驚訝。

您引用我的小冊子的一句話，這句話說，俄國敗於德國會使我們的一切解放意向的泉源涸竭起來，因為它會延緩我國的經濟發展。

您把這句話同路·弗朗克的那個我敘述過的思想加以對照：弗朗克認為，德國的勝利在經濟方面會給德國帶來利益。於是您振振有詞地假定，在這里我同弗朗克的意見是一致的，接着您推論說：

“如果情況屬實，則只要一分鐘忘記道德和正義的問題，只要一分鐘放棄國際的觀點，而採取民族的觀點，就會同意，每一個特定民族或國家的無產階級的利益在於帝國主義對自己國家的勝利。”在我看來，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連一分鐘也不可能離開國際觀點。同樣確定的是，我們任何一個瞬間也不能忘記道德和正義的問題。這是很重要的。不過我暫且把這個問題攔一攔。此刻對我

① 十二月份某一期上的巴黎通訊。——著者注

說来，要点不在这裡。

我任何时候也沒有說过，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在于俄国帝国主义的胜利，連想也沒有想过此事。我深信，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只在于一点：使俄国土地不变成德国帝国主义手中剥削的对象。而这个說法，您得同意，完全是另一种意思。

不久以前，一位很好地了解我的小册子的内容的法国文学家，写了一篇关于这本小册子的短評。在短評中，他虽然贊同我专门分析德国社会民主党当前的策略的几頁，但是指出，一当我开始确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时，我自己就轉而采取了我們过去的德国同志們的观点。

我很长一个时候鬧不清，什么怪物使得我的这个法国批評家产生这样的想法。

要知道，在我的小册子中（这小册子的原文他是很了解的）直接声称，如果我的祖国受到攻击，我就同情它，而如果它在进攻，我就不同情它。

但是后来我弄清了我的这位可敬的批評家的錯誤的根源何在。

他是一个有教养、也有自由思想的人。但他不是馬克思主义者。他不习惯于使用我們的概念和我們的術語。对他說来，更习惯得更多的是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运动以前的那些解放运动有关联的一些概念和名詞。然而，和自觉的无产阶级斗争以前的各种解放运动有关联的那些概念和名詞，正像您所知道的一样，是具有明显的唯心主义色彩的。不言而喻，社会运动随时随地都有其经济基础。不过在以前，最先进的人們並沒有好好地意識到解放运动的这个经济基础，在这方面，他們常常比較为落后的人还无远見。^①当时，先进的人們似乎觉得，如果他們参加自己时代的解放

① 例如，可以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和基佐的观点比較一下。不过这会使我离題太远。（參看我为《共产党宣言》拙譯第2版写的序言）。——著者注

运动，那完全不是由于某种经济利益，而仅仅是为了保卫真理和正义。誰要跟他們談起经济，他們就认为这个人“是粗鄙的唯物主义者”。他們不願意，而且也不善于区别被他們怀疑为“粗鄙的唯物主义”的那些人所說的究竟是哪一种经济利益：是剝削者的利益呢，还是被剝削者的利益。依他們看来，这其实都是半斤八两。在他們习惯的概念世界中，为经济利益而斗争，同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是沒法湊到一块的。这倒說明着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甚至有很不少的人，对社会幸福虽然充滿着最高尚的意願，但是当他們还保持旧有的唯心主义概念，当他們还不善于把经济同正义联系起来的时候，他們就不贊成现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綱領。只有掌握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人，才会对现代的社会主義有正确的理解。

無論我的法国批評家怎么有才能，無論他怎么学有专长，我都没有理由认为他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因此我不应当对他把我的观点和已故的路·弗朗克的观点等量齐观一事感到惊讶。他的議論根本不和我們馬克思主义者的議論一样（假如我們的思想是彻底的）。他听說，我和路·弗朗克一样，也談到自己国家经济发展的条件，于是断定，我和这位已故的人是一丘之貉。我現在才看清，这对他是理有固然的。

然而您是馬克思主义者，H—OB 同志。您怎么可以忽略（即便只是“一分钟”也罢）：剝削者的经济利益是一回事，而被剝削者的经济利益又是一回事呢？

莫非您以为，如果阶级对阶级的经济剝削是可能的，則国家对国家的经济剝削就屬於虛构之物么？

請允許我向您指出现代帝国主义的本性何在，以供参考。

七

“每一个健全的国家……都需要扩大疆土，这主要是因为人口过多和工业生产过剩。它应当絕對控制和它的幅員相适应的文化

不够发达的地区，以便把自己过剩的工业产品免税地和沒有竞争地送到那里去銷售，而且也便于它从那里免税地和廉价地取得原料。”

这是两年前一个奥地利的帝国主义分子写的，笔名是：“珈桑德爾”（珈桑德娜）。这个擅长預言的姑娘^①把自己的这条普遍性的理論原理应用于奥国时这样議論道：

“我們有极大的出口需要，但是我們沒有做任何一件工作使这种出口成为可能。”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措施呢？要好好地开发殖民地；而既然“已經不可能得到任何一个海外的殖民地”，則应当“在我們的大門口来安排对我們有利的前途。”而这个前途就在巴尔干。奥国有充分的可能統治巴尔干，也应当取得对巴尔干的統治权。如果它望着大塞爾維亞国在它的南部边界日漸成长而无所动心，它就犯了一个大錯誤。它应当用一切手段和一切力量准备战争。珈桑德娜号叫道：“把武器交到少年人手上，把老年人武装起来！連續不断地和雷厉風行地武装起来，不分昼夜地武装起来，这样，当决定的时刻来到时，就早有准备了！在我們还没有准备就绪，还不能高喊我們需要巴尔干、我們要占領巴尔干的时候，我們的政策应当是再遏制敌人两三年；誰要是擋住我們的去路，我們就叫他头破血流地滾回老家去！”^②

奥国人珈桑德娜对現代帝国主义的本性理解得不坏。她对現代帝国主义的看法，同我們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完全一致。您大概知道考茨基給帝国主义下的定义吧：

“帝国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愈来愈多地吞并或征服农业区域，而

① 希腊神話中特洛伊国王柏理亞的女儿叫珈桑德娜，她曾預言特洛伊的毁灭，因称为擅长預言的姑娘。——譯者注

② 珈桑德娜这篇文章的俄譯文登載在《外国軍事問題》杂志上，1914年3—4月号。其內容在1914年8—9月号的《每月杂志》上的亚·姆·的文章（《奥国人論奥国帝国主义的任务》）中有詳細的轉述。——著者注

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①

奥国当然不会考虑塞尔维亚人民的利益。它只服从自己的统治者的贪权欲和自己的帝国主义者的自私心。奥国胜利的目的完全在于奥国对塞尔维亚的剥削，它会延缓后者的经济发展。如果塞尔维亚劳动人民中的觉悟分子说：“我们将用一切力量保卫我们的国家，因为它的经济发展的延缓会对它的政治发展和一般文化发展的整个进程产生有害的反响”，那是完全自然的。任何听到这种说法的人，都没有权利断言，塞尔维亚人民中的觉悟分子本身已经转化到奥国帝国主义者的观点上去了。

再说一遍：力图进行剥削的人的观点，同力图使自己摆脱剥削的桎梏的人的观点，是直接对立的。这个道理，对于涅夫斯基也应当是明白的。

1912年巴塞尔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说道：

“奥地利、匈牙利、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社会民主党，应当用全部精力继续进行反对多瑙河沿岸的君主国之进攻塞尔维亚的斗争。他们的任务在于今后为反对这样一种计划而斗争：用武力剥夺塞尔维亚所得的战争果实，并把塞尔维亚变为奥地利的殖民地”等等。

巴塞尔决议也有奥匈帝国的代表签字。当这次战争发生时（也是由于这个奥匈帝国和德国才发生的），他们就忘记了巴塞尔的决议。不过我愿意设想，同志，您不会那么健忘。

我知道，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的议会代表拒绝投赞成军事拨款的票。但是，从这里绝不当得出结论说，我们的这些同志不会犯错误。他们的这种表决态度只有在在一个条件下才能承认是正确的：即如果这表示他们相信塞尔维亚国王政府没有能力保卫国家

^① 《Neue Zeit》（《新时代》。——译者注），第32卷，第2期，第909页。又请参考考茨基的小册子《Nationalstaat, imperialistischer Staat und Staatenbund》（《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同盟》。——译者注），纽伦堡，1915年。——著者注

不受奧地利的侵犯。假使他們用这种表決态度來說明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社会主义者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支持战争的話，那他們就大錯特錯了。

目前，正义在他們的祖国这方面。

但是，——我們的論敌們反复地說，——如果社会主义者保卫自己的国家，他就是和国内的統治階級同流合污。可怜的論据啊！如果拒絕保卫自己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就会削弱国家抵抗敌人的力量，这就是說，他在为进攻国的統治階級服务。

無論在哪一种場合下，同样都是罪恶。对于社会主义者說来，只有两害相权取其輕。

不言自明，就塞爾維亞社会党人而言，最小的罪恶是，在保卫祖国不受奧匈帝国非正义的进攻的事业中，同自己本国的統治階級实行合作。

也有人說到“大塞爾維亞爱国派的阴谋”。同志，您記得，在德国和奥国社会民主党的呼吁书中，即在关于备战的呼吁书中，“譴責”了这些“阴谋”。我同意，为了整个欧洲的和平的利益，可以譴責这些“阴谋”。但是現在，当战争已經在进行，这时就該記住，这些阴谋表現着塞爾維亞人民要求團結的意願，而我們社会党人在原則上應該同情这种意願，而不当加以譴責。还有人指出奥国大公的被杀。我任何时候都沒有做过恐怖主义者。但是我看不出，为什么我們应当对这个奧地利王位继承人的死亡感到痛心。

况且，現在誰不知道大公的被杀并非战争的原因，而只是宣战的借口呢？乔里蒂在意大利議會中曾大声疾呼地說，早在1913年，当大公完全健在的时候，奧匈帝国曾經探詢过：意大利是否会支持它策划的对塞爾維亞的进攻。意大利表示說不同意，理由是：根据三国同盟条約，它有义务支持奥国和德国进行防御战，却无义务支持它們进行进攻战。由此可以看到（我要順便指出），意大利政府的眼光比我們許多自己承认看不清哪方是进攻哪方是防御的同志們要敏銳得多。唉，盲目真是一大缺点！

德国是站在奥匈帝国一边的，因为德国要在土耳其，而特别是在小亚細亚取得經濟上的統治地位。塞爾維亞是它达到这个目的的道路上的一个障碍。德国帝国主义者需要（直接地或間接地）控制那一段橫貫塞爾維亞的柏林—巴格達铁路。只要看一看巴尔干半島的地图，就可以充分了解当前的战争由何而起。的确，如果俄国不奋起保卫塞爾維亞，也还是不会有全欧战争。从欧洲文明的总的利益出发，或許最好是俄国不来多事。但是这种純粹出于实利的考虑，不应当蒙蔽住我們的理智。伯恩施坦在自己的小册子中說道：“Was Russland für Serbien verlangte deckte sich so ziemlich mit den Forderungen der Internationale der Sozialdemokratie”。（俄国为塞爾維亞提出的要求，和社会民主党国际的要求，几乎是完全一致的。）^① 这种說法最正确不过了。俄国要求有国际仲裁法庭，这几乎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全部綱領的要求。而塞爾維亞也表示完全准备服从这个法庭。同时伯恩施坦补充說，当两个人說同样話的时候，这并不是一个意思。又說对了：不是一个意思。因为說話者本身就不是同一个人。但是，在上述場合下，这个說法能有怎样的意义呢？俄罗斯帝国和社会民主党国际当然不是一回事。但是难道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跟社会民主党国际又是一回事嗎？只有瘋子才会設想，我們现在是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过，国际仲裁法庭的要求到底記載在社会民主党国际的最低綱領中，換句話說，到底这种要求是社会民主党国际向現代社会提出的。如果这种說法是对的，那么社会民主党国际就有义务支持“俄国为塞爾維亞提出的要求”。

八

这里我們再回过头来开始讲那些一再重复过的老話：同沙皇制度作斗争，俄国对欧洲的危险，諸如此类。

^① 《工人阶级国际和欧洲战争》，第 15 頁。——著者注

我們已經知道，正是最有威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包括那些在《Hamburger Echo》上搖筆杆的人在內）自己不承認同沙皇制度作鬥爭的理由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至於說到歐洲，則現代的德国工业帝国主义現時對歐洲所構成的危險，比起老大腐敗的俄国帝国主义來要大得無比。奧地利開始動搖。它同塞爾維亞的爭端交給仲裁法庭去決定已經成為可能。不要和平的德国於是急忙向俄国宣戰。從此就發生了我們中間誰也意料不到的事。我們的德国同志們像法國小歌劇中的馬槍手一樣對自己說：c'est le moment de nous montrer, cachons nous!（該我們露面的時候，就得躲起來！）於是他們在宣布帝国主义的發財欲望所引起的可耻的戰爭是保衛德国人民生存的正义鬥爭以後，就躲起來了。有各式各樣的生存。凶惡的強盜的生存不同於和平的人們的生存。而德国所扮演的正是凶惡的強盜的腳色。

恩格斯當年在談到德国資產者時曾經說過：“Sie sind zu spät gekommen.”^①。在他口里，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德国中等階級沒有能力把自己的同容克地主階級的政治鬥爭進行到底。這是正確的。這種鬥爭的結局是容克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妥協。在經濟政策領域內，這種妥協就是符合容克地主利益的對農產品的保護關稅，以及為保障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建立的對加工工業產品的保護關稅！保護關稅制度的理論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曾經證明，這種制度是國家發展生產力所必需的，但只是暫時必需的。當生產力達到一定高度，則改行自由貿易就是有益的和必要的了。現代德国的“工業艦長”則用另一種態度對待保護關稅制度。德国的生產力現在上升到了很高的水平。聯合為企業主辛迪加的“艦長們”聽也不願意聽到廢除保護關稅率的話。他們首先利用這種稅率來保護德国國內市場不受外國的競爭，其次則在這種稅率的掩護下奪取國外市場。大家知道，事實就是如此。保護關稅率一方面削弱國

① “它來得太遲了”。普列漢諾夫引証的這句話，出自恩格斯的《德国農民戰爭》一書序言，不過文字有改動。——譯者注

內市場上外国的竞争，同时又使辛迪加們有可能在国外用比在德國本土更便宜得多的价格出售德國商品。用和平的方法夺取国外市場的过程就是这样进行的。但是，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增长得如此迅速，以致用和平的方法夺取国外市場有时就滿足不了它們的銷售需要。于是就产生考茨基和奧国人珈桑德娜指出的那种企图：即先进的工业国家企图用武力保障自己在这些或那些农业区域的經濟上的优势影响。

这种企图后来更是加强了，因为按其固有的本性說来比工业資本更要大大富于冒险性的財政資本，現在在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中，正在取得主导地位。

社会主义者倫敦代表會議的決議說，正在进行着的战争的责任，要由欧洲所有的政府来負，因为它们們全都实行了帝国主义政策。这是对的。所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都犯了最新一种的帝国主义的过错。但是在这里也应当区别对待。如果有人以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会同等地采取暴力，那就錯誤了。不，它們中間在这里是有不小的差别的。也許連涅夫斯基先生也曾听到过，例如，英国帝国主义和德国帝国主义在这方面就有很大的不同。不用說，英国所屬的地区比德国“铁騎”发展“文化”的地区，要享有更大得多的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而德帝国主义一般也比英帝国主义要驕武得多。这自然不是由于德国的种族特性，而是决定于这样一种简单的历史情况：德国资本主义“来得太迟了”。您記得奧国人珈桑德娜的話吧，她說：“地球上已經沒有自由的土地了；因此我們应当占領巴尔干，誰要是想阻止这样做，就叫他头破血流。”

但是，如果說德国帝国主义比其他任何帝国主义都更好战，則很明显，它就比其他任何帝国主义都更威胁欧洲的和平。很遺憾，倫敦代表會議沒有在自己的決議中指出这点。

欧洲无产阶级的利益在于保持和平。因此对于究竟哪一个国家比其他国家有更大的和更經常的破坏和平的危險問題，它不能再以为是无所謂的了。当威胁已成现实，当这个或另一个国家服

从于自己帝国主义者的自私要求而开始战争的时候，全世界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愤怒就应当对准这个国家。

同志，我們都知道，究竟哪一个国家是和平的破坏者：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 Vorstand 已經对我们作了透辟的解释。不过您也许仍然沒有全面地考虑“同盟国”即法俄英等国失败会引起的那些经济后果和政治后果。

德国宰相在同大不列颠王国駐柏林公使郭申谈话时，希望推动英国保持中立，他要郭申相信，德国沒有从法国方面取得领土的意思。郭申問道，德国是否认为可能夺取法国的殖民地呢？对于这个问题，宰相的答复是閃爍其詞的，以便給自己留下行动的自由。

这也是很清楚的：因为夺取法国的殖民地已經在德国的计划之中。但是，同貝特曼·霍尔威克向郭申所說的話相反，在涉及法国的时候，这些计划竟比夺取法国的殖民地要广泛得无法比拟。去年九月，当德国人坚信自己会胜利时，他们就准备强迫法国接受下列的和平条件：

法国把自己的全部殖民地让給德国，包括摩洛哥、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它再把自己在欧洲的四分之一以上的有一千五百万以上人口的领土让給德国；它付給德国一百亿金法郎；它同德国締結一項貿易协定，根据协定，在二十五年的期間內，德国商品免稅地輸入法国領土，但是法国对德国方面却得不到同样的权利；二十五年以后，1871 年的法蘭克福貿易协定生效；在二十五年的期間內，法国停止征召公民服兵役；法国拆毀自己的全部要塞；它送給德国三百万枝枪、三千門炮和四万匹馬；在二十五年的期間內，德国在法国享有专利权（不是互利的）；法国撕毀自己同英国和俄国的盟約，而跟德国締結二十五年的同盟。^①

如果貪婪的德国豺狼們的这个计划得以实现，那就只好喟然叹道：

^① 參看論文《Il problema della Pall》（《派尔問題》。——譯者注），載《Il Secolo》（《世紀》。——譯者注），第 19 期，1915 年 4 月 28 日。——著者注

Finis Galliae!①

当德国給法国安排了這個下場的时候，同志，您怎么会以为法国社会党人可能拒絕保卫自己的国家！我們那些不願意承认盖得和桑巴参加內閣的蒙昧主义者們，难道不是在犯反对每一个民族都有生存的权利②的不可饒恕的罪过嗎？他們的言論难道不是荒謬的和有罪的胡說嗎？

蒙昧主义者們千方百計地傳播着(某种色彩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这个思想：即认为任何一个資本主义国家的失败，只会对該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有害的影响。又是胡說！如果德国豺狼們吞并了法兰西共和国，則因之受苦最多的还是法国的劳动人民。法国的有产者，——更确切点說，法国的資本家，——是善于适应德国人的控制的。大家知道，就在战前，很大一部分法国資本是在德国企业中使用的。③

自然，您会假定，归并于德国的那一部分法国領土上的居民，按照整个文明世界所建立的慣例，至少仍然会有财产权。您錯啦。德国帝国主义者所追求的“偉大目标”的一个組成部分，就是使居住在从德国所战胜的国家那里夺取来的領土上的居民失去土地。④好心的德国人发现，实现了这个天才的計劃，法国甚至还会得到好处，因为由于它让与德国的那些省份上的居民流入法国，法

① 高卢完蛋了。——譯者注

② 这个权利是我們的綱領承认了的。——著者注

③ 參看 Lysis: «Les capitalistes français contre la France» (利西斯:《法国資本家反对法国》。——譯者注)及其:«Contre l'oligarchie financière en France»(《反对法国的财政寡头政治》。——譯者注)。——著者注

④ “Das ist das grosse Ziel: nicht lediglich eine Kriegsentschädigung um Bargeld, sondern vornehmlich eine Kriegsentschädigung auch in Landeigentum!” (“这个偉大的目标就是：不仅要有現款作为战費賠償，尤其要有地产作为战費賠償！”——譯者注)(參看 Arthur Dix 的小册子《Der Weltwirtschaftskrieg》(《世界經濟战争》。——譯者注)，第 35 頁，收在丛书《Zwischen Krieg und Frieden》(《战和之間》。——譯者注)中，并有 Georg Irmer, Karl Lamprecht [] 和 T. von List [] 的贊詞)。——著者注

国的人口将变得稠密起来。

至于說到我們俄国人，那么德国帝国主义者很容易記得，移民到新地区在我們祖国的內政史上曾經起了多么巨大的作用。德国战胜俄国以后，就会吞并俄国的波兰，波兰的居民就会迁到俄国去。而俄国就会把自己的若干个省騰出来安置从波兰驅逐出来的波兰人。由于剛剛提到的俄国人向新地区移民的习惯，这种事情对俄国是不会困难的。①

很有趣味的是：按照这个計劃，德国絕對不会因为它把自己在西方和东方所侵占的全部地区上的居民的土地加以剝夺而受到 odium^②。这桩卑鄙的事情应由战敗国在它們恩受和平的福利以前自己去完成。就是說，俄国让与德国的不会是波兰，而是相当辽闊的无人区，这地区先前是波兰人住着，現在則通过俄国人的手为德国征服者之移居該地作了准备。

Finis Poloniae!^③

用不着猜测，我們的寬宏大量的胜利者会賜給我們多么了不起的貿易协定。通过上面关于同法国的条約方案所說的那些內容，您可以很容易地設想出来。

韃靼人的压制延緩了我国經濟的发展，因之也延緩了我国整个文化发展。这种压制产生了我国的政治制度。德国的胜利会阻止我們的經濟发展，阻撓俄国的欧洲化，并使得这个陈腐的制度永远存在。

为了使这个陈腐的制度永远存在，只要跟德国締結胜利者強迫我們接受的那个政治同盟就行了。

Finis Rutheniae!^④

俄国完蛋了！整个俄国，这个曾經劳动和思想、受苦和为更好

① Dix: 《Der Weltwirtschaftskrieg》, 第 33—41 頁。——著者注

② 敌視。——譯者注

③ 波兰完蛋了！——譯者注

④ 俄国完蛋了！——譯者注

的未来而斗争的俄国，——同叛变者、蹂躏者和反动派进行过斗争的俄国。

而我們的蒙昧主义者还在希望我对这种前途熟視无睹？他們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还不曾去为德国帝国主义豺狼們服务；我还没有参加过“乌克兰解放同盟”。俄罗斯是属于自己的劳动人民的。誰珍視这个人民的利益，誰就不可能对俄国的命运漠然置之。

九

“我們不要保卫自己的国家不受德国的侵犯，而要在現今千鈞一发的时刻来一个革命！”

我的某些論敌这样說。但是革命要以社会关系的革命化为前提。这是整整一个过程。

战争有时是革命之母。但是每当在战争的苦难中产生革命的时候，革命总是人民对他們的政府保卫国家抵抗敌人的能力感到絕望的产物。人民希望反击外国的敌人，这种意願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而那些假革命家却使自己的宣傳方向反其道而行，他們的不幸就在这里！他們的一切努力早就注定要遭到可耻的和（还要坏些）完全应得的失敗。

德国帝国主义的豺狼們讲的話是这样的恬不知耻，甚至連最……穩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也絕不可能跟它走。例如，謝德曼就不同意帕阿什的話。他暗示說，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內的同道們不希望用暴力吞并領土。这可能也是事实。但是在这里，重复一下伯恩施坦的話是特別适宜的：当两个人說同样的話的时候，这并不是一个意思。当我听到謝德曼同志“热烈地”否定用暴力吞并領土的思想时，我对自己說：“他是在耽心亚尔薩斯和洛林将归并于法国。比利时的命运和德国人占領的俄屬波兰各省的命运，謝德曼同志大概不会很关心的。”^①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有一部分人天眞地确信，亚尔薩斯和洛林的居民希望仍然加入德国国籍。这还是在大家记忆犹新的薩比林騷动以后哩！——著者注

即算关心过吧，此中有益的东西也不会很多。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宁愿帮助放出凶残的野兽来反对我們的那些人。他們现在却鎮靜地和慷慨地对我們說：“相信吧，我們不希望它来咬你們”。但是既然如此，干嗎要把它从兽檻里放出来呢？

同时問題不仅在于暴力吞并。正如《L'Humanité》^①报道的，臭名远揚的休特古姆在发言反对領土吞并时指出，德国可以用貿易协定来犒劳自己。实話总归是实話。十二分的可以。Et cela promet^②……

說来可耻，不說又是罪过：許多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都沾染了帝国主义的精神。請想想休特古姆的行为，或者讀讀哈尼施、連施和庫諾的小册子。最后这个人值得給以最大的注意。庫諾不仅是受过教育的人，而且简直是一个博学的人。他在人种学領域中成功地运用了馬克思的方法，而且一般說来也是一个彻底的馬克思主义者。可是現在这个博学的和彻底的馬克思主义者却引证历史必然性来证明，^③只有空想主义者才能起来反对帝国主义；馬克思主义者則应当利用帝国主义来謀工人階級的利益。这意思就是說：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反对德国为了达到从經濟上剝削某一些国家的目的而用这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使这些国家服从自己；而在这种条件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就会使德国工人分得一部分战利品。

这使我回到您的信上来。您从我的小册子得出結論說，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利益都在于帝国主义的胜利，这是錯誤的。但是，就德国无产阶级以及部分說来奥匈帝国的无产阶级会从帝国主义的胜利中取得一定的好处而言，您是对的。于是您大概要产生一个問題：馬克思沒有錯么？第二国际的破产难道不同时就是

① 《人道报》。——譯者注

② 也是很應該的。——譯者注

③ 參看他的小册子：《Parteizusammenbruch》（《党的破产》。——譯者注）和他同考茨基就这本小册子而在《Neue Zeit》上进行的論战。——著者注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破产，或者至少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破产么？

馬克思的敌人們将要說（而且确实是在說）：“当然是的”。——卫·車尔諾夫怎么写的呢？他写道：收起馬克思吧，开放米哈依洛夫斯基吧，不妨把卫·車尔諾夫也一起开放，因为死者总归过时的了。

但是梦是可怕的，而神是仁慈的：沒有米哈依洛夫斯基我們会过得去，沒有卫·車尔諾夫，我們也会过得去——而且过去得更容易！

如果德国获胜，則它会用損害战敗民族的办法为自己的工业創立一种特別有利的局面。这种特別的局面无疑会給德国无产阶級带来一定的好处。当英国在世界市場上享有統治权的那个时期，英国工人阶級的某些阶层的处境是比較不坏的。庫諾同志知道这种情况，因此他坚持地主張帝国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所有其余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帝国主义者也知道这种情况。而工人阶級則多少模糊地猜测到这种情况——于是勇敢地“为德国的生存”而奋斗。这是事实。

当英国工人阶級感到自己处在特別有利地位的时候，正如它的某些首領所說的那樣，它对“大陆社会主义的野蛮方案”（Wild-schemes）就沒有任何同情。如果德国获胜，又如果在德国工人的口袋里装进一部分鹵获物，那么德国的社会主义通通都会受到“重新审查”（修正），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就会开始用我們至今还没有听到过的那种語言說話。自然，这将是非常可悲的。福音书說得很对：“盐是好东西，但是如果盐失去效力，又有什么用呢？既不适于当土壤，也不适于做肥料”……

德国土地上的盐正在失去自己的效力，它們既不适用于做肥料，也不适用于当土壤。但是要知道，这种情况并不否定唯物主义历史观。相反，它证实着唯物史观，因为它再一次說明，不是意識決定存在，而是存在決定意識。

但是从存在決定意識中还得出这个結論：存在決定无产阶

級意識傾向于社会主义理想。既然帝国主义的精神浸透到德国无产阶级队伍中去了，則馬克思的“批評家”也許會說：社会发展的客观邏輯根本不是把全世界的无产者引导到馬克思当年所希望的那个归宿；这种邏輯强迫无产者不要互相團結，而要為着世界市場互相进行殊死的斗争。

您，H-ов 同志，預料“馬克思的批評家”會这样反駁：这个反駁似乎使您困惑莫解，而您希望知道我对这种反駁有什么看法。

十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馬克思正确地肯定了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对意識的关系，即肯定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正确性，但是这个情况实际上还保证不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胜利。要使它成为胜利的保证，必須首先证明，用国际團結的精神教育現代无产阶级的客观条件，要强过現代无产阶级有时会在其影响下产生民族利己主义欲望的那些客观条件。但是要证明这一点，并不像馬克思的批評家們想像的那么困难。

德国无产阶级受到了德国帝国主义的胜利許諾給它的那些好处的誘惑。因此，您推論說，經濟利益驅使德国无产阶级背棄国际社会主义。您的結論是对的。但是不应当夸大它的意义。

我們在德国无产阶级身上看到过的現象，几乎每天都在不大的範圍內和稍微不同的社会环境里，在我們眼前重現，但它絲毫不破坏我們对未来社会主义胜利的信心。試拿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用 Streickbrecher^① 的称号加以折辱的那些工人为例吧。

Streickbrecher 們背叛自己的同志以后，自然会得到一定的好处。但是从这里究竟得出什么結論呢？他們的叛变絲毫不会取消雇佣劳动和資本的利益的對立性，因此也不会破坏社会党脚下的

① 破坏罢工的工人、工賊。——譯者注

基础。現代社会的經濟发展越是繼續向前推进，无产阶级就越会更加明白地認識到自己在現代社会中的地位，它就越会更好地組織自己的力量，而 Streikbrecher 們的行动就越会引起它更深刻的憤懣。他們的行动越是深刻地使无产阶级憤懣，他們的人数就会减少。工人对自己那些出卖社会事业的同志的这种不滿情緒，是由現代社会的經濟所制約的。同时这种情緒也是无产阶级进行自我教育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

常有的 Streikbrecher'ство^① 这种可悲的現象，絕對不会动摇科学社会主义牢靠的基础。当年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分子所实践的，而現時德国无产阶级也許又要加以实践的那种 Streikbrecher'ство des grossen Styls^② 的更加可悲的現象，也动摇不了这个基础。

当英国統治世界市場的时候，英国无产阶级曾經享有特殊的地位，这种地位延緩了英国无产阶级提高阶级觉悟的过程。但是它并不曾使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觉悟的提高停止下来。正是在这个时候产生了国际，它把道德和正义的簡單法則当作自己“对外政策”的基础。是否有根据认为，德国的胜利所造成的德国无产阶级的特殊地位，处处都会停止国际思想的傳播呢？——沒有。

自然，如果德国获胜，則欧洲的处境就要坏些，而在欧洲的社会主义中，休特古姆輩、哈尼施輩、海涅輩、克瓦尔克輩、謝德曼輩，以及他們一流的其他同志就会暂时成为“思想界的統治者”。但是，除了欧洲，还有美洲、亚洲，那里的资本主义正在迅速地取得成就。毋容置辯，德国的胜利甚至会在世界其他各洲上延緩社会主义思想的傳播，但是它不可能完全停止其傳播，这原因就和它之不可能把經濟发展的車輪拉向后轉的原因是一样的。

德国无产阶级从自己大規模的 Streikbrecher'ство 中取得的那些好处，会使它認不清无产阶级在自己的世界目的中的根本利

① 工賊行为。——譯者注

② 風格高尚的工賊行为。——譯者注

益，但是这种利益并不会因此就不存在。如果这种利益仍然存在，則世界其他各洲上的无产阶级的头脑中就会继续产生（即使欧洲的社会主义注定要落入德国帝国主义的铁掌）一种正确的认识，——即认识到，世界无产阶级除了通过在国际团结的基础上亲密地联合自己的努力的途径，便不可能获得解放。这种认识越是强烈地深入工人人们的头脑，他们对一切大大小小的 Streikbrecher'CTBO 就越会感到愤恨。而他们的这种愤恨感情不仅会成为进一步教育他们中间那些没有干过罪惡的 Streikbrecher'CTBO，反而吃到这种行为的苦头的工人的一种手段，而且也是喚醒那些实际有过这种行为的人的一种手段。

同时德国无产阶级的 Streikbrecher'CTBO 是否能够长时期地保持下去呢？决定“最大的”社会民主党当前行为的那种“考虑”是否完全牢靠（gründlich）呢？好处和好处是不同的。用 Streikbrecher'CTBO 去获得的那些好处是否牢靠呢？

英国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曾经从英国在相当时期内所享有的世界市場上的特殊地位中取得好处。但是英国的无产阶级却为这种好处付出了十分昂貴的代价。它的阶级觉悟的提高因之延緩了，也就是說，它在反对統治阶级的斗争中的立场因之削弱了。英国无产阶级当前的处境远不是那么順利的，如果在它提高觉悟的过程中没有发生过这种现象，它的处境可能会更順利些。归根到底，它受到的損失，比它从自己的特殊有利的地位中所得到的好处要大得多。如果德国帝国主义者的计划得以实现，則德国无产阶级的未来也将是如此。这是从经济方面說。而从政治上，未来对德国无产阶级还要坏些。

十七年以前，受到当时刚刚开始“重新审查馬克思”的風气鼓舞的沃尔夫朗格·海涅想出了一条公式：“Kanonen gegen Volksrechte”^①。这个公式的意思是說：社会民主党人将投军事撥款

① “大炮換民权”。——譯者注

的票，供給政府大炮，而政府因此給予社会民主党人以“人民权利”。已故的弗朗克采取了这个公式；休特古姆采取了这个公式；大多数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采取了这个公式。我們的德国同志们把大炮供給自己的政府，用这些大炮摧毁了比利时、法国、波兰。他們輕信地期待，政府会賜予人民以“权利”，作为对大炮的交换条件。当他們想到現在已經不必例如为了在普魯士夺取普选权而举行群众性的罢工(这会損害組織)，因为这个权利将作为扼杀波兰、法国、比利时的流血劳动的酬偿而給予他們，他們就釋然于怀了。不过他們是在用无法实现的希望欺騙自己。德国社会民主党供給德国皇帝的大炮，很适于压迫其他的国家。可是这些大炮在压迫德国的事业上也将表现出同样的称职。

德国的保守分子現在已經在商量，不应当对民主派的要求让步。往后我們會听到什么呢？

德国的工人階級仿佛已經开始(虽然还是剛剛开始)認識到，它的头子們的算盘打錯了。德国工人階級的队伍中正在产生(虽然还是剛剛产生)一个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政策的反对派。可以期望，德国的統治集团本身会尽一切可能来巩固这个反对派，并加速其发展。

最后，我們到底还不知道德国是否会胜利。对德作战的国家的无产階級奋斗到底的决心，使人可以认为，这一次德国皇帝不一定能用胜利者的荣誉来炫耀自己。意大利很可能出来干涉，这就有更大的机会使欧洲避免德国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統治。而除了这些机会之外，德国工人的觉醒的可能性也将增加。或許，德国工人会比我們所期望的更快得多地記起馬克思的金玉良言：認識到自己階級利益的最深刻和最全面的真正內容的无产階級，除了以道德和正义的簡單法則为基础的那种“对外政策”以外，不可能有另一种“对外政策”。那时，只要想一想德国軍隊侵入邻国时造成的一切血腥的恐怖和犯下的一切野蛮的暴行，他們都会毛发悚然的。那时，他們就会詛咒“修正主义者”先生們的鼠目寸光的

縮手縮脚做法，而重新回到國際的基地上來。

說實話，我不知道在將來為恢復國際而召集的那個國際代表大會上，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怎麼露面。大概不會太親切：因為握沾過無辜被殺者的鮮血的手，畢竟是不愉快的。那時，無論是“阿拉伯的香水”，也無論是事後的惋惜，都無濟於事。而在这里，使良心服從理智就非常適宜了。國際為了自己的偉大事業，將來甚至應該注意事後的惋惜。將來它應該像拜倫的天使向對殺害亞伯表示懺悔的該隱所說的話一樣，向德國無產階級說道：

“過去的就過去了……

……但願你未來的事業，

不再蹈此覆轍”……

十一

每一個個別國家的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就在於給那些為了自己特殊的利益而背叛自己的階級的工人集團以有力的和及時的回擊。同樣，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也在於當這個或另一個個別國家的工人階級（現時就是德國工人階級）的行為違反無產階級國際團結的要求時給它以及時而有力的回擊。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越是不僅明白地認識到自己的最終目的，而且也認識到達到這一目的所需的條件，則它反對大規模的 Streikbrecher'ство 的鬥爭就會變得更加剛毅果敢和有條不紊。因此這種鬥爭就是衡量它的自我教育是否有成效的標準。

我坦率地說：各個中立國家的社會主義者在最近的戰爭時期所採取的策略證明了，全世界無產階級的自我教育過程暫時還沒有發展到可以寄與希望和期待的地步。

一個顯著的例子：去年年底，意大利社會主義的一個最知名和最有功勞的代表在議會中堅持意大利社會黨在戰爭問題上的策略。例如他在那里說道：如果意大利處在比利時的地位，則所有的意大利社會黨人都會認為自己有義務保護自己的國家；不過敵人

的进攻还没威胁到意大利；因此他們要求，意大利仍守中立。尽管非常明显，德国的胜利甚至也会使意大利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我們仍且假定这种說法从意大利人民的利益的观点看来是正确的。不过我要問一問：国际团结精神何在呢？难道可以允許社会主义者在仅仅只是为了举例說明“这不于我們的（即意大利的。——格·普·）事”那个主張的时候才記起比利时嗎？^①

我讀中立国家的另一些社会党机关报时常常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上面会有这样一种明显的願望：即甚至在評論交战各国的行动时也希望一定保持中立。这种願望有时产生的确滑稽可笑的后果。当社会主义的中立派 quand même 觉得自己必須譴責一下德国军队的这一种或那一种血腥的暴行的时候，为了保持平衡起見，它赶急补充說，法国军队的行为也并不可嘉。不过它忘記了，法国军队之进行战争，不是在別国的領土上，而是在自己本国的領土上，光只根据这一点，就不可能燒毀別人的城市，掠夺敌对国家的居民等等。

老国际主义者万-科尔在荷兰社会主义报纸《Het Volk》^②上对这些中立主义者的立場提出了强烈的抗議。他問道，当社会主义者的正义感受到破坏国际法和蹂躪国际条約的行为（像比利时所发生的情况那样）的侮辱的时候，社会主义者为什么要沉默呢？他說：“难道我們只是为了寬恕压迫者才不应当表示自己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嗎？在現在这种情况下，凡是不用全部心力来抗議的人，都会变成罪行的参与者，都要对既成的残酷行为負責，也都可以受到道德堕落的譴責。只要想一想这个問題，你們就不会过分地企

① 当意大利議會举行有历史意义的會議（5月20日）的时候，我的文章已經写好了。“官方的”意大利社会党人通过屠拉第的口声明說，为了服从国际团结的精神，他們要求保持中立。怪哉！如果我眼看着一个人扼杀另一个人而仍然保持“中立”，那么我也許是同扼杀者讲团结，而完全不是和被扼杀者讲团结。——著者注

② 原文不可解，似为《Het Volk》（即《人民报》）之誤。——譯者注

图保持中立，因为中立只会损害国际社会主义。”①

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想想。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保持中立的同志，大概都是很可尊敬的人。但是这些大概很可尊敬的人却使自己处在但丁在其《Inferno》②的第三歌中说到的那些中立的天使所处的完全不可尊敬的地位，这些中立的天使既不起来反对上帝，也不忠于上帝：

De li angeli, che non furon ribelli,
Nè fur fedeli a Dio...

地狱也罢，天堂也罢，都没有接受这些中立的天使。用但丁的教导者浮吉尔的话来说，他们也不值得在人间活动：

Misericordia e giustizia li sdegna;
Non ragonar di lor, ma guarda e passa.③

这种地位对国际社会主义者是完全不相称的。他们应当比任何人更大声地反对压迫者，他们应当比任何人更积极地捍卫以道德和正义的简单法则为基础的“对外政策”。

流血是一桩残酷可怕的事情。再没有比停止流血的愿望更自然的了，这就是说，再没有比促使人们缔结和约的愿望更自然的了。但是这个愿望不应当使我们变成不讲正义的人。当被压迫者参加同压迫者的斗争的时候，要求他们之间缔结和约，就无异于同压迫者言归于好。

遗憾的是，中立国的工人阶级还没有充分地弄清楚这个问题。但是他们现在还没有清楚地理解的道理，将来他们会懂得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自我教育的过程还没有结束。在指出各中立国家的工人阶级在这次战争的过程中所犯下的或表现的那些无疑是值得惋惜的过错和缺点的时候，必须记住这点。我们希望，这些工人阶级自己很快就会发现它们，并且到召集未来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

① 演说，1915年第88号。——著者注

② 《地狱篇》。——译者注

③ “正义和慈悲都鄙弃他们。我们且别谈他们；看一看就走。”——著者注

表大会的时候能担负起使命。

但是无论如何，战争向我们表明的完全不是国际社会主义本身没有坚固的基础，而只是表明（实际上也正是这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还应当努力地进行自我教育。谁认为他的自我教育已经到头了，谁就是空想主义者（即或他每天向马克思宣誓一百次也罢），而且不言而喻，谁现在就可能使自己的信念发生动摇。我还要说：如果他的信念发生动摇，他也就不会不表现出自己的逻辑的。凡是沒有空想主义（空想主义同主观主义永远有亲密的血缘关系）的虚构的人，根据战时的经验，他就只会对自己说：

社会民主党人的所作所为，至今在所有文明国家的工人的头脑中都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但是这些作为，既不足以防止战争，又不足以引导中立国的无产阶级采取正确的策略路线。这就是说，必需加倍地、三倍地、四倍地努力，并且使这些努力比前此的努力更有计划得多。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也许我们的最终目的比我们所设想的遥远。如果是这样（事实上也是这样），那么我们在自己的策略中一定要估计到这点。但是这毕竟丝毫不是说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不可达到的。我们一方面进行工作，同时要记住，能够到达巴勒斯坦的不是那些由于无知而每见一座新城市就准备高呼“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十字军骑士，而是那些懂得地理的人。

論 战 争(文集)

两条路綫

您讀过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嗎？大概都讀过吧。而且大概您很喜欢偉大作家的这本篇幅不大的书。就文彩方面說，这本书应当认为是馬克思最卓越的著作之一。不过它的卓越处不光在文彩方面。它是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法国1848—1851年事件的极为成功的尝试。当然，我只能附带指出它的这个优点。要在这里作詳細的說明是不恰当的。我想提請您注意的只是这本书的两段話。在我看来，此中包含着非常深刻的思想。

这两段話如下：

“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立宪派統治以后是吉倫特派的統治；吉倫特派統治以后是雅各宾派的統治。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都是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綫行进。

1848年革命的情形却剛剛相反。当时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屬物。后者背叛了它，并使它在4月16日、5月15日和6月的日子里遭受了失敗。民主派又全靠资产阶级共和派双肩的支持。资产阶级共和派还没有感到自己站稳脚跟，它就把这个麻煩的伙伴抛棄，自己又去依靠秩序党双肩的支持。但秩序

党聳了聳肩膀，拋开資階級共和派，自己赶忙站到武装力量的双肩上去；它还一直以为它是坐在武装力量的肩膀上，却忽然有一天发现肩膀已经变成了刺刀。每个党派都向后踢那挤着它向前的党派而向前伏在挤着它后退的党派身上。无怪乎它们在这种可笑的姿势中失去平衡，并且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鬼脸，奇怪地跳几下，就倒下去了。革命就这样沿着下降的路綫行进。二月革命的最后街垒还没有拆除，第一个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革命就已经这样开起倒車来了。”①

不言而喻，当社会运动沿着这一条路綫，而不是沿着另一条路綫行进的时候，那总是有充分原因的，这原因应当到社会运动的历史条件中去找。不过这个原因是通过出现在社会舞台上的人们而起作用的。既然起作用的是这些人，所以他们就认为自己是（实际上也是）由于他们的努力而产生的那些社会现象的原因。既然他们认为自己是（也的确是）社会现象的原因，所以他们就把这些现象看作有益的或有害的、合乎愿望的或不合愿望的。

对于革命者说来，凡是其趋势足以增加社会前进运动能力的那一类事件，都是合乎愿望的，而凡是其趋势会削弱这种能力的那一类事件，则是不合愿望的，这是容易理解的。

如果社会前进运动像18世纪末期法国的情况一样沿着上升的路綫行进，它的能力就会增加。如果运动的路綫变成下降的，它的能力就会减弱。

因此，革命者不能不希望，他所参加的或打算参加的社会前进运动沿着18世纪法国伟大的社会运动曾经沿着的那条路綫行进，即沿着上升的路綫行进。

既然他希望运动沿上升的路綫行进，他就应当作他所能作的一切，使运动正是采取这个方向。

自然，他的努力可能仍然是没有结果的。对运动不利的情况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8卷，第145—146页。——译者注

可能比运动更强大。但是，只要他相信自己的努力不会毫无结果，只要他不灰心丧气，他就会力求使事变向他所希望的方面转化。对于任何一个有毅力的社会活动家说来，无论他用什么哲学观点来看社会过程的规律性，这种情况都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那末，讀者呵，我要問問您，叫我們的社会运动朝哪一条路綫行进才合乎願望：沿上升的路綫还是沿下降的路綫呢？

您很可能会回答說，如果馬克思是对的，那也就不必提这个問題了。偉大的法国的运动是沿上升的路綫行进的。这就是它的力量之所在。1848年的二月革命是沿下降的路綫行进的。这就是它的弱点之所在。有健全的理智和清醒的記性的俄国革命者，怎么可以希望俄国的社会运动沿下降的路綫行进呢？

好极了！但是，馬上就发生另外一个問題：为什么在我国，不仅极左派而且所有“比立宪民主党人左傾的”人物过去都这样議論，而至今还在这样議論：仿佛他們深信，如果避免法国1848—1851年事件曾經沿着它行进的那条道路，而朝上升的路綫走去，我們的社会运动就会遭受悲慘的失敗？

这不对嗎？可惜，这太对了！不妨回想一下，我們的极左派和那些名副其实的“比立宪民主党左傾的人”过去和現在是怎样評論所謂“負責的反对派”的全部言論的吧。可以想想，在他們看来，这个反对派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自由的事业极端有害的。

假定我們的社会运动像法国大革命（根据馬克思的絕對正确的意見）那样发展。这就是說，最初政权落在我們的“立宪派”手里，即落在左派十月党人、进步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手里。然后它为劳动派所得。最后，只有經過了这些預备阶段，只有在运动采取最广大的規模以后，政权才由最极端的左派掌握。

但是，当这些极左派看到事变沿着这条路綫前进时，他們将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过去历年的經驗使人对这个問題不能有任何怀疑。他們将喊道，运动发展得不正确，它会因此而葬送。他們也会尽其所能地使

运动不再沿着它所采取的方向行进，即不再沿上升的路綫（不要忘记这一点！）行进。

換句話說，只要他們看到立宪派准备从旧制度的保卫者手上夺取政权，他們就会竭力妨碍立宪派这样做。他們就开始破坏立宪派在劳动群众心目中的信誉，他們就着手向劳动群众证明，立宪党的胜利不但不会給人民带来任何利益，反而会給人民造成可怕的損失。如果他們能够使劳动群众相信这番道理，如果劳动群众相信了这个道理以后，就不再支持立宪派，則这些立宪派就会变成完全沒有力量的，在我国政治舞台上就不再起多少显著的作用。于是就得輪到劳动派。一旦劳动派当真暴露出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上来的显著的意图，最极端的左派政党又会像对待立宪派一样用敌視的态度对待他們，即力图破坏他們的信誉，从而削弱他們的力量。然而更可能的是，劳动派自认为沒有条件覬覦政治統治权，而同极左派的政党一道走了。这样就会加速事变的进程。政权既不为立宪派所得，就会立即落到极端分子的手上。但是极端分子并不能保持住政权，原因非常清楚，因为他們在取得政权的时候，还没有把一切可能靠攏他們的民众力量动员起来。极端的政党过早地获得政权，就会陷于孤立，他們不得不受到所有比他們右傾的人的逼迫，也就是說，例如受到不久以前屬於“負責的反对派”政党的那些人的逼迫。极端派的策略所造成的后果，或者是立即使反动势力长期地获胜，或者是立宪派将成为局势的主人，二者必居其一。不必考察前一場合，但无妨看看后一場合。

在人民心目中信誉扫地从而失去他們的支持的立宪派（例如立宪民主党人），也不会长期地保持住政权。右派十月党人会替代他們，而在十月党人之后就得輪到保守党人——sans phrase^①——和反动派。总之，一切都像1848—1851年法国发生过的情况那样进行的。每个党派都向后踢那挤着它向前的党而向前伏在挤着它后退的党派身上。无怪乎它們中間的每一个党派都要在这种可笑

① 无疑地。——譯者注

的状态中失去平衡。它們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鬼臉，奇怪地跳几下，就倒下去了，于是社会运动朝着下降的路綫前进。而这个后退运动，在极端的党派还没有建立政权以前就开始了。

我們曾經一致认为，事变的这种方向对社会运动将是很有害的。这就是說，极端派之所以希望这种方向，只是出于誤解，只是因为它們对它們获得胜利所必需的那些条件理解得很糟糕。

二

非常明显，这是极其危险的誤解。不过，究竟这个誤解傳播得多么广泛，下面两个例子可以向您說明。

在第250号的《日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給不久前在莫斯科召开的城乡联盟代表大会做了一个总结。文章作者肯定地认为，这次大会使自已脱离了人民，开始向右轉。用他的話說，这种向右的轉变“終于在社会舞台上建立了三个陣营，而不是过去的两个陣营，这三个陣营就是：有发言权和实权的官僚派，有发言权但无实权的资产阶级，和既无发言权又无实权的人民。”

假定情况正是这样，我們会得到什么結果呢？资产阶级有“发言权”，但是脱离人民，从而失去了依靠人民力量的可能性，因此也就失去了取得政权的可能性。由是观之，资产阶级陣营起不了作用，而事变的往后进程决定于以官僚陣营为一方和以人民陣营为另一方这两种力量的相互較量。如果人民取得胜利，則政权就会从官僚手中直接轉归到劳动群众代表的手中。我們的偉大的政治戏剧就完全像二月革命的開場那样开始了。如果同样的开始决定往后发展的胜利^①，即如果我們的社会运动也沿着下降的路綫行进，那会怎样呢？《日报》的政論家是如何考虑的呢？

不知道！他根本没有給自己提出这个問題。的确，他也认为，

^① 原文是“если одинаковое начало определит собою торжество дальнейшего развития”，从文意看，其中 торжество 可能是 торжество 之誤，若然，当譯为：“如果同样的开始决定往后同样的发展”。——譯者注

人民和自由派之間的分裂“比需要这种分裂时过早地”发生了。但是他立即赶忙拿出这样一种主張来安慰自己和讀者：現在民主派不必对分裂特別感到惋惜，因为它本来就不相信自由主义。这确乎是很坏的安慰，因为無論民主派怎样看待自由派，它都不能不因为同自由派分裂而感到惋惜，如果分裂真的过早地发生了的話。

也是最近不久以前，我在另一份民主派的机关报上讀到：不仅在历史上中了反动派的毒害的党，甚至还有“負責的即能干的反对派都沒有能力赶上生活的进程”。如果这是对的，則很明显，我們就只好指望“不負責任的”反对派了。但是这里同样明显的是：如果这个反对派不辜負我們的指望，而且如果它能够打倒反动派，則可以顾虑的倒是，在我們这里，事情会沿着法国 1848—1851 年事变的那个方向行进：我們的社会运动在极端的党派还没有建立政权的时候就开起倒車来了，而敌視旧制度的党派則做着“一种可笑的姿势”，并且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鬼臉，奇怪地跳几下，在进步性逐漸减少的情形下开始一个一个地倒了下去。

这也許是必不可免的。但这是极其可悲的。而當我們怀有民主主义情緒的政論家們指出有一些征兆，证明事情可能，甚至很可能发生这种可悲的轉变的时候，我非常驚訝地看到，这些征兆不仅不使他們产生任何忧虑，甚至还好像使他們觉得高兴。而且他們自己就設想出一些現象，这些現象如果确实存在，倒不得不承认它們就是这样的征兆，不过它們暂时还只存在在他們的想像中。

《日报》的政論家所謂莫斯科代表大会同人民分裂，实际上不过是企图吸引先前傾向于支持旧制度的那些分子同旧制度进行斗争。如果这个企图圓滿地实现了，則莫斯科代表大会就是表示社会輿論向左轉，而不是向右轉。

这个民主派的政論家写道，“負責的反对派”現在沒有能力赶上生活的进程，这种說法也不对。将来会这样，但是現在还不是这样。現在“負責的反对派”在做很多有益的、甚至簡直是必需的事情，如果我們开始輕視它，我們就会犯巨大的不可原諒的战略錯

誤，就会表明自己是輕狂的學理主義者。

为什么我們的民主派政論家看見现实中沒有的东西呢？因为在这种場合下他們是戴着一种偏見的眼鏡来看社会生活的，这种偏見，像我在上文所說的那樣，所有“比立宪民主党人左傾的”人物都傳染上了。在我国知識分子中，对于我国解放运动的所願望的进程，一般說来，广泛流行着一种完全錯誤的观念。我国的知識分子希望用这种理解錯了的急进主义指导运动朝下降的路綫行进。他們甚至料想不到，只有沿着上升的路綫运动，才能保证自由的胜利。他們热爱自由，但是他們行动起来却好像他們在强烈地痛恨自由。他們像莫尔查林一样，用法穆索夫的挖苦話來說，本来想要走进一間房子，結果却走进了另一間房子。①

——从这里您可以得出什么結論呢？暂时还好像什么也得不出。我只力求安慰自己說：还不是一切事情都令人失望；我国的先进分子还能够掌握正确的战略概念；他們还能够使損害自己本身事业的行为停止下来；事变还没有使他們失去机会来大大地促进我們的社会运动像十八世紀法国偉大的社会运动一样，不是沿着下降的路綫而是沿着上升的路綫行进。

1915年10月

应不应该投票贊成軍事撥款？

致議員布里揚諾夫的信②

国家杜馬快要召开了。这屆杜馬召开前的形势不仅非常特殊，而且糟糕透頂！可以大胆地說，我們俄国从17世紀初期的混乱

① 这句话源于格利鮑耶陀夫的剧本《聪明誤》。莫尔查林和法穆索夫都是剧中人物。——譯者注

② 普列汉諾夫这封信是在国家杜馬最近一次（8月）會議的前夕写的。——原书出版者注

时代以来还未有过如此危险的局面。它应当集中自己全部的力量进行自卫，如果我们的同志们轻举妄动而致妨碍俄国人民的自卫事业，它就会遭到极其可悲的命运。如果德国果然把绳索套在俄国的脖子上，则首先因此而受苦的是俄国无产阶级和一般的俄国劳动群众。所以非常明显，您和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议员同志们，绝对不能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可以保留自己的政见，因为这是必要的，但是要投赞成拨款的票。投票反对拨款是叛变（就对人民来说），而投弃权票则是懦弱；投赞成票吧！

请把我这封信念给齐赫泽同志听吧，并且告诉他，我恳切地请求他严肃认真地考虑一下信的内容。听说他打算参加，也许已经参加了国防促进委员会。如果此事属实，则请对他讲，我热烈地欢迎这一步骤，并且在这里还劝您效法齐赫泽的榜样。恕我未经邀请擅自提出这个忠告。但是，现在是非常时期呵。亲爱的同志，请记住，现在可不能反对人民的自卫。但望来信说：“我们早就有见于此。”要是这样，我该多么高兴啊！因为这证明，我的同志们已经认清时局。

社会主义者和军事拨款的投票

（答阿夫克森齐也夫同志）

在未谈拨款这个局部问题以前，我要就策略问题发表一些一般的见解。

我这一生不得不进行许多的争论，但是我被迫与之打交道的敌人中间，还没有一回像此次和阿夫克森齐也夫同志这样有如此一致的观点。我很高兴的是我们的分歧这般微不足道：它不妨碍我们捍卫同一个策略，尽管就军事拨款问题本身说，我们也许还谈不到意见完全一致。

阿夫克森齐也夫同志的策略主张，其特点在于没有教条主义的味道。正因为如此，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要求。我说这话不

是因为想取悦于和我論爭的这位同志，他并不需要我的恭維；也不是因为在保卫正确的策略事业中要給他以支持，他本人就出色地捍卫着自己的策略观点。我說这話仅仅是为了請《号召报》的讀者注意这个反比法則。

一种策略越教条，它就越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要求。反过来，它越是符合于这个要求，里面的教条主义就越少。

其所以希望《号召报》的讀者注意这个反比法則，因为它充分說明了我的政論活动是正确的。我始終坚信，策略上的教条主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圣灵的犯罪，这种滔天罪行适用于一句老話：万恶皆可恕，独此恶决不可恕。我可以大胆地认为，責备我犯了策略机会主义的同志們（他們曾經无数次地这样責备我）恰恰就犯了这种滔天罪行：他們为了忠实于仅有外在意义的教条或形式而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

已故的威廉·李卜克内西說过，如果他的实践活动的条件在二十四小时内发生了变化，他就认为自己有义务在同一个短時間內改变自己的策略。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者的立場。但是列·托尔斯泰伯爵永远只有一个策略（如果这里可以用上这个名詞的話）。一旦他郑重地宣布了自己的不以暴力抗恶的原則，他就本着教派分子的頑固精神至死不变地反复說，不会有什么情况可以使他放棄这个原則。他說过，如果苏魯人希望吃掉我的孩子，我不会让自己去同他作斗争。显然，这里沒有任何一点策略机会主义的影子。但是这个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中是不是有任何革命的内容呢？根本沒有！假如絕大多数人民都以列·托尔斯泰的学說为绳法，那么暴力就会空前暢行无阻地称霸世界。列·托尔斯泰自以为是暴力不可調和的敌人，其实只是暴力最忠順的奴僕。

順便說說，列·托尔斯泰认为自己的学說是真正的基督教，这是很大的錯誤。和列·托尔斯泰根本相反，福音书上描写的耶穌，乃是我所謂策略机会主义的敌人，即在达到一定目的的方式問題上的教条主义的敌人。耶穌驕傲地自称为安息日的主人，他用

譴責的口吻對文士和法利賽人說：“你們取消神的戒律而保持自己的忠誠好麼？”我很少引證福音書。但是——怪事！——當我們這里展開策略問題的爭論時，我不禁想起福音書上關於耶穌對待安息日的態度的故事。

“又有一次(在安息日)，耶穌走進了猶太教堂，並且教訓人。那裏有一個人，右手枯干了。那些文士和法利賽人都看耶穌在安息日治不治病，以便找個把柄去控告他……。這時耶穌對他們說：我問你們，安息日應當做什麼呢？行好事還是作壞事？拯救靈魂還是毀滅靈魂？他們都不做聲。耶穌看了看他們大家，然後對那人說：把你的手伸出來。那人照做了，馬上他的手就好了，和那一只一樣。他們於是勃然大怒，互相商量着怎樣處治耶穌”……

在我們的隊伍里也常有這樣的情況：人們狂熱地反對那種認為“神誠”比“忠誠”更重要的人。這些人們的思想習慣跟法利賽人和文士一模一樣，不過他們捍衛的不是摩西法律，而是社會民主黨人或社會主義革命者的綱領。我一直想向他們提出一個問題：安息日應當做什麼：拯救靈魂還是毀滅靈魂，——直率地說：革命者應當怎樣行動：毀滅自己的事業，還是不為任何“忠誠”所束縛，設法把事業堅持到底，而在對待每一個特定的策略手段時，只以它是否有利於事業為依據。

我們的“神誠”是什麼呢？我們的最高法律是什麼呢？我們的最高法律是：我們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和任何環境下都不應當違背的唯一戒律，我們應當直到自己最后一口呼吸時仍然對它忠實的唯一戒律，可以用下面七個字來表示：我們事業的成功。應當從這個不可移易的、這個唯一不變的戒律的觀點來判斷我們的全部“忠誠”，即判斷我們全部的行動方式，判斷我們全部的策略手段。

凡是有助於我們事業成功的一切方式和手段都是允許的、值得贊揚的；凡是妨礙它成功的都是不允許的和應受譴責的。這就是我們的摩西，這就是我們的天條。其餘一切都是世世的空虛和

灵魂的苦难。

但是我国人士却习惯于作另一种判断。他们之所以重视某些方式和手段，不是因为它们比所有其他的方式和手段更合乎目的，——任何一种手段、任何一种方式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合目的的，——而是因为人们把同它们的合目的性毫不相干的某种特殊的内在品质加给它们。因此，应当使之从属于目的的手段，本身就变成为目的。一旦手段变成了目的，这时人们就忽略了原来的目的，而手段则不过是为着这个目的才想出来的，于是也就推迟了这个目的的到来。

策略上的“正统思想”一直严重地阻碍了我国无产阶级政党成功地为自己的事业服务。它是这个党1905—1906年所犯的无法挽救的大错误的根源。它把我国那些“不接受战争”，并且进行不合时宜的和平宣传，从而为军国主义效劳的社会主义者引入了空想的假国际主义的绝境。最后，现在当战争必然要唤醒社会的自我意识，因此使一方为旧制度的保卫者另一方为社会成分极为复杂而且迫切要求破坏这个制度的人们之间的冲突再度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它还会有使我们的同志走上错误道路的危险。为了使我们的同志们在发挥社会首创精神的这个过程中履行自己对人民的义务，应当不让他们重犯自己过去的错误，至少是不妨碍把解放者的力量联合起来。我之所以说“至少不妨碍”，是因为我国的许多左派人物高雅地认为，当温和的反对派攻击反动派的时候，仿佛政治上的“comme il faut”^①作风就是无情地打击这些反对派。不难理解，如果我们这些革新者开始同我们敌人的敌人进行战争，我们就是替反动派的事业效劳。

我们中间谁不深信，谁不再说，我们这个最彻底的政党，应该充当我国解放运动的领导者呢？但是，只要这个运动的舞台上出现另一些社会人士，虽然他们还在同旧制度进行斗争，却不那么刚毅果敢，我们许多的同志就坚决要求我们党立即对这些人加以

① “应有的”。——译者注

攻击，这好像格·伊·烏斯宾斯基的那个商人，他——你記得嗎？——剛和“地中海的分舰队”交上战以后，就“扩大自己周圍的空間”，并且像“廣場上的米宁-波查尔斯基”^①一样单独地在原地活动。不用說，这个大商人可算是好样的！但是得承认，“扩大自己周圍的空間”以及使自己处于“米宁-波查尔斯基”那种孤立的地位，是同領導者的身分根本不相称的。然而扩大自己周圍空間的策略却在我国获得如此普遍的贊同，甚至——正如我在《两条路綫》一文中已經說过的——連本来很愛和平而且一般說来根本沒有任何道理可以算作极端派的人們也在遵循着这一策略。

二

依我看来，在防止俄国劳动群众不犯“失敗論”的严重錯誤方面始終有巨大功績的《号召报》，能够也应该担当起这个崇高的任务：向这些群众的有觉悟的代表說明忠实于科学社会主义精神的策略的真正基础。我很愉快地看到，我們的机关报在勇敢地着手解决这个任务。我承认，我感到最滿意的事情是：甚至对軍事撥款投票的問題，以阿夫克森齐也夫同志为代表的这个机关报也正是从上述观点来观察的。

不仅在我們这里，而且在全世界的社会党人那里，这个問題的关键在于人們特別容易为了“忠誠”而忘記“神誠”。阿夫克森齐也夫同志在自己的文章引证了《思想》上一段有趣的話，它攻击投票反对軍事預算、热心而不理智的瑞士社会民主党人，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 *une fois n'est pas coutume!*^② 也許我很容易理解这些瑞士社会民主党人的行为。他們大概都受到了机灵然而輕率的《Berner Tagwacht》^③ 的影响，这家报纸在自己关于战争的言論中

① 米宁和波查尔斯基都是十七世紀初期俄国政治活动家和軍事組織家，莫斯科廣場上有两人的銅像。——譯者注

② 一次不成习惯。——譯者注

③ 《伯尔尼哨兵报》。——譯者注

早就使用着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那些主張，当年古·爰尔威同志就是带着这些主張站在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发言的，不过現在他已經把它們拋到廢物堆里去了，因为他深信它們毫无用处。不能指望小母鸡会孵出小公牛，猪崽会下蛋，也不能指望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言行像社会主义者应有的言行一样。更叫人伤心得多的是塞爾維亞社会民主党人的行为。他們看起来並沒有傳染上无政府工团主义。但是他們甚至在奧德軍国主义的铁蹄无情地蹂躪他們的国土时也投票反对軍事撥款。这不是毫无生气的教条主义的胜利么？这不是人完全服从安息日么？然而正因为討論軍事撥款問題时司空見慣的是安息日奴役着人，所以我自豪地指出：在这方面《号召报》超脫了教条主义的“忠誠”，它从人的观点而不是从安息日的观点来观察撥款問題。

我希望，我很容易就会和阿夫克森齐也夫同志取得一致的意見。不过，如果我的希望落了空，如果我們两人都坚持己見，則任何人还是会清楚地知道，正如我上面已經說过的，我們之間的意見分歧完全不大，它們絕對不致于妨碍我們通力合作地捍卫正确的一般策略观点，而特別是我們在民族自卫問題上的立場。

阿夫克森齐也夫同志完全承认，在当前这个历史时刻，“法国、比利时、英国的社会党人应当投軍事撥款的票”。但是在他看来，俄国的情况則不然。和自己西欧的同志們一样，俄国社会主义者也有义务保卫自己的国家；但是政府不讓他們这样做。而俄国的这个特殊情况，如阿夫克森齐也夫同志所称呼的，也应当反映在我們的議會策略上。他說：俄国社会主义者“不能投票反对軍事撥款；这意味着破坏他們应当加以保卫的国防。他們也不能投票贊成撥款；因为这会冲淡政府和民主派因国防組織問題而引起的斗争”。因此，阿夫克森齐也夫同志主張我国社会主义者在軍事撥款投票时棄权，并且大致如此地說明自己为什么棄权：“我們拥护国防。我們号召一切民主派积极地进行这个国防的組織工作……但是我們反对政府进行战争的方式。它不去組織国家反击敌人，反

而使国家瓦解；不去巩固国防，反而使国防削弱”等等。

我們之間的意見分歧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据我看来，这种論证方式使用了这样一些前提，从这些前提中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并非應該在撥款投票时棄权，恰恰相反，而是應該投贊成票。

凡是不反对战争，只是反对进行战争的某些方式的人，如果他的行动合乎邏輯，就要把自己的票投給軍事撥款，——因为沒有錢就不可能用任何方式打击敌人，——但同时坚决有力地反对那些在實踐上采取有害方式的人。

因此我才劝我国社会民主党議員投票贊成撥款，然而同时保留自己的政見，因为正如我在致布里揚諾夫同志的信中补充說明的一样：“这是必要的”。只要作出这样的保留，我国社会民主党人就有充分的条件避免阿夫克森齐也夫同志指出的危險性：即有冲淡保守派和革命者在国防問題上进行的斗争的危險。怎样不冲淡这个斗争，反而大大加强这个斗争，要看他們的本領如何。只要他們投票贊成撥款，他們就会使保守派失去最后一个可能性，来用歪曲上述斗争的真正意义的办法冲淡这个斗争。

假使极左派的議員在撥款投票时棄权，那时保守派就会說：“极左派需要的是內乱，而不是同国外的敌人进行斗争；如果他們真正尊重俄国人民的利益，当德国帝国主义力图把經濟剝削和政治剝削的绳索套在俄国人民脖子上的时候，他們就不会在对軍事撥款案进行投票的場合下棄权了”。这些话也許会把某一部分劳动人民弄糊涂。它們可能使这些劳动人民看不清祖国和当局的极其重要区别，而理解这个区别是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所絕對必需的。

人民本能地感觉到，他們一定要打退敌人的进攻，因为这种进攻对他們所构成的威胁，恐怕是从混乱时代^①或拔都^②野蛮师团入侵俄国領土以来未曾有过的。如果他們怀疑革命者希望帮助国

① 指俄国史上16世紀末到17世紀初期长年战争变乱迭起的时期。——譯者注

② 拔都(生年不詳，死于1255年)，蒙古可汗，成吉思汗之孙，曾率大軍征服东欧。

——譯者注

外的敌人，或者至少是不願积极参加同外敌的斗争，他们就会用輕蔑的和敌視的态度离开革命者而向保守派靠攏。因此我們的同志們必須避免采取足以使人民产生这种怀疑心理的行动。我认为，在对軍事撥款进行投票时棄权就是这样的行动。

的确，最近几十年来，俄国劳动群众的政治觉悟已經大大提高了。現在，大部分劳动群众都懂得，捍卫人民的利益的不是保守派，而是革命者。但是部分不等于全体。劳动人民中除了有觉悟的人以外，还有觉悟不高和根本没有觉悟的人。我們党的任务就在于提高这些人的觉悟。要知道，如果全体劳动人民都有觉悟，我們党也就无需乎存在了，因为那时党的理想已經实现了。然而如果我們党的任务在于变沒有觉悟和觉悟不高为很有觉悟，那它就必須小心謹慎地避免采取一切可以延緩这个轉变过程的行动。我們必須像避免瘟疫一样地避免采取那种行动，只要这些行动可能使部分落后群众产生怀疑心理，可能加强他們的偏見。他們的偏見是从俄国还没有任何現代所謂革命者的旧日黄金时代继承下来的，它們后来又引起了黑色百人团的产生。“失敗論者”不懂得这个道理。然而我却明白他們为何不懂得这个道理：因为“失敗論者”恰好都是些革命事业中的文士和法利賽人，对于他們說来，安息日比人重要，思想的外在表現比思想本身重要。只有进步到理解了人比安息日无比珍貴，思想比思想的任何外在表現(例如某次投票等等)无限重要那一真理，他們才会把自己的“失敗論”当作荒謬而且可耻的錯誤加以擯棄。^①但是，我們不是“失敗論者”，我們不会不懂得，策略上的这种謹慎态度對我們是完全必要的。

我重申，保守派在我国民族自卫事业中起不起有害的作用，这

① 我的意思不是說，“失敗論”的根源仅仅在于毫不理智的革命情緒。不是的，除了由于自己不懂事而力图砍倒他們自己坐着的那根树枝的革命者以外，“失敗論者”中間还有許多机会主义者，他們用极大的怀疑态度对待革命的行动方式。使俄国败于外敌的計劃，好久以前就在我国机会主义的发展中起着不小的作用。这一点我在别处再詳細說明。——著者注

取决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的議員，并且是大有举足轻重之势的。在这里，投票赞成軍事撥款絲毫不会損害社会主义的議員。恰恰相反！它会帮助他們一箭双雕。

第一，这样做甚至会使落后群众明白地看到，反动派在撒谎，因为他們硬說，好像极端派骨子里是同情外敌的！

第二，这样做会使有觉悟的人民注意到，到达自由的道路和战胜外敌的道路是一致的，正像我們后来在自己的呼吁书中所說明的一样。

我請《号召报》的讀者記住，在这篇呼吁书出現之前很久，我已經写了一封信給布里揚諾夫同志。那时令人耽心的是，“失敗論”的宣傳对多少和知識分子有密切接触的先进工人集团会有影响。为了抵制这种影响，必須采取强有力的手段。投赞成撥款的票即为这样的手段。投赞成撥款的票越是看来違反我們的策略止的“忠誠”，它就越会使工人們注意这样做的理由。工人們越是注意它的理由，他們就越会清楚地理解到，德国帝国主义的胜利对无产阶级利益的損害，大于对俄国人民中其他所有阶级的利益的損害，因为俄国进一步的經濟发展的机会，連带而来的还有它的政治解放的机会，都将大大减少。不用說，社会民主党的議員們是能够——根本无需濫用革命的詞句——把这一真理闡述得一清二楚的。換句話說，要在这里避免任何“冲淡斗争的行为”，在他們說来是容易做到的。

《号召报》的讀者們可以同意我的理由，也可以不同意我的理由。但是我总认为，即使不同意，他們現在也会明白，为什么我主張連俄国也要投赞成軍事撥款的票。上文我已經說明了自己的一般策略观点，下面無論如何我还要簡短地作一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自白，以为补充。

三

早在1889年，我在巴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篇演

說，在演說中我說過，俄國的解放運動將作為無產階級的運動而勝利，否則根本就不会勝利。俄國社會生活往後的发展過程，只會更加使我相信這個思想的正確性。因此，當德國向俄國宣戰的時候，我不能不問自己：如果俄國失敗，我國工人運動會受到怎樣的影響呢？我在經濟問題上並不是完全無知的人，我懂得，德國帝國主義的勝利是俄國經濟發展道路上一個最大的障礙。既然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我一直認為經濟歸根到底始終比政治強大有力，那麼對我說來，現在的問題非常清楚，俄國的失敗會大大地阻礙它的經濟發展，亦即阻礙俄國工人運動的增長，從而會大大地推遲俄國政治解放時刻的到來。同時我對自己說：如果我們這些俄國革命家忽然想去妨礙俄國的自衛行動，那我們就會像童話里的傻瓜一樣，竟然砍斷他坐着的那根樹枝。

當然，對俄國解放運動的勝利的深厚同情，並不妨礙我做一個國際主義者，也就是說，並不妨礙我堅決地譴責國家對國家的任何剝削行為。如果俄國只有通過壓迫任何其他國家的途徑才能保持住它進一步發展經濟的種種有利條件，我就認為自己和自己的同志們在道德上有義務出來反對爭取這些條件的鬥爭。但是此刻的問題是德國容克地主、德國資產階級，以及——應當正視這個即使極端悲慘的現實——德國無產階級在剝削我國的勞動人民；德國無產階級在社會民主黨人的“修正主義”的惡劣有害的影響下，認為支持德國帝國主義者的掠奪政策對它是不無好處的。因此我對自己說，國際主義者不僅可以問心無愧地支持反對剝削者這種企圖的武裝鬥爭，而且簡直必須用全付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去支持這個鬥爭，除非它要背叛自己，除非他不想再做一個國際主義者。如果無產階級沒有能力武裝起來保衛自己的權利，使之不受任何人的侵犯，這個無產階級就一錢不值。在這以前，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在同“修正主義”作鬥爭時都是利用批判的武器。現在，對於所有那些受到德國攻擊的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說來，用武器進行批判的時刻已經到來了。因而我就開始在口頭上和筆頭上表達這個

意思。①

但是，任何場合都有自己的邏輯。既然历史事变把我放在革命者的地位上——一个革命者为了自己事业的最迫切的利益，是应当支持同德国帝国主义的战争的——，我就要貫徹始終，不为任何策略上的“忠誠”所干扰，我肯定地认为，即使在安息日也应当行善，而且只要贊成軍事撥款的投票稍微有助于我們达到自己的目的，我們就沒有权利不投票贊成它。

在我給布里揚諾夫同志写信的时候，局势是这样的：甚至对軍事撥款投票棄权也可能严重地損害劳动群众的政治觉悟。因此我当时写道：棄权是懦弱。現在，由于情况变化，棄权的害处已經不是那么大得可怕了。但是，依照我的主观信念，現在棄权仍然会严重地損害我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有鉴于此，我現在重申：

应当投票贊成軍事撥款！

1916年1月

我对《紡織工人报》編輯部的友好忠告

我面前摆着第1号《紡織工人报》。这份报纸的名称清楚地指明了它的任务：它将是“紡織业男女工人职业性的定期刊物”。怎能不希望这个新的机关报获得成功：要知道在我国，专门討論工人阶级的利益的出版物是多么少啊！

《紡織工人报》編輯部說：“对于我們这些在俄国工厂工业中占

① 这并不是决定我对当前战争的态度全部动机。作为一个革命家，我不能对法兰西这样一个经历了真正光荣的偉大革命的国家的命运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同时，我也不能不意識到，德国的胜利将长期地使得德国“修正主义”在国际中保持优势地位。但是在我的簡短的“自白”中只包括与俄国有关的问题。
——著者注

居首要地位之一的紡織業工人說來，對於我們這些比其他所有的工人更缺乏覺悟和組織性的人說來，——對於我們說來，特別應當趕快補上這一課，應當立即着手進行工作。”

這是很好的。絕對無需爭論，對於俄國工人說來（而且不僅對於加工纖維物質的人說來），應當尽可能堅決有力地繼續把自己的力量組織起來，可惜這個事業經常總是為“某些客觀情況”所打斷。事情是刻不容緩的。但要做好這件事，却必須極其謹慎，否則就會弄出諺語所說的那種局面：“自己急煞，人家笑煞。”

《紡織工人報》編輯部匆匆忙忙刊登了一篇對我的《論戰爭》一書（如果說得更正確一些是：小冊子）的評論。結果却鬧出了笑話。然而如果結果只是鬧笑話，這還不打緊。可結果是既鬧笑話，又出現令人悲痛的事情。凡是珍重俄國無產階級的利益並且懂得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人，讀了我說的這篇評論以後，都會捧腹大笑，而且會笑出眼淚來。笑過之後，他會把第1號《紡織工人報》放在一邊，並且痛苦地對自己說：“新的工人機關報編輯部變成了文壇上招搖撞騙行為的犧牲品。某個饒舌的人讀了兩三本通俗小冊子，但是根本沒有任何知識足以對他竟敢在自己的評論中大放厥詞的那個問題進行判斷，然而這個人却把由於一些極容易理解的原因而沒有研究哲學問題的編輯部弄糊塗了。”

《紡織工人報》的這位匿名評論者宣稱我在自己的小冊子中得出的那個結論是錯誤的。其次，他肯定地認為，我不可能避免錯誤，因為——用他的話來說——我不是“從分析當前的時代、分析形勢，因之即從分析現代國家組織的政策的主觀經濟基礎”出發的。《紡織工人報》編輯部沒有看出，掩藏在這些似乎博學的詞句下面的是多麼可憐的糊塗思想。評論作者對他所涉獵的問題理解得究竟多麼錯誤，只要編輯部多少猜想到一些，它就會毫不猶豫地用輕蔑的神情把他的手稿扔進字紙簍里去。

事實上，應當譴責的錯誤不是我的，而是——多了不起的！——評論者的。他天真地認為，我在自己的分析中不是“從現

代国家組織的政策の客观經濟基础”出发。

我称这种政策为帝国主义政策，并且指出了产生这种政策的那些經濟原因。我在这里引证了考茨基^①，因为他写的关于經濟政策問題的著作比我們这些国际社会主义理論家中間的任何人都多。評論者可以指出我的分析不能令人滿意；但是他沒有任何权利硬說我沒有作分析。他何以会有这种武断呢？

很可能他真的沒有在我的小册子中看出分析之所在。而其所以沒有看出来，簡簡單單是因为在我那里找不到——而且自然也不可能找到——他脑子里背得滾瓜烂熟的关于当前这次国际战争的原因的公式化議論。

这位評論者所習慣的关于帝国主义政策的思維公式的根本內容，就是承认这种政策是由經濟必然性决定的。一旦承认这个本身当然无可爭論的原理，类似我的評論者的“思想家們”便认为，从理論的观点看来，任何确定这次国际冲突到底应当由誰負責的企图都是毫无根据的。然而这是极大的謬論，这是一种可耻的謬論，它犯的是反对科学思維的滔天罪行，凡是有自尊心的工人刊物都不会把篇幅留給它。

承认某种社会現象的客观必然性，絲毫也不排斥它的禍首問題。如果我們馬克思主义者提出“誰是它的禍首？”的問題，这意味着我們想弄清楚哪个社会集团的人用自己的行动造成了这种現象。如果我們說：“这个現象是客观上必然的社会現象”，我們的意思就是：造成这种現象的人的集团的行为是合乎規律的，也就是說，这些行为本身又是它們以前的客观上必然的社会現象所造成的。如此而已，豈有他哉！如果根据社会現象是合乎規律的这个理由而否认这些現象的禍首問題，則无異于认为，好像合乎規律的社会現象的产生是沒有人們参加的，即无異于說，“社会发展的合乎規律的进程”真是一个古怪的观念。

① 这个放肆的評論者称考茨基为詭辯論者。——著者注

試問問任何一个有觉悟的无产者：他的某部分雇佣劳动之所以沒有报酬，禍首是誰呢？他会回答說：“是我的企业主。”他的回答是对的。另一方面，任何一个有觉悟的工人都知道，階級对階級的剝削都有其“客观經濟基础”。然則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很简单。有觉悟的工人认为是剝削者的企业主，用馬克思的說法，乃是一定經濟范疇的化身，是一定階級关系和階級利益的代表。如果一个工人忽然想断定資本主义社会是資本家罪恶的意志所建立的，这就說明他的觉悟很不高。但是，如果有誰一听到資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生产方式，就坚决认为，攻击資本家和同他們作斗争因此便是毫无意义的举动，那就证明他同样是觉悟不高的。

把資本主义社会归咎于資本家的罪恶的意志是錯誤的：因为企业主剝削自己的雇佣工人的意图是資本主义社会的結果，而不是它的原因。但是一旦出現了这个結果，它本身就会变成原因；經濟发展的客观必然进程所产生的資本家階級力图使有利于它的社会制度长远存在。由此得出，虽然資本主义社会不是企业主的意志所創造的，但是它一旦产生，就会按照必然性——請記住，这里又是必然性！——去影响这个意志，以致它在我所指出的意义上对无产阶级起損害作用。而无产阶级不能不考虑这个对它有害的企业主的意志作用，不能不使他們承担责任。如果政治剝削的产生也是必然的历史过程，則无产阶级反击这种剝削也是必然的。然而，如果要反击某种社会現象，就应当預先弄清它的禍首何在。

凡是懂得此中道理的人（不用說，我的这位評論者現在是根本不懂得的），都会去分析反映現代帝国主义政策的种种現象。

十分明显，資本主义社会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所固有的政策，是由于这个历史上必然的发展过程所造成的。但是这完全不等于承认不可以指出誰是这个政策所造成的不幸情况的禍首。这些不幸首先和主要是落在劳动群众的肩上，这种情况应当归咎于其利益决定着帝国主义政策的那些社会集团。我們大家都知道

(甚至連我的這位評論者也多少知道)這些集團是誰。這就是現代社會中占居統治地位的那些階級。屆國際社會黨代表大會不止一次地在自己的決議中告訴我們說，正是這些階級要對帝國主義政策的滔天罪惡負責。但是社會黨代表大會的決議永遠具有，也應當具有一般公式的特性。其中沒有考慮統治階級的貪婪欲望所以導致國際衝突的那些個別場合。其中沒有分析形勢——姑且使用一下我的評論者的用語。並且也不能那樣做。凡是表述一般理論原理的人，絕對不會去考察個別場合(即個別“形勢”)的特征；他的視線永遠放在特定類型的一切個別場合、一切“形勢”的根本特征上。因此，任何一個明理的人，當他討論其中一種場合、一種形勢時，都不會以包括一切可能的場合、一切可以設想的“形勢”的一般公式為滿足。他力求分析這個個別場合中的那種具體情況。我在自己的小冊子中就是這樣做的。我考察，究竟是哪些社會階級，在哪些資本主義國家中，而且究竟抱着什麼特殊目的，認為必需在1918年的8月(新曆)發動帝國主義戰爭。而我的評論者却叫囂說，我沒有對形勢作分析！由於自己無限的天真，他以為，所謂分析特殊場合無非以重復一般公式為限，換言之，就等於根本不作分析。

一般規則說：“人皆有死”。誰也不會想到要去否認它。但是，一切人都要死這個情況並不妨礙保羅在彼得臨終的“形勢”下享有所渴望的健康。人們之與生命訣別並不在同一個時候。同樣，個別的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是在同一個時候作出慘無人性的暴行。只有愚人才會認為依據國際社會黨代表大會的決議，(例如)英布戰爭的責任要由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來負，即不僅由英國來負，而且還要由德國或法國來負。必須具備更大量的……與理智對立的品質，才可以在想到社會黨的決議時認為英國對上述戰爭所負的罪責不會比布爾國家為大。進攻是一回事，而自衛又是一回事。和無政府主義相反，國際社會主義始終嚴格地區分這兩個概念。例子不遠。1910年哥本哈根國際社會黨代表大會無條件地承認了一

切民族都有自决权，都有保卫自己不受武装侵略的权利。1914年7月，当战争临头的可怕的征兆开始出现时，一切国家的社会党人都一致地承认，这次战争的责任要由奥国来负，特别是要由德国来负。奥国和德国的社会党人不仅不反对这个思想，而且在自己的呼吁书中，在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以及在自己的有指导意义的机关报的社论中还明显地和令人信服地发表了 this 思想。不错，一旦德国宣布了对俄作战，他们就开始用完全不同的语言说话了。但是，其所以有这种情况，唯一是因为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受到了帝国主义政策的引誘。毫无疑问，这种政策许给了德国无产阶级某些——甚至相当大的——直接的經濟上的好处。世界史上仅有的大叛变就这样实现了：一个偉大国家的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同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結成了同盟，武装起来反对其他的国家，以便从經濟上剝削这些国家，当然这主要是剝削那里的劳动人民。我是否可以在自己的“形势分析”中对这一点避开不談呢？当然不可以。

誰希望认真地反駁我，他就应当证明，我的叙述和现实情况不一致。然而《紡織工人报》的这位評論者却不这么做。他絲毫沒有反駁我的叙述，甚至贊揚它：

說得挺真也挺好，
保你听来不枯燥……

同时却可怜我有眼不識泰山，即不識这样一些思想深奥的社会学家：他們把帝国主义政策是某些客观原因的結果这个真理背得滚瓜烂熟，并据以得出結論說，根本不当去考虑在这个“形势”下誰是这种政策的体现者以及誰在吃这种政策的苦头，誰在充当强盜角色以及誰在自卫。

这位評論者认为，我既不識泰山，当然就会接受弗朗克或“詭辯論者考茨基”的观点。我不知道他究竟在什么地方看見了考茨基的“詭辯”。現在我只想重述一下——向《紡織工人报》編輯部——我的小册子中关于我对弗朗克的态度所說过的东西。

早在1914年秋天就死去了的弗朗克，志願参加了德国为剝削其他民族而发动的战争。某些帝国主义者——甚至社会民主党人队伍中的帝国主义者——认为他的死是英勇的。依我看来，这是强盜的死，而非英雄的死。对于献身于我所敌視的剝削自己祖国和其他国家（这对我这个国际主义者反正是沒有分別的）的劳动群众的事业的人，我不能抱尊敬的感情去追念他。要是我可以尊敬这些人，我就不会是当前这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者了。

弗朗克和我的区别，是一为剝削者的走卒一为剝削者的仇敌的区别。《紡織工人报》的評論者讀了我的小册子，然而……他在这里却察秋毫而不見輿薪。

此刻我想不起俄国18世紀哪本喜劇或諷刺劇上描写过一个法官，他感叹地說：“你們怎么希望我弄得清楚誰对誰有罪呵；要知道原告被告两方面都拿出法律的根据！”我的評論者当前处境的尷尬和这完全一样：弗朗克拿“法律”作根据，我也照样办；叫評論者怎么分辨是非呢？

但是，这只不过是开场白。引人入胜的妙文还在后头呢！

評論者指出，我引证康德关于个人自律的学說，这就确凿地证明我的立場不穩。况且在我那里，引证康德还先于引证馬克思，后者曾經主張，决定个人相互关系的道德和正义的簡單規則应当成为决定民族相互关系的法則。著名的《資本論》作者劝告全世界的无产者把这些簡單法則当作自己国际政策的基础。他进而补充說：

“爭取这种对外政策的斗争，乃是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总的斗争的一个組成部分。”^①

馬克思写的第一国际的第一篇宣言就是用这些卓越的詞句作为結語的。我引证了它們，其目的在于告訴同志們，在判断一般战争而特别是判断当前战争时他們应当以什么为指导綫索。遺憾的是我的讀者里面出現了一些先生，他們认为任何关于正义和道德

① 参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362頁。——譯者注

的言論都是“資產階級的”空談、感傷的唯心主義。這些先生們惊奇、生氣而且大喊大叫：歷史唯物主義在哪里呢？

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給學者以及給實踐活動家所幫的忙多得很，也大得很。對於參加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實踐活動家說來，尤其如此。但是，要利用它，就要理解它。這却是我話下的先生們所未做到的，我的深思的評論家就是這類人物。他們認為歷史唯物主義的含義是：既然經濟發展是一切歷史運動最深刻的動力，則舍經濟而外其他任何東西都不值得學者的注意和實踐活動家的尊重。如果這樣，則表述這一理論的光榮就不會歸於馬克思和恩格斯，而屬於格·伊·烏斯賓斯基的一篇隨筆中的那個年老的官太太，此人甚至在臨終前還嘟嘟囔囔地反復說：“想辦法放進荷包里去，放進荷包里去！”

早在我的著作《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中我就嘲笑了這種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解釋。十分可能，我的評論者讀過它，甚至也贊揚過它。但是不用說，他沒有理解我。他不具備理解這本書所必要的修養。因此，我從國際的宣言中所抄錄的馬克思關於正義和道德是現代有覺悟的無產階級應當採取的國際政策的唯一基礎的言論，使他感到惊奇和厭惡。但是，他要反對馬克思還嫌膽量不足。因此呢，他聰明地對我之引證馬克思不置可否，而限於用些挖苦話指出我——嘿，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引證了資產階級思想家康德^①。對於這種“分析”，我能夠指出的只有一點：顯然，我的評論者實際上是不重視道德（著作的道德，或許也還有任何其他方面的道德）的簡單法則的，不過這並沒有使他變成政治經濟學的行家。

不能要求職業性的機關報編輯部在我們的理論史方面具有廣博的知識。然而我深信，當我向它引證下面的例子時，它會理解我的。

① 他在注釋中說，康德“出生在哥尼斯堡”。好一個慎重而博學的人啊！——著者注

大家都知道的所謂階級斗爭的那種社會現象，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占着主要的地位。過去有人認為，馬克思是歷史上第一個注意到這個斗爭的歷史意義的理論家。我曾經指出，這是錯誤的，因為關於階級斗爭（“戰爭”）法國資產階級理論家例如歷史學家基佐早就說到過。同時我又指出，馬克思和資產階級思想家比較起來，非常突出地加深了對階級斗爭的理論認識。現在你們再去想想這等咄咄怪事吧：

我向工人們呼喚說：“記住階級斗爭是社會進步偉大的動力。它的巨大意義馬克思已經全面地說明過了，不過基佐和其他某些資產階級理論家早已猜測到了這點。”這時來了……一些“著作家”，他們抓住這句話，並且鄭重地宣布：“普列漢諾夫先生在階級斗爭問題上立場不穩，最明顯不過地反映在他提醒無產階級注意這個問題時引證基佐和其他某些資產階級思想家。”這，怎麼說呢？管這叫甚麼呢？

另一個例子。我談到企業主和僱傭工人在產品分配方面所存在的利益對立現象。我承認古典資產階級經濟學最知名的代表、大衛·李嘉圖的功績在於第一個指出了這種對立現象，但是，我補充說，只有馬克思才更全面地充分地說明了它的本性和起源。同一個“著作家”一聽到我的話（由於自己絕頂的無知，他這一次又根本沒有理解我的話），就裝出一種憤怒的神色向工人報告說：“普列漢諾夫先生在階級利益對立性問題上是如何站不穩立場，可以從他引證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李嘉圖上看出來。”這又該怎麼說呢？怎樣稱呼它呢？

我肯定地認為，而且繼續肯定地認為，科學社會主義——而且只有它！——在意識形態各種最不相同的領域中，解決了資產階級理論家如基佐、李嘉圖、康德和其他許多人已經提出但是不可能實現的那些任務。其實，我在自己的書中之所以提到康德，和這位評論家的武斷相反，完全不是為了論證自己在戰爭問題上的立場。

羅曼·羅蘭曾經就“某些絕對先進的人類集團不夠重視正義

的概念和法律感情的意义”向我国新宗教不朽的奠基者安納托里(卢那察尔斯基)神甫表示惋惜。对于这个态度我反駁說，只有对現代社会主义認識不够的人才这样想，并且我再次引证了我以前在另一个地方已經提到的第一国际第一篇宣言最后几行文字。我指出，这几行文字证明馬克思对正义感的意义給予了多么高的評价，但他又是現代社会主义最卓越的理論家。而只有在这以后，由于深信罗曼·罗兰是用自己唯心主义者的身分偏爱康德的，我才提到了“康德和馬克思”这个題目，并且說：

資产階級通过自己最高尚的思想家的嘴^①郑重宣布人类个人自律的道德法則，但是它不可能在实践上遵循这一法則。階級利益妨碍它这样做。相反，国际无产階級的階級利益則促使它承认和实现这个法則。好像我曾預料到会有这么一个无知的評論者，而用大家都懂得的語言清楚地解釋了个人自律学說的内容。我力求說明，这一学說要求我們每一个人都当作自身目的，而不是达到他人目的的手段。而資产階級却把工人階級看成是它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因之，个人自律法則完全說明无产階級反对資本主义剝削的斗争是正当的。

但是，无产階級既力图摆脱剝削，它自己就不应当成为剝削者。不錯，在自己国家里，沒有誰可以供它剝削，因为他处在社会阶梯的最下层。但是无产階級可能見財起意，而参加它自己的国家对其他任何国家的剝削行为。根据馬克思天才独到的見解，甚至在商品交换对它們双方都有利的时候，比較富裕的国家通过商品交换的办法也可以剝削比較不富裕的国家。完全可以理解，当富裕的国家强迫貧困的国家接受对它們不利的貿易协定时，剝削的强度就更要大得多了。而富裕的国家即在工业方面最先进的国家的帝国主义者竟不惜用武力取得这种协定。所以每一个先进国家有觉悟的无产階級都应当出来表示自己的抗議。如果它开始支

① 不止康德一人郑重宣布了这个自律。老实說，康德只不过是把 18 世紀法国第三等級提出的一个要求譯成了唯心主义哲学的語言。——著者注

持力求把經濟剝削的枷鎖放到其他国家身上去的本国帝国主义者，这就是对自身的叛变。如果个别国家的无产者拒絕把其他民族看作自身目的，工人事业获得成功所必需的国际团结就成为不可思議的了。这就是馬克思认为必須在結束国际的第一篇宣言时向无产阶级指出道德和正义的简单法則的緣故。^①

契訶夫作品中的一个主人翁說道，任何昆虫都希望活着。如果一切种类的昆虫都坚决认为，为了自己的生存他們应当在斗争中团结起来，則它們一定会首先承认每一个个别种类的昆虫都有自决(即自律)的权利。这是合乎种际团结的邏輯对它們的要求的。

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实现道德的要求，最高尚的资产阶级思想家^②虽然原則上承认了这个要求，但是在以阶级剝削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能实现这一要求的。这就是我引证康德的简单而又十分明显的意义。《紡織工人报》評論者从引证中看到，我对无产阶级国际政策的任务的观点，只有借助于资产阶级权威人士才站得住脚。如果一个“著作家”竟这样缺乏智力，他是担負不起研究这些任务的工作的。他不是搞理論問題的材料。要是他沒有钻到工人机关报上去，我想也不会想到去麻煩我的这位評論者。虽然他在那里瞎說八道，但是可能通过某种狡辯給工人造成許多最有害的思想混乱。他这号人不会启发无产阶级的觉悟，倒会蒙蔽无产阶级的觉悟。奉劝《紡織工人报》編輯部快快同他撒手。

也許他自詡为大大的急进派。但是不管他口头上怎么急进，他的作品却在为机会主义的胜利鋪平道路。

这不是笔誤；我硬是这样写的：机会主义。

① 由于同样的原因，社会民主党的綱領郑重宣布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决的权利。自决在希腊文叫自律。——著者注

② 对于“一些有远見的讀者”我还得說明，我过去和現在所說的都是指资产阶级这一个发展时期的思想家，这时它还在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或多或少充滿着革命精神，而且在推翻旧制度的过程中，給全体文明人类作了最大的好事。——著者注

我們的某些德国“同志”在威廉二世胜利的旗帜下开进了布魯塞爾，到了人民宮，在那里同比利时工人們开始交談。——比利时无产階級干嗎抵抗德国的侵犯呢？这使它失去了相当重要的利益，——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征服者說。——“自卫在我們是光荣的事业”，人們回答他。——“光荣，这是資产階級的偏見”，——征服者反駁說。

这些如此粗魯无耻的話不会出自馬克思主义者之口，而是修正主义者說的。修正主义者不可能容納馬克思的理論。他們決不理解，如果人們的道德概念取决于社会經濟制度，則从此絕對不应得出結論說，好像人們可以而且应当为着物质利益而輕視道德要求。“否定理想”的修正主义者一有机会就宁願修談馬克思主义的“片面性”，他們实际上总是甚至为着最不足道的社会改良的蝇头微利而打算出卖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因此他們現在热烈地捍卫德国工人階級同容克地主和資产階級的联盟，以便剝削其他的民族，因为修正主义者希望，德国統治階級掠夺了这些民族以后会把骨头丢給德国无产階級。修正主义者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他們总是表现出是古代犬儒主义的死心塌地的拥护者，就像我早在1914年秋有幸当面对他們中間的一位——即克瓦尔克“同志”所說的那樣。

俄国工人一定要使自己不受这种犬儒主义的恶劣有害的影响。为此他們应当既不为修正主义者仿佛言之成理的劝告所迷惑，也不被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似乎急进的詞句所煽动，而是彻底明确地意識到他們爭取本身經濟解放的斗争同馬克思視为现代无产階級国际政策唯一正确的根据的那些正义和道德的要求是怎样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他們——为了自己本身的而且是最根本的利益——一定要記住，爭取以这些要求为基础的对外政策的斗争，乃是工人階級解放斗争的一个組成部分。只有記住了国际偉大的奠基者的这句金玉良言，他們才会变成不可战胜的。只有遵循着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中合乎邏輯地引申出来的策略原則，他們

才会把现代社会一切积极力量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所有受现代社会制度压迫的人，才会愉快地欢迎有组织的工人，把他们当作主要的解放者。

1916年3月

国际主义者，只不过从 另一方面看

米士卡：喂，叔叔，将军快来了吗？

奥西布：什么将军？

米士卡：您的老爷。

奥西布：老爷？他是什么将军？

米士卡：难道他不是将军吗？

奥西布：是将军，只不过从另一方面看。

米士卡：这比真正的将军大呢？还是小？

奥西布：大。

米士卡：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我们这儿弄得手忙脚乱的。

《钦差大臣》第三幕第四场①

公正值得赞扬；不公正应受指摘。这个道理就连还不十分清楚地知道伏尔加河流入里海的人也是懂得的。而且谁都不怀疑，公正要求给予各人的东西都“以他的事业为根据”（*jus suum cuique tribuere*）。但是，如果我们应当给予各人的东西都以他的事业为根据，则很明显，不公正就可能有两种：第一，给予这个人或这个社会

① 参看芳信译《钦差大臣》，作家出版社，1954年，第59页。——译者注

派別的东西可能少于他所應得的；第二，給予他的东西可能多于他所應得的。一般說來，第一種不公正比第二種更加有害。不過也有相反的情況。特別在政治上是如此。所以，一味對自己的論敵不適當地讓步（即給他的評價高於他的事業），可能比過多的不讓步更加有害，即可能比力求部分地剝奪論敵的即使是他理所應得的东西更加有害。在這種情況下，最好是始終堅持 *suum cuique*^① 規則。但是如果我們的《號召報》編輯部確定不移地堅持這個極可貴的規則，據以觀察我們在對待現今所謂國際主義者時所採取的立場，則不難相信，我們是極不公正的，因為我們給予他們的东西大大超過他們應得的。不錯，我們這樣做是出於最好的動機。但是我們這種不公正的做法仍然會給俄國勞動人民提高覺悟的過程以有害的影響。因此，我們早就應該記住公正的嚴格要求了。

我們有時這樣議論，好像責備我們背叛國際的那些人真正是國際社會主義思想的代表，只是他們不善于利用這些思想來評價當前戰爭所造成的局勢。其次，我們有時好像決心承認，他們所選擇的道路本身是很好的，但是可惜現在行不通，因此我們不得不同國際主義者分道揚鑣，而走上一條使我們自己感到不愉快的羊腸小道。

我且舉出布納柯夫同志的《什麼東西使我們分裂》一文作為例子，這篇文章刊登在第 13 號《號召報》上。

在這篇從許多方面看都很漂亮而且（請注意！）很有說服力的文章中，布納柯夫同志敘述了“國際主義者”為了保衛他們現在的道路而使用的那些論據，然後他寫道：

“我真誠地和坦白地承認，這條道路是和我休戚相關的。當我拿它同我所走的道路、同我不得不在我的道路上忍受的那些妥協和苦惱作比較的時候，我才明顯地看出這條道路的一切優點，感到它對我的全部吸引力。”

① 得所應得的。——譯者注

但是我也不得不坦白而且真誠地承認，我完全不明白“國際主義者”的道路的種種優點在什麼地方。要知道，布納柯夫同志本人是堅決不願走這條道路的，而且他最令人信服不過地證明了自己的這種態度：“因為這是唐·吉訶德的道路，因為這條道路不會有任何結果”^①，——他說。當然唐·吉訶德的道路比桑喬·邦薩的道路更有吸引力些；因為一切都是相對而言的。但是，正因為一切都是相對而言的，對於現代社會主義者說來，不會有任何結果的唐·吉訶德的道路，是不可能吸引人的。

在現代社會主義者面前，展開着既不和桑喬·邦薩的道路一樣，又不和唐·吉訶德的道路一樣的第三條道路。

從布納柯夫同志的文章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他本人很透徹地懂得這個道理。然則“國際主義者”的道路何以會把他吸引過去呢？布納柯夫同志在自己文章的一個地方答复了這個問題，他在這個地方談到他“很不希望社會主義運動發生分裂，很不希望同國際主義的同志們各行其是”。也就是說，這裡全部問題在於情感。對布納柯夫同志說來，跟迄今都和他們走在一起的那些人分手是難受的。他痛恨分裂。我很尊重這些感情。讀者可以相信，一味滿不在乎地在自己的隊伍里挑撥離間並和自己的老同志決裂的“活動家”，是一文不值的！但是，蘇格拉底是朋友，柏拉圖是朋友，真理卻比他們兩人更是朋友^②。如果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離開了真理，則說“你們的道路不會有任何結果”就不夠了。必須向他們揭示他們反對真理的罪過的真實內容。

同老同志分手時痛苦的感情使布納柯夫同志太寬宏大量了。他忽視了自己原有的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立場的巨大優越性。他沒有看出，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實際上已經走上了新的道路，並且變成了分裂分子，然而他布納柯夫同志卻仍然同我們的所有這些他現在的同志們（在戰爭問題上的）一起留在國際的舊路上。

① 着重點是原有的。——著者注

② 這是馬丁·路德在《論受奴役的意志》一文中所用語。——譯者注

二

請看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我从属于社会民主主义陣营的依·依·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文章中摘引来的。

文章的題目叫做《略論所謂国际主义者》。这也是一篇值得大大贊揚的文章，因为它也很好地——不过是用另一些理由——說明了所謂国际主义者的道路完全“不会有任何結果”。

但是，依·依·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证明这一点时有的地方說得太輕松了。她說，所謂国际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使人对它的純洁性和絕對正确性产生一些怀疑”。但是从她本人的文章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根本談不上所謂国际主义者的国际主义的絕對正确性和純洁性；这里並沒有“一些怀疑”的地位，这里有地位的只是坚信假国际主义是毫无根据的。为什么依·依·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自己要縮小从她本人的无庸爭辯的前提中合乎邏輯地引申出来的結論的意义呢？

大概是，她要寬恕这些或那些苏格拉底或柏拉图之流。或許她更希望說服一下他們，使之回到真理上来，故而认为有必要緩和和理由十分充足的指摘，虽然她把這些指摘放在他們身上是恰到好处：

于是医生端着面上尽是糖食的盃杯，
送到生病的嬰兒唇边；
幸运儿在誘惑下吞飲苦药，
欺騙使他重生，欺騙使他获救！

但是在这个場合却是錯誤的估計。对于我們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那些年青人說来，只有坟墓才改正得了他們的难移的本性。

依·依·阿克雪里罗得在自己的文章中就报道說：“在一次党的苏黎世會議上，一位著名的瑞士社会党人普拉廷肆无忌惮地声明，第二国际过去是建立在腐敗的基础上的。”这个大胆的声明意味着什么呢？它表示普拉廷先生否定第二国际的基本思想，所以他

不能根据它的精神进行活动。換句話說，他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际主义者，即不再是盖得、拉法格、倍倍尔、李卜克内西、汉得門、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万·科尔、伊格列西阿斯等人所认为的那个国际主义者。究竟誰在拋棄过去的旗帜？誰在挑撥离間？誰在叛变呢？

我很遺憾，从依·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文章中看不出普拉廷先生离开第二国际以后到底轉向哪一边。但是我清楚地知道《Berner Tagwacht》^①的傾向，它現在公然自封为“真正的”国际主义的保卫者。我絕對肯定地认为，这家报纸的国际主义无非是多·紐文葛斯或（第一式样的）爱尔威永垂千古的国际主义，后者曾和某些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一起断言，有觉悟的无产阶级不应当保卫自己的国家抵抗敌人的进犯。战争刚开始，我就荣幸地亲自向該报主編談过这一点。当时他反駁說，我錯了，不过他沒有費一番心思向我說明他的新国际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国际主义区别何在。而且就我所知，他至今还没有花費这番心思。同时他也沒法把自己的新观点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国际主义加以区别。其所以不能，原因虽然簡單，却又十分充足，因为这个观点和这个国际主义都是一路貨色。因之，即便我們不知道普拉廷先生离开第二国际后轉向哪一方面，我們也清楚地知道《Berner Tagwacht》主編过去是朝何处走的：在战争問題上，他倒向了无政府工团主义，尽管他向自己的讀者隱瞞这点。

但是既然他叛变到无政府工团主义方面去了，何以又譴責別人背叛社会主义呢？要知道还得稍微尊重一下真理，因为真理非惟性胜过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多多，甚至也比格里姆先生^②高出一头。

依·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写道：

“齐美尔瓦尔得代表會議的报告（載于《Berner Tagwacht》）中說道，实践与理論相反，它证明不能同时兼做民族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国际主义者’这个原理是和第二‘国际’的基础針鋒相对

① 《伯尔尼哨兵报》。——譯者注

② 想指罗伯特·格里姆，即当时《伯尔尼哨兵报》主編。——譯者注

的。完全正确。但是，为了用这个原理来反对第二国际的基础，就得曲解这个原理，就像多·紐文葛斯、爱尔兰及其同道們所曾經曲解过的那样。而第二国际的忠实信徒自然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解释。”

我很敬佩爱尔兰同志放棄自己旧錯誤的那种道德勇气。但是，既然这个錯誤很快为坐在《Berner Tagwacht》編輯部里的“新”国际主义者所利用，那我就对不起，只得指出像倍倍尔这样一位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怎样对待它的。他说过：“我們干脆把宣揚这类观点的人开除出党。”从这里，人們可以判断出我們这位永远令人怀念的德国同志会用什么态度对待“国际主义者”先生們现在为国际所杜撰的“新”論据。

这个所謂新論据，其实和从前的国际主义基本原理毫不相干。我不止一次地指出过，第一国际偉大的領導者馬克思力求区分民族防御战和民族征服战。第二国际严格地遵循了他的榜样。如果所有参加第二国际的社会党都要求用人民警察来代替常备軍，他們的这个要求是以下面这种区别为依据的：警察比常备軍好，因为从技术观点看来，警察可以满足防御战争即正义战争的需要，但不适用于征服战争，即不适用于导致民族压迫的战争。假国际主义者先生們 ont changé tout cela.^① 但是既然他們背叛了这一切，从而也背叛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遺訓。于是他們才大喊大叫，說我們是叛徒。这好似有的时候賊也会高喊：“抓呀，抓賊呀”，以便引开过路人对自己的注意。

三

第二国际曾經两次（第一次在布魯塞尔，第二次在苏黎世）十分坚决地否定了荷兰人多美拉·紐文葛斯提出的同战争进行战争的行动方式。但是，現在的假国际主义者所宣傳的正是这个两次都受到第二国际否定的同战争进行战争的行动方式。

紐文葛斯讀了社会民主党的报纸《Berner Tagwacht》以后应

① 背叛了这一切。——著者注

当感到高兴，爱尔威同志如果没有放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話也会感到高兴。

我不愛空口說白話。因此我請讀者允許我在这里引用現在完全站到无政府主义者立場上去了的紐文葛斯的若干言論。

他喊道：“祖国，但这是空洞的名詞！难道一个使你們忍饥挨餓，历尽辛酸的国家当得起祖国的称号么？不，你們的祖国已經被盜走了，这就是你們不能有愛祖国的感情的緣由。”

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这里是沒有多少邏輯的。如果我有一件珍品被人盜走了，我并不会因此不愛这件物品，相反，而会力求把它从强盜手上夺回来。关键在于无产階級是否可以愛它的祖国。多美拉认为不可以，因为无产階級在祖国受人剝削。这又是很坏的論据：从工人受剝削只能得出他不應該愛剝削者的結論，根本得不出他應該漠不关心地对待自己祖国的命运的結論。不过多美拉也未作证明。他把需要证明的东西預先认为是已經证明了的，即把无产階級不能有愛祖国的感情預先认为是已經证明了的。这个錯誤在邏輯教科书上称为 *petitio principii*。^①

假国际主义者先生們正是希望根据紐文葛斯的这个邏輯錯誤即 *petitio principii* 来建立“新”的(第三)国际。当列宁肯定认为无产階級沒有祖国时，他枉然地援引《共产党宣言》，因为宣言上的这句话根本是另一个意思，这一点我在小册子《論战争》里早就证明过了。实际上，这个所謂的馬克思主义者是跟在无政府主义者紐文葛斯的屁股后面走的。^②

当普拉廷先生和《Berner Tagwacht》編輯部說工人保卫自己的国家就等于背叛国际时，他們的这种武断完全是以深得所有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欢心的这位无政府主义者的邏輯錯誤为依据的。

① 預期理由。——譯者注

② 在他的策略中，一般說來沒有任何一点馬克思主义气味。人們都管他叫俄国的施維澤尔。如果拿他同約翰·莫斯特并稱，那会更确实些。——著者注

多美拉說：“我主張國內戰爭，反對民族戰爭；因為在前一場合我們為主義而奮鬥，在後一場合我們奮鬥的目標是別人的快樂和利益。這樣我們就同真正的敵人戰鬥。誰是法國工人的敵人呢？這可不是德國工人，也不是英國工人。不是的，這是法國資本家，雖然他也說同一種語言，共一個祖國。一切國家的工人都是朋友，他們有共同的利益。”

紐文葛斯根據這套謬論，一直建議我們戰時不要服兵役。我們從他那裡讀到：“要用全付力量使無政府主義者這些唯一真正的革命者和國際主義者最後了解到，全世界無產者只有在同真正的敵人進行鬥爭時才值得流血犧牲。”^①

四

我在1893年蘇黎世國際代表大會上反駁紐文葛斯時順便說過，如果照他的策略做下去，戰敗的一定是那裡的無產階級更願意實行社會主義口號的國家，因為在這些國家裡拒絕服兵役的人數更大得多。多美拉對我的反駁無論在當時或者在以後都不能作任何答复。現在列寧走來幫助多美拉一手，他鄭重宣布說，應當在一切國家中同時舉行革命，於是用真正天才的簡易手法把困難一筆勾銷了。多虧了他，問題才徹底解決了……只是有一點：天才的列寧忘記了問問自己：他所建議的同時進行革命的機會有多少？如果這個革命實行不了，又會有什麼結果？但是無政府主義者和最最革命的人 à la^② 列寧者，絕對不會考慮這類小事情。

我清楚地記得，在蘇黎世國際代表大會的軍事委員會上，一位上了年紀的法國無政府主義者^③ 對我們說：“干嗎老是談戰爭問題呢？下道手令廢除國界(les frontières sont abolies)，這樣戰爭就

① 《黑色旗幟》論文集，——阿·爾·莫爾斯基的“聖火”(原文如此!) 出版社，聖彼得堡，1906年，第183—184—185頁。多·紐文葛斯的文章：《軍國主義與無政府主義者以及社會革命黨人對待戰爭的態度》。——著者注

② 有如。——譯者注

不可能了”。当然，人們都沒有同他爭論，只有辛格尔面帶善意嘲笑的神情老盯着他。列宁的高論和这个无政府主义者的高論有不少相通之处。

我引用的紐文葛斯的論据还算高明：它們至少是原本，而不是摹本（且不說剽窃吧）。

但是它們的獨創性（我們已經看到一部分了）絕對保証不了它們的邏輯性。它們共同的和（可惜！）真正腐敗的基礎就是 *Petitio principii*，即把需要解决的那个問題看作已經解决了的。

紐文葛斯說，一切国家的工人都是朋友，他們有共同的利益。这不是他們的发现。我們早就听見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說过。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是用辯证法的思想理解这点的，而紐文葛斯則形而上学地加以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证明了，在文明世界中經濟发展过程会逐渐地确立和暴露一切国家无产者利益的共同性。而多美拉則把这条原理理解成这样：利益的共同性已經确立和已經暴露了。由此产生他的全部錯誤，以及他的国际上的同志的錯誤。^③

他指出，法国工人的敌人不是德国工人，不是英国工人，而是法国资本家。这在上述辯证的意义上自然是正确的，不过紐文葛斯叙述得非常糟糕：因为根据这种叙述看来，法国工人的敌人只是法国资本家；至于其他各国的资本家，他却不置一詞。但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本家，例如德国资本家，都可能有剝削法国工人的願望，那时法国工人就必须确定，哪一国的资本家这时对他更危險。如果他肯定是德国资本家，他就会集中自己的主要力量来反对德国人。現在法国工人就是这样做的。多·紐文葛斯、爱尔威

③ 当时无政府主义者还可以参加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后来人們就不許他們上那儿去了。大概今后也会不許去的。因此我不知道，在未来的国际代表大会上我是否見得到格里姆和普拉廷之流的“同志們”。——著者注

④ 同时应当指出，現在并不是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像紐文葛斯过去那样議論。彼·阿·克魯泡特金和他的最亲近的同志們就屬於这个可喜的例外。——著者注

(風度翩翩的)以及无政府工团主义其他理論家們的继承者叫嚷說,法国无产者放棄了階級斗争。不过我們认为:

不然,它沒有放棄階級斗争,而是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坚决有力地在进行階級斗争。它全力以赴地从事这种斗争,并为此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但是由于德国容克地主和資本家的罪过,它的階級斗争暂时采取了同外国征服者作斗争的形态。^①

长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无非是民主派同貴族派的斗争,这个斗争超出了古代城邦狹小的界限而扩展到全部希腊(而且真正說来,还不仅是希腊)領土。这证明,階級斗争早在古代的古典时期就已经采取了国际冲突的形态。现代文明世界的經濟按其本质說来是国际性的,如果这种經濟促使階級斗争形态作这种转变,那就更加容易理解了。

我預先就知道,假国际主义者先生們会叫嚷說:“法、比等国工人同德、奥、保等国工人进行階級斗争,这个斗争多么偉大啊!”

这个斗争的确不偉大。但是它仍然是階級斗争。为什么法、比等国的无产者不得不同德、奥等国的无产者进行斗争呢?因为后面这些国家的无产者同容克地主和資本家結成了联盟,以便剝削其他所有国家的工人(虽然他們不久以前还答应同这些工人联合起来)。这是极端令人悲痛的。在世界史上,叛变发生得如此出人意外,而規模又大得如此駭人听聞,这还是头一遭。但叛变的規模越大,給它的反击越应当坚决有力。法、比、俄等国的工人被这个聞所未聞的叛变弄得措手不及,甚至沒有時間对这桩可恨的事表示出憤怒的感情。他們——

沒有時間哭泣,沒有時間号淘,

应当立刻武装起来,保卫自己切身的利益不受新三角同盟对它的强盜式的侵犯,这个同盟就是:(1)容克地主,(2)資本家和(3)两个中央帝国的无产階級。

^① 本版注。当然,德国无产階級既然受到导致战争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引誘,它也就要对这种政策負責。詳見下述以及《我們的立場》一文。——著者注

假国际主义者先生們一面譴責法、俄等国工人同参加这个同盟的德、奥等国工人之間的現在这个斗争，一面宣傳不以暴力抗惡。

杀人犯用罪惡的劍

刺进了德一里雅一留的胸膛，

德一里雅一留却必恭必敬地說：

謝謝！

好一些革命家！如果遵照这种策略，我們倒应当在德国工人不再支持自己現时的同盟者（即德国帝国主义者）而履行自己的政治义务（即奋起反对威廉）的时候，才譴責他們。在这种場合下，自然免不了发生他們同德国軍队的武装斗争，这些軍队仍然效忠于皇帝，而且自然和所有其他的軍队一样，主要是由劳动人民組成的。这时也可以說：劳动人民互相之間进行着殊死的搏斗，这种阶级斗争多么偉大啊！^①

德国无产阶级同德国帝国主义者的同盟是极其可悲然而无可爭辯的事实。这个事实得到例如像奥托·卢勒这样一些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派人物断然的承认。也只有这个事实才說明德国工会何以不支持李卜克内西和卢勒，而拥护謝德曼以及其他类似的“现实的政治家”的可耻行为。因此，放棄阶级斗争的不是宣傳同中央帝国进行武装斗争的人，而是倾向于同它們媾和的人。

不錯，法国工人，自然还有俄国工人以及受到德奥两国攻击的其他所有国家的工人，現在都是在自己家里同这些帝国进行武装斗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同平时期的敌人并肩行动的。自然，布納柯夫同志对于我們的道路上出現的这种妥协行为是有意見的。但是第一，受到攻击的国家的工人根本不必要遇事都屈从国内的敌对者：他們可以而且应当在不削弱他們反击外国剝削者的力量的条件下保卫自己的利益不受这些敌对者的侵犯。第二，如

① 一个托尔斯泰分子反对 1912 年冬天我在尼茨所作的关于赫尔岑的学术讲演时，依据同样的理由，否定了各国人民有任何道义上的权利起来反抗压迫。——著者注

果他們集中自己的主要力量反对外國剝削者，那是因為同一個階級利益驅使他們這樣做，要知道外國剝削者現在對這個利益的威脅比國內的剝削者更嚴重得無比。凡是主張兩惡相權取其小的人，無疑會同這個小者進行妥協。但是如果取其大者，在妥協方面他就走得更遠了。由是觀之，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我們的道路正是最小的妥協的道路。因此，對於任何堅決擁護我們的觀點的人，它應當更有吸引力。我敢於斷定，歸根到底就是由於這個原因，布納柯夫同志本人才走上這條道路的。

當德奧工人參加了以剝削全世界勞動人民為目的的罪惡的聯盟時，凡是反復說“一切國家的工人都是朋友，他們有共同的利益”的人，都不是說的真話。不，現在不能承認德國和奧國的工人是其他國家的朋友：因為他們在容克地主軍事統率下以及在資本家最高政治領導下，正在像獵捕野味一樣地獵捕這些國家的居民。誰希望剝削，誰就和希望擺脫剝削的人沒有共同的利益。

俄國、比利時、塞爾維亞、法國等國的工人越是堅決有力地參加當前這次完全要由德奧帝國主義者負責的——這是德奧社會民主黨的刊物直到軍事行動開始時為止極其令人信服地證明過的——戰爭，他們越是堅決有力地參加這次戰爭，他們為國際的理想所做的工作就越多，因為國際從成立時期起曾經堅決地譴責了國家對國家的剝削。

在最近某次國際代表會議上，王德威爾得同志說得很好：“國際只能存在於自由民族中間。”

假國際主義者先生們不理解這個道理。但是，他們不理解的東西還少嗎？他們不善于思考。他們是形而上學者，而不是辯證法家。他們戴着無政府工團主義的眼鏡觀察一切現代的無產階級運動。同他們是无法進行爭論的。他們根本不理解社會主義者的論據。無怪乎《呼聲報》（或許是《我們的言論報》——我記不大清楚了）用十分同情的語調引證多美拉·紐文葛斯的話。真是物以類聚！

讓假國際主義者們同荷蘭無政府主義的涅斯托爾^①去稱兄道

弟吧。讓他們去穿愛爾威同志破舊不堪的鞋子吧。可不要對能否同他們取得一致意見抱着不切實際的幻想，不要寬恕他們，而要勇敢地對自己 and 我們的讀者說，如果我們的論敵是國際主義者，那不過是從另一方面（即從無政府工團主義方面）看的國際主義者，正像伊·亞·赫列斯達可夫只不過是從另一方面看的將軍一樣。

讓無政府主義者去斷定，從另一方面看的國際主義勝過真正的國際主義吧，似乎真正的國際主義過去是建立在腐敗的基礎上的^②。讓生而盲目的學理主義者去相信他們吧，就像天真的米士卡之相信奧西布輩的老爺勝過真正的將軍一樣。受到奧德帝國主義者攻擊的那些國家的工人群眾，由於健全的本能的指導，是不會同他們一道走的，而會同我們一道走。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

毋庸爭論，社會主義運動發生分裂是一件壞事。但是我們對這件事沒有罪過。我們問心無愧。我們繼續堅持以往國際的“腐敗的”基礎。我們沒有忘記哥本哈根（豈只哥本哈根！）國際代表大會關於每一個民族都有自衛權的決議。

社會主義運動中分裂的產生來自和我們毫無共同點的三個方面。

第一，它來自這樣一些人，他們在當前戰爭所引起的忙亂中張惶失措，從而放棄了社會主義的紅旗，而團結在紐文葛斯及其同伙的黑旗之下；我稱這幫人為從另一方面看的國際主義者，這就是本文所評論的對象。

第二，它來自德國和奧國社會民主主義的帝國主義者、所有這些海涅分子、休特古姆分子、謝德曼分子以及諸如此類的分子。這些人，現在大概已經沒有談論的價值了。

第三，它來自某些俄國社會民主黨取消派分子，他們以為，德

① 希臘時代的皮洛斯王，特洛伊戰爭的參加者。在文學傳統中，涅斯托爾的形象是老于世故的人的典型。——譯者注

② 我們看到，按照多·紐文葛斯的意見，真正的國際主義者就是繼承他的所謂對敵人的進攻不進行抵抗的思想的人。——著者注

国的胜利最终会实现他们谦虚贤明的策略理想。这些先生或许有谈谈的价值，不过自然不是这篇文章的事，因为它本来就太长了。

1916年2月

奥国社会民主党人論各国 人民的国际友爱

該隱对自己的兄弟亚伯說：我們到田里去吧，當他們到了田里，該隱就攻击自己的兄弟亚伯，并把他杀了。于是主对該隱說：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呢？

（《創世紀》，第4章第8节和第9节）

一个月以前，維也納举行了一次奥国社会民主党德意志分部的秘密代表會議。現在 Homo 同志在《L'Humanité》^①（1916年4月25日那一号）上报了关于这次代表會議的某些有趣的情况（从維也納《Arbeiter Zeitung》^②上抄来的）。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十分陈旧的消息！但是 à la guerre comme à la guerre！^③ 迟到底不好些。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維克多·阿德勒的演說。

遺憾的是，奥国书报檢查机关努力使得这个无疑是最卓越和值得尊敬的两邦联合帝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演說只能用摘要的形式发表。这种努力常常不仅使作者和演說者的思想变得毫无生气，而且直接加以歪曲。很可能，阿德勒的思想也受到了歪曲。因此，在我想就他的演說作某些評論时，我首先提醒一下讀者，也許自在的阿德勒的看法不完全像奥地利报刊强迫显在的阿德勒所議論的那樣。其实，我坐下来写文章完全不是因为我就希望同奥国

① 《人道报》。——譯者注

② 《工人报》。——譯者注

③ 战争时期就得照战时状态处理。——譯者注

的德意志社会民主党的这位首領爭論。我要駁斥的是作为現象的阿德勒的那种論調。如果作为本体的阿德勒原来就不贊成这种論調，而同我的看法一致，我将第一个感到高兴。

我們在綜述阿德勒演說的文句中讀到：“国际过去从来是各党派的联合，而且也只能是各党派的联合，这些党派按国别地組織起来，在自己的国家里进行工作（即每一个党都在本国进行工作），它們把无产阶级的利益提到首位，而为了这些利益，他們力求使一切国家的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是对的。不过这里有个說法可能給巨大的錯誤留下后路。无可爭論，如果一个社会党力求同其他国家的社会党联合起来，則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把无产阶级的利益提到首位。但是，当它同这些党派联合以后，它就承担起一种义务，即要充分扩大自己关于无产阶级利益的概念，使之包括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利益，而不光是它自己国家（例如奥国）的劳动人民的利益。这自然不是說，它不再是一个“按国别地”組織起来的政党。而是說，当它首先在自己本国进行斗争时，它捍卫的只是本国工人阶级的利益，但是满足这些利益时却不得破坏另一个国家或另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它才配繼續作国际的成員。这大概不需要作更詳細的論证了。只有一点要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劳动人民希望靠另一国家的劳动人民过活，則这两个国家的工人的国际团结就不会繼續存在下去。

这就十分明白地决定着全世界社会党人对帝国主义应有的态度：既然帝国主义的政策使得一个国家（或一些国家）剝削另一个国家（或另一些国家），則国际社会党人理应坚决反对这种政策。可惜，文明世界有組織的无产阶级的力量还不是那么强大，足以最終地防止战争，即防止帝国主义政策所引起的战争。但是这次战争既已产生，决不会因此就取消国际社会党人对国际的义务。軍事时期同平时一样，这种义务就在于同帝国主义作斗争。要在战争时期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就意味着用国际所拥有的一切手

段來保衛受到攻擊的國家和抵抗進行攻擊的國家。

我們大家都記得，當挪威同瑞典分立時，我們的瑞典同志們聲明說，如果他們的國家的政府希望用武力使挪威向自己屈服的話，他們就要舉行總罷工。

反過來，挪威社會黨人則宣布，他們將武裝起來支持自己國家要求獨立的合理願望。這兩國的社會黨人都是對的。他們的行動也都符合國際社會黨人的義務對他們的要求。

也許有人會反駁我說，我提到的瑞典和挪威之間的衝突同帝國主義的政策沒有直接的因果聯繫。這種看法也是對的……但是它絲毫不影響我如下一個思想的正確性：如果一國的無產階級幫助國內的統治階級把政治附庸或經濟剝削的枷鎖加在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身上，那它就是背叛國際。

維克多·阿德勒繼續說道：“互相爭鬥的兄弟仍不失為兄弟。”但這無非是文字遊戲。在這樣一個嚴肅的人的口里說出這種戲言（特別是在我們當前這個嚴重的歷史時刻），是根本不適宜的。阿德勒本來想說，所有文明國家的工人單是由于他們全都處在相同的經濟地位這一點，就已經是兄弟了。工人們的這種地位的主要特徵是什麼呢？他們全都受到統治階級、資本家和地主方面的剝削，這些統治階級現在都變成——和我們在莫里哀著名的喜劇中所看到的情形相反——真正的 *gentilshommes bourgeois*^① 了。同剝削者的鬥爭使各國有覺悟的工人互相團結起來。鬥爭使他們變成國際社會黨人。在鬥爭的影響下，國際友誼的感情在無產階級心靈中誕生和成長。在現代無產者心裡還沒有產生消滅階級對階級的剝削和國家對國家的剝削的願望以前，他們只是可能友好，而不是實際友好。如果某個國家的工人由於任何局部的（無論政治的或經濟的都反正一樣）好處而壓制自己內心的這種善良的願望，如果他們受到這些好處的前景的誘惑而支持本國統治階級力求把其他一些國家變成自己剝削對象的征服計劃；如果他們把火、劍和

① 資產階級紳士。——譯者注

破产带到这些国家里去，則只有根据聖經上該隱仍然是亚伯的兄弟那个意义，才能有所謂他們同这些国家的工人的友爱。这种友爱絕對不能成为工人的国际联合的保证。当《共产党宣言》的两位作者写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时候，他們所指的并不是这种友誼，他們也不是为了这种友爱而建立第一国际的。

正是这种友爱——杀害兄弟者的友爱！——現在在一方为德国和奥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和另一方为塞尔維亚、比利时、法国、波兰和俄国的劳动人民之間存在着！这些工人同本国的容克地主和资本家联合起来反对后面这些国家的人民。早在1914年8月的《Wiener Arbeiter Zeitung》^①（我們的“兄弟”維克多·阿德勒的報紙）就宣布过：拯救德国人类的时刻来到了。但是，不过在同年7月的时候，德国和奥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曾經极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如果全欧軍事冲突的史无前例的灾难落在文明世界身上的話，則这里的罪过就在于德奧帝国主义者的剝削者的貪欲。这就是說，我們的德国和奥国兄弟們如果要“拯救德国人类”，就决不能繼續掩飾他們的新策略的真正意义。他們不会不知道，这个策略違反国际的全部傳統。他們自觉地主張同德奧帝国主义者結盟，而反对同受到奥国和德国攻击的那些国家的劳动人民联合。他們坚决认为，帮助进攻者比捍卫受到攻击的那些人的利益更有好处些。因为进攻者会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一些改良措施来酬偿他們的劳績。

所以現在，当奥国社会民主党一面繼續“拯救德国人类”，一面开始修談工人的国际友爱时，我們不仅可以問他們，而且也有义务問他們：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呢？

維克多·阿德勒正确地断言，国际迟早总会恢复的。怎么不是呢！整体大于部分，也强于部分。国际无产阶级終归要克服个别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利己主义給它制造的那些可以說得上是最大的障碍。但是維克多·阿德勒怎么会不懂得，真正恢复国际的必要的先决条件就是譴責这种利己主义，因此即是譴責在德国和奥国社

^① 《維也納工人報》。——譯者注

会民主党人历史上使人无法忘記的1914年8月4日的“政策”呢？

阿德勒繼續說道，我們會再次和好的（即同受到德國和奧國攻擊的國家的無產者和好——格·普·），因為我們需要和好。他這句話又說對了，的確需要和好！不過這裡還應當加上一句，我們之間能夠有相互信任的唯一條件，就是當我們再次和好時，我們大家都要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大聲地宣布，德國和奧國的該隱式的友愛是絕對不足為訓的榜樣。

以二百四十六票對十五票通過的維也納決議，表示了和阿德勒相同的思想，不過換了一個說法，即它“絕對相信”，在戰爭結束以後全世界的工人要再次和好，以便團結一致地進行國際的階級鬥爭。非常明顯，奧國社會民主黨人以為，當前的戰爭是一回事，階級鬥爭又是一回事。這可真是萬分膚淺的對事物的看法。這種看法出自托洛茨基輩或拉狄克輩倒恰如其分，而在維克多·阿德勒那裡（大概他最積極地參加了我剛才引證過的決議的起草工作），本可以期待更深刻的思想的，雖然他有輕視理論的特徵。

被剝削者同剝削者的鬥爭永遠是階級鬥爭，儘管剝削者生活在國境之外，讲的是另一種語言。受到德國和奧國攻擊的國家的無產者，正因為要進行國際的階級鬥爭，所以他們要武裝起來，不讓奧德帝國主義者實現其剝削計劃。

不錯，這個鬥爭由於奧德兩國無產者（多虧我們的“兄弟”阿德勒！）成為上述計劃的幫凶這樣一種情況而變得更加複雜了。但是這個極其可悲的情況，只是把事情弄得複雜些罷了，它絲毫不改變事情的本質。如果奧國和德國的無產者認為可以充當容克地主階級和大資本家的幫凶的角色，則從此只應當得出結論說，受到攻擊的國家的勞動人民所面臨的危險，比我們所有這些過去如此深信德國和奧國社會民主黨人手足情誼的人所能設想的要大得多。而我們的敵人越是危險，就越應當堅決有力地同他們進行鬥爭。如此而已。

附言。在維也納代表會議上贊成所謂反對派提出的決議草案的，有十五票（二百四十三票反對）。我們可以看得出來，這個草案的實際意義是微不足道的。而它的理論價值則更是渺乎其小。草案的作者們所持的觀點……具有齊美爾瓦爾得式的概念混亂，就是說，它們還沒有勝過某個時候多美拉；紐文葛斯在國際社會黨代表大會上發表過的那些觀點。奧國的“反對派”由於自己心地極為單純，甚至料想不到，如果受到攻擊的國家的無產階級充滿着不合時宜的愛好和平的心理，就會給奧德帝國主義以最大的效勞。這個反對派希望為國際無產階級謀利益，而它的一番議論却好像是希望損害這種利益。整個地獄都是由善良的意願鋪成的。Das ist eine alte Geschichte, doch bleibt sie immer neu! ①

我們的立場②

我們的機關報算來已經整整有一年的歷史了。它從來不是一種確定的社會主義流派的報紙。我們這些為它而工作的人，具有各種不同色彩的社會主義思想。我們之間有不少的意見分歧。但是一種不可動搖的信念通過一條堅固的道義的和政治的紐帶把我們團結起來，這個信念是：如果俄國被侵略它的德國所戰勝，則德國給俄國規定的那些條件就會長期地阻止俄國經濟的發展，同時也會破壞本應最後使我國進入文明國家大家庭的解放運動。鑒於這個可怕的危險，我們曾經對自己說，現在我們應當忘記原有的意見分歧，盡去前嫌，友好地號召國內一切積極力量向奧德帝國主義展開鬥爭，因為奧德帝國主義有時公開有時隱蔽但總是強烈地同情我國極端反動的政黨。我們的《號召報》曾經就號召那些積極力量展開了這種鬥爭。

① 故事雖老，意義常新。——譯者注

② 這篇文章登載在第52期《號召報》上，為紀念其周年而作。——著者注

在我們說明这个出版物的任务以后，人們开始指摘我們背叛了国际社会主义。我們对自己有坚定的信心，我們走过了自己的道路，絲毫不被类似的指摘弄得惶惑不安。事变的进程越明显，每一个不抱偏見的讀者就会更加清楚地懂得，要是这里真有所謂背叛国际偉大原則的現象，那就必須承认，背叛原則的不是我們，而是我們的对手。他們对当前战争采取的态度，证明他們非常接近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而不是接近于現代国际社会主义者。^①将来战争的風暴停止，社会主义国际恢复自己的組織工作的时候，我們請这些論敌記住这点。

我們的論敌的行为說明他們是大大的空想主义者。但是他們的空想主义之暴露得那么明显，无过于那个說是他們“不接受战争”的滑稽而高傲的声明了。仿佛接不接受无产阶级进行解放斗争的历史条件，是由无产阶级和他的思想家决定的！

一个小宗派，类如我国的托尔斯泰分子，可以否认这些条件，但是如果一个阶级拒絕“接受”这些条件，它必然会因此使自己遭到彻底的破产。

毋庸置辯，一般說来战争是可怕的现象。当前的战争比以往所有的战争尤为殘酷可怕。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了战争各国无产阶级才心怀仇恨而手执武器地互相攻击，虽然不久以前，他們也許还友好地出席了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或国际职工代表大会，并且遵照早已建立的慣例，在結束自己的工作时齐声高唱鼓舞人心的国际歌。

不錯，在1870—1871年德法战争时期也发生过这类事情：因为在交战的两国中当时就已有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了。但是，那时处在萌芽状态的現象，現在却发展到巨大的規模。應該勇敢地承认并說出极其痛苦的真理：当前的战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队伍中真正的火并。正因为如此，我們的論敌們才不“接受”战争。正

① 我們的論敌，除了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以外，还有不少用“国际主义”掩飾最庸俗的民族主义的(反俄的)情緒的人，这些人也不值得去說它了。——著者注

因为如此，才有非常多的“知識分子”，包括那些作为无产阶级“同路人”（Mitläufer，像德国人所說的）而加入国际无产阶级的人，一想到战争就“感到絕望”。

既然如此，凡是有能力认真思索国际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任务和条件的人，绝对不会怀疑，当前的战争越是残酷可怕，受到奥德两国攻击的一切国家的一切有觉悟的无产者就越应当毅然地投入这次战争。

假使德国无产阶级真正起来反对这次战争，战争就不可能发生。^①但是它没有真正起来反对战争，因为它本来就想支持帝国主义的政策。它希望成为早已周密策划和多方准备的进攻的参加者。它预计，上层阶级会让它从胜利中分得一些经济上的好处，此外还会偿给它在普鲁士的普选权，作为政治“Trinkgeld”^②，而这是它绝对不敢通过战斗自行夺取的。这种预计招致了臭名远扬的“8月4日政策”。而且正是这个臭名远扬的政策驱使成为进攻牺牲者的各国无产者“接受战争”，即一般地同德帝国主义者作战，而特别是同受帝国主义诱骗的德国工人作战。

认为这种自卫行为是背叛国际，首先就无异于忽视同一个国际历届代表大会的决议。其次，这也意味着不懂得这一点，即只要一国或几国无产者成为旨在征服其他国家的政策的执行者，或者是成为哪怕只是旨在从经济上剥削这些国家的劳动人民（通过强迫的贸易协定等等办法）的政策执行者，因而开始火并，从这时候起，包括整个文明世界有觉悟的无产者在内的国际组织就不再存在了。

为了停止国际队伍中现在已经开始的火并，以及为了将来在极广泛的规模上恢复国际，只能有一个办法：无情地反击一切（无论他们是誰）破坏每一个有觉悟的无产者都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民族自决权的人。反击越是无情，帝国主义者再度侵犯这种权利

① 当然，德国并不是孤立的。不过奥地利是在德国的指使下行动的。——著者注

② 小费、茶钱。——译者注

的行为就会更少，暂时在一国或另一国中为帝国主义政策所诱惑的无产者就会更迅速地拒绝这种政策。

如果某个国家表现出在精神上不能彻底坚持自己的自决权，则它的工人阶级就不配参加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只有刚强的人，只有具备要求独立的高傲意志而且决心对征服者宁死不屈的人，才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的王国。

一个有机会深入地了解俄国俘虏日常生活的同志写道：“作了德国俘虏的俄国人，除了虱子或者该死的虱子以外，至今没有别的称呼。”光凭德国人对待俄国劳动人民被俘者的这种公然蔑视的态度，就一定会使俄国劳动人民用人类尊严受到极大侮辱时的毅力进行斗争。如果有哪个民族因为目空一切的德国帝国主义者而生活得很坏，则这自然就是我们多灾多难的俄罗斯民族。幸而“该死的虱子”已经表现出是强大而勇敢的野兽，它有許多同盟者的支援，这就大大地减少了德国胜利的机会。

这种机会的减少，使我们的论敌引为口实来加强自己谋求和平的宣传。但是不要欺骗自己。德国帝国主义现在远没有完全失败。本来属于协约国但现在仍旧为奥德两国军队所占有的那一部分领土，比本来属于德国的盟国但落到我们手里的那一部分领土要大得多。因此目前所谓和平仍然意味着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自私地或无私地“pour le roi de Prusse”^①而工作……

这就是我们在《号召报》第二年开始发行之际对时局的看法。凡是赞成我们的观点的人，我们竭诚地邀请他和我们一道工作。

1916年10月

英国和爱尔兰的悲剧

刚刚镇压下去的爱尔兰运动，是当代伟大的国际斗争中最有

① “为普鲁士国王”。——译者注

戏剧性也最有教益的一段插曲。“同盟国”的一些报刊现在向爱尔兰的起义者提出种种不庄重的指摘，把他们称做叛徒。

这简直是荒谬绝伦的。他们背叛了谁，又背叛了什么呢？总没有背叛自己的祖国，也没有背叛祖国独立的事业吧。他们手执武器起来保卫了祖国。而现在，哪一个受到奥国和德国攻击的国家有胆量否认每一个民族都有独立存在的权利呢？

谁敢说一些民族有权保卫自己的独立，而另一些民族却得甘心忍受外国征服者的压迫呢？无论如何，同盟国的无产阶级绝对没有承认过，也绝对不会承认这种分别是合理合法的。它不能把战败的爱尔兰起义者看作普通的罪犯。

但是，这一次它也不可能对自己说：神灵们喜欢战胜者的事业，伽图喜欢战败者的事业。

爱尔兰的芬尼党人曾经同德国缔结了同盟。因此，他们承担了一种义务，必须用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手段来推进德国帝国主义的事业。但是，且不谈德国帝国主义的胜利会使文明人类受到其他种种极大的不幸，这种胜利也等于是根本否定爱尔兰芬尼党人曾经倡导的各民族都有独立存在的权利。它其实就是奴役比利时，灭亡塞尔维亚，在阿尔明尼亚进行新的屠杀，以及诸如此类。爱尔兰的起义者们不愿意考虑这个道理。在对待他们认为和自己的国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一切问题上，他们始终是盲目无知的和漠不关心的。芬尼党人的观点，正像现在某些资产阶级政论家所说的那样，是“神圣的民族利己主义”的观点。然而，谁主张神圣的民族利己主义的观点，谁就没有权利援引工人阶级的利他主义。自然，英国无产阶级应当最坚决地出面反对用严酷的手段镇压战败者的行为。这是合乎人道精神和英国无产阶级自尊心的要求的。不过在当前场合，它决不可对他们不成功的企图表示惋惜。

完全相反！

大家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非常同情爱尔兰人。马克思曾经向俄国革命者证明，他们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应当促使波兰得

到解放，同样，他也曾向加入国际的英国工人确凿地证明，为了英国工人本身的利益，他们应当力求使爱尔兰得到解放。但是尽管马克思十分同情爱尔兰人的解放运动，他仍然多次痛苦地埋怨领导运动的人的政治眼界极端狭小。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1869年12月4日）中，他说过：对于这些领导人说来，“Die Irish Question muss als was ganz Apartes, im Ausschluss von der übrigen Welt, behandelt... werden.”（爱尔兰问题应当当作某种特殊的和其他世界没有任何联系的问题来讨论）^①。恩格斯也认为这个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他在答马克思的信中说道：“爱尔兰仍然是 sacra insula^②，它的意图不应当同其他罪恶的民族的阶级斗争混为一谈。”^③

我们毫不怀疑最近领导爱尔兰起义的人的自我牺牲精神，但是我们要承认，他们具有同样狭小的政治眼界，就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上世纪爱尔兰芬尼党人身上发现的一样。他们的尝试的最大弱点也就在这里。“神圣的民族利己主义”现在根本不适于用作个别民族争取解放的武器。个别民族的解放事业应当密切地同国际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联系起来。既然奥德帝国主义的胜利会使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害，则任何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只要它正确地理解自己获得解放的、从历史情况看来是可能的现实条件，终究不会对这种胜利寄予希望的。我国那些主张“失败论”的人，听任民族感情支配（这样的感情无疑是存在的），他们的算盘首先就打得最糟糕不过了……

但是为了爱尔兰的光荣，也应当指出，絕大多数的爱尔兰人民并不愿意支持芬尼党人的錯誤政策。他们坚决认为，如果他们同民主的英国建立联盟，他们对自己未来命运的安排，就会比站在中央帝国一边时强得多，因为中央帝国至今都未能彻底清算专制制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4卷，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94页。——译者注

② 神圣之岛。——著者注

③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4卷，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96页。——译者注

度。英国无产阶级往后应该用自己的政策向爱尔兰人民证明，而且无疑地，他们也会向爱尔兰人民证明，绝大多数爱尔兰人的估计并没有错。

附言。我准备把这篇文章投邮的时候，在一份意大利报纸上读到了一则消息，其中说，某个时候如此坚决地反对英国的波达将军，给列得孟德拍了一份电报，他在电文中欢迎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领袖效忠于英国的旗帜。这就是英国式的自由特有的伟大的和解行动！

1916年5月

比利时的呻吟

我们著名的艾米尔·王德威尔得同志在《L'Humanité》①(1916年11月25日那一期)上就德国征服者大规模强制迁出比利时人向全世界社会党人发表了一篇动人的呼吁书。他公正地把这些征服者的手段，比之为亚述和巴比伦时代亚洲专制君主的手段。他同样公正地指出，德国当局的态度乃是违反国际法的罪行，在这种罪行面前，甚至那些至今都用缄默不语的态度极力强调自己中立立场的人也不能继续沉默下去：“教皇提出了抗议；荷兰、西班牙、美国都提出了抗议。”王德威尔得同志希望，包括自己过去的成员在内的整个工人国际都会提出抗议，也就是说，连现在在中央帝国的军队中同我们作战的我们过去的那些同志都会感到愤怒。

他说：“我们大家毕竟都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可以就当前战争的原因和目的互相展开争论，但是，我们不能不全体一致地对待现在在比利时发生的事情。”

我完全同情王德威尔得的激烈的愤怒，也深深尊重他对比利

① 《人道报》。——译者注

时人民当前的不幸境遇所表示的高尚的悲恫心情。但是，非常遺憾，我应当說，对德国征服者在比利时的行动提出抗議，恐怕不会像他設想的那样全体一致，而更重要的是，恐怕不会像他設想的那样出于至誠。

从謝德曼輩、埃伯特輩、休特古姆輩和他們許許多多的同道們那里可以期望什么呢？頂多是几句假仁假义的話罢了。他們所以說这些話，是因为容忍連教皇也要提出抗議的那种暴力的确是可耻的。自从1914年8月4日令人可悲的德国国会开会以来，我們就知道这些人的伪善到了何种地步。在这次會議上，他們一方面宣布每一个民族都有独立的权利，另一方面却通过貝特曼-霍尔威克的嘴向帝国政府表示了信任，虽然帝国政府无耻地承认，它打算把自己的大队人馬开进中立的比利时去。如果謝德曼之流觉得自己不得不斥責一下德国政府在比利时的行徑，現在又会发生某种类似的现象。他們一面伪善地发表反对这些行徑的言論，一面繼續不变地和有计划地支持这个政府，即繼續創造条件，使上述行动像天文现象一样准确地今后再度出現。

王德威尔得說：“如果国际默不作声，那我們的敌人就会有权說，它已經死了。”

国际活着。但是我們應該有勇气承认和大声地說出，对于国际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說来，支持奥德帝国主义者的征服政策的那些国际分部已經死了。过去有个时候，这些分部的代表們曾經在国际代表大会上同我們一起坐在大厅里，大厅的四壁冠冕堂皇地挂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語。現在他們同奥国和德国的容克地主和資本家联合起来了，他們完全自觉地追求着统治和剝削其他民族的目的。他們背叛了国际。他們的叛变对国际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国际有一切理由对他們的叛变感到惋惜。但是当叛变已成既定事实，就不能再对叛变的禍首寄予任何希望，也不能在談到这些禍首时还說我們大家毕竟都是社会主义者。不，既然这些人同征服者握手言欢，他們就不再是社会主义者了。而且

在他們還沒有撕破同剝削者締結的可耻的盟約以前，他們是不會回到社会主义方面來的，也不會使国际獲得新力量的。要到达这一步現在还早着呢。我們同他們的意見分歧不是在当前战争的原因和目的問題上簡單的理論分歧。我們同他們在實踐上各行其是，就像保卫牺牲者的人同自願充当劊子手（或劊子手的帮凶）角色的人各行其是一样。對他們可以進行斗争，也应当進行斗争，却不能期望他們會同情比利时人民，同时，对于多災多難的比利时人說來，要本身就站在压迫他們的人的队伍中的那些分子來表示同情，也是使人難受的。

总之，德国政府所采取的大規模强制迁出比利时人的措施，不会引起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稍微真誠的憤慨。然則少数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又怎样呢？

大家知道，这个少数集团分裂为許多流派。其中占重要地位的是有代表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代表會議工作的那一派。齐美尔瓦尔得派和昆塔尔派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而且他們都习惯于編撰种种滿紙尽是最善良的意图的決議。他們十分坚决地表示反对战争，他們也同样坚决地要求和平，——并且是一种空前美妙的和平，这是不割地的和平，这是不要軍事賠償的和平，这是不使任何人受到任何委曲而大家都只会感到滿意的和平。既然如此，可以希望，齐美尔瓦尔得派和昆塔尔派的善良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奥匈帝国和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都会响应王德威尔得同志的号召，并且作出決議，在決議中他們會对比利时人說：“祝君万事如意”，就像某些文雅君子結束自己的书信时所說的那样。悲哀也就在这里。人們希望自己的收信人万事如意，这种客套在絕大多数場合不过是一句“空話”。同样情形，齐美尔瓦尔得派和昆塔尔派在自己的決議中所表示的善良願望，只不过证明他們有练习写字的热情（像謝德林所形容的一样），而絕不保证这些人能够哪怕稍微使得公正的和平早日到來。

繼續往下說吧。齐美尔瓦尔得派和昆塔尔派的言論不仅无助

于公正的和平早日到来，反而会推迟它的到来。只要回想一下例如不久前布里臧“同志”在法国議院的发言，就可以深信这点。

議院討論法国进行自卫的一个重要的技术問題。我剛才指出的这位“同志”发表言論，并且urbi et orbi^①宣布，說他的国家“非常害怕战争”(tremble devant la guerre)。从这些話中，侵占了法国重要的工业省份的德国征服者能够得出什么結論，又应该得出什么結論呢？这就是說，法国抗战的精神力量已經瓦解了，它准备在領土方面和其他方面作一些严重的让步。非常明显，这个結論决不会使德国人願意締結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式的和平——即不“割地”、不賠償軍費和沒有其他不愉快事情的和平。相反，这个結論会大大增加他們在領土兼并方面以及所有其他方面的要求条件。

不錯，布里臧曾經解釋說，他之所以讲出这里提到的一些話，只因为他沒有把自己的演說詞准备好，其实他本来想說的意思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是另外的意思是什么呢？布里臧在讲坛上作了簡短的发言，在发言过程中他三次喊道：“à bas la guerre!”（打倒战争！）。就在他这三次喊声中深刻地体现着他要在自己的演說中加以表达的思想。但是高呼“à bas la guerre!”和布里臧收回的話“le Pays tremble devant la guerre”^②一样，只会促使德帝国主义者采取同一种行动，即采取和齐美尔瓦尔得分子編造的和平直接相反的行动。德国帝国主义者大概会对自己說：布里臧在議會里要求停战的言論是一个标志，說明由于某些原因使得法国保卫自己抵抗我們的进攻的决心正在削弱；只要再作若干坚决的努力，就可以使法国人屈从我們的意志，同意我們強迫他們接受的那些和平条件。既然当前的战争是德国帝国主义者們发动的、进行的和繼續进行的（奥地利是按照他們的指示行事的），而且既然德帝国主义者并沒有在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承担过任何义务，則他們永远会想強迫其他民族接受割地、賠款和其他不愉快的条件的和平。

① 向全世界。——譯者注

② “我的国家非常害怕战争。”——譯者注

也許有人会反駁我說，当布里臧高呼“打倒战争！”的时候，他根本无意于促使法国謀求任何条件的和平，因为他只能接受締結和約后既沒有战胜者又沒有战敗者的和平。对于这个反駁，我要用馬依科夫的抒情戏剧《三个死囚》中路修斯的話来回答：

智者和愚者的区别

在于他的思想透彻。

希望向人类說出“新东西”的人，即使他們沒有好好准备自己的演說詞，也不致妨害邏輯性。邏輯上的彻底性，是公民的一种优良的美德。如果布里臧登上法国議會讲坛时不打算鼓动法国去締結任何条件的和約，那就应当承认，他的三呼“à bas la guerre”是毫无意义的。

我們看到的实际情形是怎样的呢？是法国人侵占了德国的領土么，还是相反，德国人攻进了法国，并且在那里建筑了防御工事呢？似乎这里不能有任何怀疑。誰都知道，受到敌人进犯的不是德国，而是法国（比利时等等），并且“文明的”德国人之对待被侵占地区的人民，就像当年薩尔瑪那薩尔輩、阿树尔巴尼帕尔輩^①及其他亚洲暴君的野蛮士兵对待他們所占領的国家的居民一样。如果一个人真正希望得到符合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決議的和平——即不割地、不賠償軍費、和約締結时既沒有战胜者又沒有战敗者的和平，他該怎样行动呢？他应当力求削弱进攻者的力量，而增强受到进攻的損害的人的力量。他会始終不渝地对德国人高呼“打倒战争！”而劝告法国人用他們所能有的全部精力繼續进行自卫。布里臧的行为又怎样呢？他不是向德国人高呼“打倒战争！”而是向法国人高呼“打倒战争！”如果他的呼声对法国有什么影响的話（但願它实际上根本沒有发生任何影响），那它就会損害进攻的牺牲者，而有利于进攻者。它会增强进攻者的力量。但是，进攻者越是感到自己强大，它就越不願意接受齐美尔瓦尔得派和昆塔尔派所

^① 薩尔瑪那薩尔(三世)(公元前 860 或 859—825 或 824 年)，阿树尔巴尼帕尔(公元前 668—631 年)，均亚述国王，崇尚武功，連年不断对外用兵。——譯者注

梦想的和平。而从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布里臧的言论是符合“普鲁士国王”的利益的……

如果这不是可悲的话，也是可笑的。更加可悲的是，无论布里臧本人，也无论他的同道们仍然没有发觉他已经堕落到荒唐的境地。无怪乎在他结束演说时，赞成他的思想方式的那些法国社会党议员都来跟他握手，——幸而这些人是极少数。非常明显，即使齐美尔瓦尔得派和昆塔尔派的每一个分子^①都用自己全部“纯洁的心灵”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他们实际上还是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效劳的。当人们的主观逻辑和事变的客观逻辑不一致的时候，情况总是这样。事变的客观逻辑会因为人们不注意它而予以报复，也会因为人们误解它而加以嘲笑，它会迫使人們益其所欲損和損其所欲益。

智者和愚者的区别

在于他的思想透彻。

齐美尔瓦尔得派和昆塔尔派的主观逻辑是智者的逻辑的直接对立面。倡导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式的梦想的人不仅在法国丧失了彻底思想的能力。拥护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决议的德国人在这方面决不让于法国人，而意大利人又不让于德国人，如此等等。

一个星期以前，各报都刊登了“官方的”意大利社会党拟定的、并由它交给意大利议会主席团的关于和平的决议草案。草案说，现在，所有交战国家的政府当局已经表现出一种情绪，可以用来谋求对一切人都光荣的、不割地的和平，这种和平的基础，就在于照旧承认国际法及其他法律的要求。而这时正是德国的提格拉特帕列沙尔^②在尽其最大可能地嘲弄国际法，并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坚决地力求“兼并土地”。^③按照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方式

① 除了那些“胸有成府”的人以外…… — 著者注

② 提格拉特帕列沙尔——亚述国王名。一世：公元前1115—1110年；三世：公元前745—727年。亚述王国在这两个皇帝统治下，变成了穷兵黩武、到处掠夺、极富侵略性的强大军事帝国。——译者注

③ 请参照《Le Journal》（《日志》）。——译者注（1916年11月29日那一号）上引用的一篇显然是其上級授意登載的文章《Münchener Neuesten Nachrichten》

进行思想的人活像一具尸体，他們有两只眼睛，就是看不见，有两只耳朵，就是听不见……

所以我说，对于受德国人压迫的比利时人民说来，齐美尔瓦尔得派和昆塔尔派的同情是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的。那末，我們假定累德堡或其他任何具有和他相同的思想方式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会表示反对德国军事当局大规模迁出比利时无产者的措施吧。就其会对受帝国主义麻醉的德国工人阶级起某种清醒作用这一意义說，这自然不是沒有裨益的。但是这种抗議所能带来的利益，完全被齐美尔瓦尔得派和昆塔尔派的宣傳給那些受德国和奥国攻击的国家所造成的損失所对消了，也許还抵偿不了那种損失。这种宣傳削弱了这些国家的抗战力量，因而就增强了进攻国家的力量，它使得从事这种宣傳的那一部分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派的一切努力都归于无用，有时簡直还使之变为有害的。既然累德堡用贊同的态度支持布里藏以及他这类政治上幼稚的人們荒謬有害的言論，所以尽管他向軍国主义提出抗議，他始終是“普魯士国王”的不自觉的、非出本意的、然而不可替代的奴僕。

这就是齐美尔瓦尔得的邏輯。

如果說，我們同謝德曼的爭执决非关于当前国际冲突的原因和目的的学院性的辯論，那么，我們同齐美尔瓦尔得派和昆塔尔派的分歧，首先无疑具有理論性质。不过我們和他們的距离非常大，所以我們大家不可能有共同的快乐，也不可能共同的悲痛，更不可能并肩行进。

会集在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的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思想家們，都不善于科学地理解这个运动的历史条件。

这些人还落后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过去的一个阶段上。

按其观点属于当前这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者，簡直不可能同他們取得一致的看法：因为他們有完全不同的出发点，有完全不

ten►(《慕尼黑近訊》)。在这篇文章中，公然无耻地叙述着“爱好和平的”德国人的极为广泛的征服計劃。——著者注

同的思想习惯。

例如：王德威尔得同志在自己的呼吁书中說，国际对德国人大規模迁出比利时人所表示的沉默，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如果我们堕落到否定构成我们学說的精神的要素，如果我们拋棄使我们不断反抗非正义行为的主張强大有力的原則。”但是，一位标准的齐美尔瓦尔得派和昆塔尔派思想家认为，正是这个条件对国际成員說来是必不可少的。他对我进行攻击，理由是：我向工人們指出第一国际第一篇宣言結尾几行文字时建議他們在自己的国际政策上坚持道德和正义（因此也即是公正）的簡單法則。按照这位了不起的“理論家”的意見，只有蒲魯东主义者或者馬克思主义的叛徒才能援引正义。而他則以生产关系为依据。如果拥护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決議的人多少了解一些現代科学社会主义的話，这种意見就会在他們自己的陣营中引起哈哈大笑。但是他們沒有发现它是极端荒謬的，他們不懂得我所批評的把生产关系和正义概念对立起来的作法是一种理論罪过^①。他們中間有些人甚至准备保卫我这位莫測高深的論敌。这完全像《燕麦羹》中的情况一样：孩子們吃飯，擦干净勺子，說声謝謝。

因此有理由认为，孩子們讀过王德威尔得同志热情洋溢的呼吁书以后，如果不是全体，也会有部分人輕蔑地聳聳肩膀，說道，“他写得或許还不坏，但是显然落伍了，因为他談論正义；为了善于使用严格的社会主义的思維，他应当向馬尔托夫学一点东西。”

再說一遍：無論是同埃伯特輩、謝德曼輩、海涅輩以及別的社会帝国主义的家伙一道走的那些人，也無論是希望实现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式的梦想的那些人，都不会严肃認真地和一片誠心地欢迎王德威尔得同志的呼吁书。在这个問題上不要欺騙自

① 自然，我承认有例外情况。某些个别人士其所以贊成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決議不是因为缺乏理論修养，而是由于可怜的怯懦性格，他們不願意使好朋友伤心，他們害怕这个或另一个小組的瑪麗姬·阿列克賽也芙娜会說什么話，諸如此类。不过这种例外情况只是证实着一般規則。——著者注

己。不过也不应该夸大这个痛苦的真理的客观意义。它完全不是证明国际死亡了。

国际不仅没有死亡，它甚至没有睡觉，像福音书上的拿撒勒人^②在自己复活前睡觉一样。它活着，精神奋发，积极有为。

凡是各国有觉悟的无产者为了使自己尽快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而友好地联合自己的努力的地方，国际就活着，就精神奋发，就积极有为。现时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战胜德国帝国主义，因为如果它获得胜利，它的征服政策就会长期阻碍社会主义的进展，首先是在德国本国，然后自然是在欧洲其他国家。因此，受到攻击的国家的有觉悟的无产者，无论是在反对德国征服者的斗争中流血牺牲，或者是在后勤部队中服务，都是为这次战争爆发前他们为之奋斗的那个理想而奋斗，也是为他们从前所参加的那个国际运动扫清道路。现在唯有在他们这些人中间，工人国际才活着。而因此，在这个国际中，王德威尔得同志热情洋溢的呼吁书大概会得到最深刻、最强烈和最有效的同情。这个国际的成员自然不会用嘲笑的态度对待王德威尔得同志提到的我们不断反抗非正义行为的主张。他们会对自己说：压迫越大，我们对它的反击就越应当坚决有力。而且他们就会对各国的布里臧之流的“非常害怕”的叫嚣，答以英勇的呼声：

“打倒征服者。”^④

② 康德称伊壁鸠鲁的一个理论主张为 Schamlos (无耻的)。当我接触我的批判者的主张时，就不禁想起这个说法。——著者注(这个注在正文中没有标出相应的注号，原文如此。——译者注)

③ 指耶稣。——译者注

④ 当我寄走了这篇文章以后，我在《Le Matin》(《晨报》。——译者注)(11月3日那一号)上读到：在大规模地迁出比利时人、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以后，德国军事当局就着手对付俄国农民，有一千五百人被送到施勒兹维希、霍尔施坦因去了。沃尔弗通讯社似乎还补充说，如果经验表明这样做是成功的，一批批新的“志愿”移民者就会接踵而来。显然这里是指德国人侵占的俄国西北部地区上的白俄罗斯农民而言。我们坚决地谴责这种野蛮行为，我们深信，现时战斗的国际的一切分部都会支持我们这种愤怒的感情。——著者注

国防、反动派和劳动利益

“生产榴霰彈吧，制造炮彈吧，但是不要叫政府頒发条令了”。

1915年12月8日(旧历)，前內务部长赫沃斯托夫先生在彼得格勒同某些首都报纸和外省报纸的代表們进行的談話时这样說道。

他的这番話自然不是针对并不从事炮彈制造的报界代表說的，而是针对为了人民的自卫而建立起来的中央軍事工业委员会說的。但是应当替赫沃斯托夫先生說句公道話：他的言論說明他是文章簡洁的大师。他的簡短的公式包含着整整一部綱領。他极仁慈地让居民們致力于制造榴霰彈和其他軍用炮彈，却决不願意顾及他們的要求。过去如此。而帝制派代表大会的決議告訴我們說，将来还会如此。前內务部长則赶急断言，在这方面一切的确都会照过去一样。

当然，赫沃斯托夫先生也和普通人一样可能犯錯誤。我希望，俄国的居民很快就会根本不能容忍上述簡短的公式中所表現的这种对俄国人民的高傲态度。那时也許就不会像过去一样了。不用說，現在俄国已經有許多人同情我这个希望。問題只在于，究竟應該做些什么事，才可以实现这个希望。为了粉碎赫沃斯托夫先生之流的傲慢的主張，爱好自由的俄国人民应当怎样行动呢？

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回答这个問題。这也是容易理解的。在这个問題上要求把意見統一起来，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因为居民中間不滿意我国現時政治制度的那些人的成分太复杂了。为了使赫沃斯托夫先生之流不再像对待自己的“奴才”一样对待我們，究竟应当做什么呢？对于这个問題，答案是五花八門的，但是其中有一个根本沒有任何邏輯性。我想在这篇文章里就談談这个答案。

我深信，“失敗論者”之流的先生們(糟糕的是这种人不仅在国外的“俄国人”集团中有)会赶快利用赫沃斯托夫先生傲慢的話来

证实自己所謂的思想。他們大概会反对他的簡短的公式，而提出自己的也非常簡短的口号：“如果参加某些組織的人只可以致力于制造榴霰彈，而不可以談論自己国家的局势，則应当立即退出这些組織。”我国某些工人可能觉得这个口号是值得同情、值得注意的：因为在赫沃斯托夫先生的話中官僚派的无耻作風竟然如此之多，多得如此吓人！一些俄国报纸指出，在我国工人阶级中間正在进行一种从軍事工业委员会中召回自己的代表的宣傳。可以耽心的是赫沃斯托夫先生的官僚派的无耻作風正在为这种宣傳服务。

假定这种宣傳完全如願以偿。为官僚派反动政策所激怒的工人都离开了所有促进国防的組織，而且普遍得出这样的結論：在我国当前形势下，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应当尽可能地不积极参加国防工作。这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其后果是加强真正的官僚派的权力和影响，而这些官僚派的慣技非常明显地表现在赫沃斯托夫先生厚顏无耻的公式中。既然他們的权力和影响的加强，对俄国劳动人民的利益会发生极为有害的影响，則可以断定，我国工人为赫沃斯托夫先生的无耻作風所激怒，采取了“失敗主义的”口号以后，就会使自己和整个国家受到残酷的惩罚，这样反过来倒給同一个赫沃斯托夫先生帮了一手。

这次战争剛一开始，我就反复不断地說，我国的反动派根本不願意德国失敗，因为他們把德皇看做欧洲反动势力最可靠的支柱。事变证明了我是对的。現在法国报刊上就透露出一条消息，說我国軍隊撤离里沃夫以后，馬克拉科夫先生和謝格洛維托夫先生开始謀求俄德单独讲和。在法国，人們都說这些热心的反动派有一个想法，即认为俄国应当和德国結成联盟，以便同欧洲的民主派进行斗争。从反动派的观点看来，再沒有比这个想法更自然和更正确的了。从反动派的观点看来，这个思想是如此自然和正确，以致在我国軍隊撤离里沃夫以前很久，俄国就不断有消息傳來……当时据說，还在1914年11月我国駐里沃夫的部队就递过一份关于撤离的报告书！……有位俄国社会活动家在1915年夏天曾



2 025 5578 8

經告訴过我一个更能說明問題的消息，这个消息流傳在我国作战部队中…… 有一切理由可以认为，这个亲德派并未削弱，反而随着战争之暴露出我国旧制度无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加强了。也许就在不久的将来，保守派先生們会拋棄自己的爱国主义的假面具，而公开宣布，为了同“犹太佬、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主义者”进行有效的斗争，应当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同德国的和平，而让不敬神明的法国共和派和我国其他的西方盟国去决定他們自己的命运。

我国工人应当竭力避免可能支持保守派政策的任何步骤。而从軍事工业委员会召回工人代表无疑就是这样一种步骤。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凡是害怕政治自由在俄国获得胜利的人都对这个步骤表示了无任的欢迎。

一切事物，只要它削弱四个协約国的抗战力量，现在都是为反动的政治势力服务的。一切事物，只要它增强这个力量，都是为进步的政治势力服务的。非但俄国为然，全世界也皆如此。不过我国有其特殊性。劳动群众有觉悟的代表們应当清楚地知道并且永远地記住这一点。他們是俄国最优秀的人。而正是因为他們是俄国的优秀人物，他們身上就担负着巨大的政治責任。

主張“失敗論”的先生們深信，德国的胜利会使我国的保守派受到重大的打击。但是这个极其有利于德軍參謀总部的信念，其实根本沒有任何严正的根据。完全相反：德国的胜利会大大地延緩我国社会发展的进程。

胜利的德国的代表俾斯麦在1870年曾經直截了当地对战敗的法国的代表茹尔·法夫尔說：“如果我們认为拿破侖更合乎我們的利益，我們就会把他派給你們”。德国如果在这次战争中战胜了俄国，也会用自己全部巨大的力量来支持我国内部最适合于德国利益的那种制度。然則还有什么制度会比赫沃斯托夫先生所代表的那个制度更符合德国的利益呢？要知道，我国反动派早就表现出是威廉的忠实奴僕。还要知道，正是这些反动派应对俄国的失敗負責……